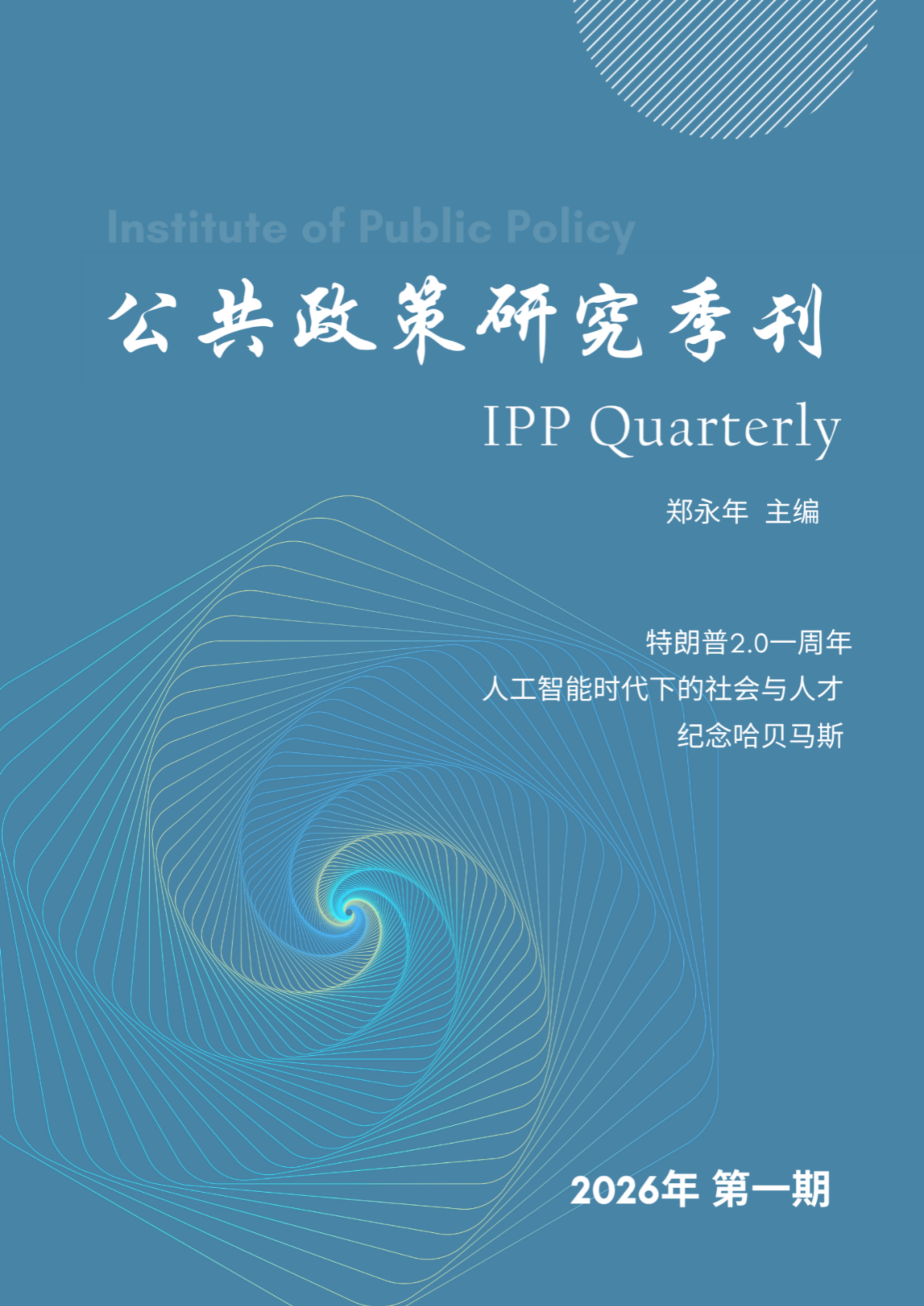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郑永年 主编

特朗普2.0一周年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纪念哈贝马斯

2026年 第一期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2026 年第一期

国家高端智库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6 年 5 月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编委会名单

主 编：郑永年

编 委：陈佳慧 戴明洁 郭 海 蒋余浩 李海滨 李明令

李品保 李 婷 林辉煌 刘 佳 卢克玲 区富祝

徐伟钧 杨海燕 杨丽君 杨庭轩 余 荔 赵 巍

朱雁翎 庄文越 (按姓氏音序排列)

编 辑：李彩霞 刘 深 刘昕冉 周浩锴

卷首语

震荡与重塑

——“特朗普 2.0”的政策逻辑与 AI 时代的秩序重构

2026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一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世界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特朗普 2.0”时代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加速震荡。

纵观其执政首年，特朗普政府对内对外双管齐下。对内，其试图以大刀阔斧的“政府效率部”打破官僚传统，推行激进的内部“减员增效”，引发全美政治生态的剧烈阵痛；在社会层面，特朗普政府迅速收缩移民政策和签证限制，试图重塑美国的人口与人才边界。对外，从对邻国及核心贸易伙伴的关税加征，到全面推行“对等关税”，全球经贸版图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巨浪下陷入剧烈动荡。

进入 2026 年，这一政策逻辑进一步向地缘政治领域蔓延。在西半球，美方通过对委内瑞拉采取强力军事干预并图谋控制其石油命脉，向全球清晰宣告了“新门罗主义”的强势回归；在大西洋方向，特朗普政府将关税大棒挥向英、德、法等传统盟友，甚至将经贸筹码与格陵兰岛等战略地缘事务悍然捆绑；而在亚太方向，美方通过的 2026 财年拨款法案，明确定向对台湾地区与菲律宾提供防卫资金，其反制中国、构筑多重遏制圈的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

面对特朗普看似毫无套路、特立独行的“组合拳”，我们应该如何刺破迷雾，洞察其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本期《公共政策研究季刊》特此集纳了 2026 年第一季度“IPP 评论”发布的一系列重磅文章。诸位研究员各抒高见，力图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梳理出特朗普 2.0 政策重心的逻辑暗线，帮助读者看清当今世界格局演变的内在动因与未来走向。

历史的震荡不仅来自地缘政治的博弈，更来自生产力的根本性跃迁。当前，伴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指数级爆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奇点”已然临近。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旧有结构和传统经验产生颠覆性冲击。面对科技海啸，人类社会应当以何种姿态进行防御与共生？我们传统的人才培养和发展理念，又该如何进行颠覆性的调适与变革？本期“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专栏，将尝试从社会学、教育学及政策科学等多维视角对此进行深度辨析。

身处地缘震荡与科技奇点的双重十字路口，唯有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与深刻的理性洞察，方能审时度势、行稳致远。愿本期文章能为关心中国与世界前途的决策者和思考者，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目 录

【特朗普 2.0 一周年】

关于特朗普、委内瑞拉，以及中国为何不希望“另起炉灶”？——《南华早报》专访郑永年...	- 1 -
特朗普“新现实主义”外交的变与不变.....	徐伟钧- 9 -
特朗普“情定”格陵兰，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李品保- 14 -
面对特朗普步步紧逼，欧洲盟友仍将忍气吞声.....	徐伟钧- 16 -
美联储政策是否会“换人换路”？——三种可能影响情景与应对.....	区富祝- 19 -
欧洲能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吗？	郭海- 27 -
世界秩序的临界点：中等国家正重塑全球格局.....	梅里·马达沙希- 30 -
美国强掳马杜罗说明，世界已处于“准战争”状态.....	郭海- 36 -
全球化进入“安全化”新阶段，中企出海风险正加速分化？	刘佳- 40 -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	郑永年- 47 -
探索建设科创特区，深化大科研体系体制机制改革.....	郑永年 杨丽君- 51 -
AI 都在替人打仗了，为什么仍未能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	蒋余浩- 54 -
AI 是“大国博弈”工具？我们更需强调的是“多元探索”	蒋余浩- 61 -
美国加速 AI 军事化，硅谷的华人人才怎么办？	戴明洁- 70 -
Manus 被收购背后，中国 AI 正在“向外生长”吗？	戴明洁 刘深- 75 -

【纪念哈贝马斯】

为了人类理性的未竟事业.....	刘佳- 82 -
------------------	----------

【特朗普 2.0 一周年】

关于特朗普、委内瑞拉，以及中国为何不希望“另起炉灶”？

——《南华早报》专访郑永年

南华早报：关于委内瑞拉问题，您曾指出美国重返拉美可能会重塑地区秩序，而特朗普对其他国家的警告可能会导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您如何评估这些变化，它们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这涉及特朗普的战略转变，而美国国内对此已达成广泛共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方法主要包含两点。

首先，他要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他认为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而，我认为他既不能也没有意愿将西半球完全与其他国家隔绝开来。我们不应该把事情推向极端。

第二种是离岸平衡。虽然自奥巴马时期以来就一直在讨论战略收缩，但从未真正付诸实施。我认为特朗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作为一名商人，他行动力强，而且往往言出必行。他的战略重点，即“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以国内为中心，同时关注周边地区和“后院”——从门罗主义转向他所谓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

二战后，美国的利益深深植根于欧洲、中东和东亚。由于美国一直是这些既有秩序的一部分，其撤出势必会在当地造成混乱。反之，美国转向拉丁美洲——重新融入该地区——也可能引发类似的动荡。动荡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的主要趋势。无论美国是退缩还是前进，都将随之发生重大调整。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三个层面正在发生快速变化。

第一，大国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大国主导着重大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而小国对此影响甚微。委内瑞拉绝不会是美国的最后一个目标。正如在欧洲一样，一旦战争结束，乌克兰也不会是俄罗斯的最后一个目标。

自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右翼智库一直在讨论世界三方瓜分的方案。就大国而言，特朗普是第二个推行这一方案的人；第一个是普京，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这样做，尽管借口不同。欧洲国家——例如波兰——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特朗普与普京妥协，通过割让乌克兰领土来结束战争，乌克兰将不会是俄罗斯的最终目标。

然而，“区域霸主”（regional lords）也在不断扩张势力，例如土耳其在所谓的突厥语国家。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国际秩序的封建化，各方都在寻求自身的势力范围。

我们过去认为特朗普关于吞并格陵兰岛或加拿大的言论只是玩笑，但他却是真心想要这些地方。不过，在我看来，他并非完全没有逻辑。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高度依赖美国，但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毒品、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

自门罗主义以来，美国并未对拉丁美洲进行有效发展。该地区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疲软，社会分裂严重——极端亲美派和极端反美派并存。正因如此，我认为特朗普的干预意义重大——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自己的后院成为负担。

特朗普并非只是在做“推论”（corollary），而是试图将门罗主义的初衷付诸实践。尽管委内瑞拉事件公然侵犯了他国主权，但许多当地民众却在庆祝，阿根廷也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特朗普至少可能意在巩固该地区的亲美势力。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即将成为委内瑞拉的实际“总督”（viceroy），一种“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正在形成。与大英帝国不同，特朗普不会派遣大批官僚，但很可能会任命一些关键人物，至少在过渡时期内负责执政。

第二，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原则，从未真正成为现实。小国如何与大国共存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小国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才能生存下去。对它们来说，生存确实艰难。如果一个小国不断通过借助另一个大国的力量来挑战邻国的巨头，最终必将自取灭亡。

由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各自的核实力以及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如今它们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如果一个东南亚国家利用美国来挑战中国，或者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利用与俄罗斯或中国的关系来挑战美国，就像古巴当年利用与苏联的关系那样，这势必会引发麻烦。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涉及区域秩序与全球秩序的关系。

美国曾经是全球强国，但现在正在退居区域强国地位，这将导致区域和全球格局的重新调整。在下一阶段，所有以上三个层级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些都是结构性变革，而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

南华早报：一些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在西半球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单极体系，以削弱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可能会增强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促使它们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制衡华盛顿的影响力。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郑永年：基于历史经验和权力政治，我对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认同。

首先，拉丁美洲变得更加自主了吗？绝对没有。恰恰相反，它对美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拉丁美洲国家能否团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它们拥有各种区域组织，但从未真正实现团结。战略自主的理念或许会在拉丁美洲左翼阵营中得到加强。但理念终究只是理念——他们缺乏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

其次，拉丁美洲真的会变成美国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将“美洲”变成“美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资本不仅会留在拉丁美洲或北美，还会继续流向中国和欧洲。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当然希望主导拉美事务，但他并非试图将该地区变成美国的私人领地。这两者截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等大国之间仍然存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空间。

如果美国彻底将中国企业排除在拉丁美洲之外，那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关乎对等原则。特朗普讲的是强权政治的语言，而当前的中美关系也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未来仍然充满变数。

我们需要客观地分析委内瑞拉袭击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虽然中国的利益肯定会受到影响，但美国没有能力将中国完全排挤出拉丁美洲。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了，中国可能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将美国的利益排除在东亚之外，但这同样是不可能的。

大国之间的互动将会继续，不会消失。只不过小国会处于不利地位。

南华早报：拉丁美洲的右翼势力似乎正在与美国的鹰派势力走得越来越近。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会对中国未来在拉丁美洲的战略选择和前景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拉丁美洲右翼势力一直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拉丁美洲右翼势力的许多利益都根植于美国。

在依附型发展模式下，许多大型企业和精英阶层都从与美国的关系中获益。委内瑞拉前任领导层推行的国有化政策，没收了美国的资产，这是华盛顿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

右翼势力会对中国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被夸大。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建立在互利共赢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之上，不涉及地缘政治考量。右翼政府甚至可能更加重视商业联系。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的地缘政治是西方夸大其词。中国在那里所做的主要是以民生为导向的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能源贸易完全合乎情理；中国发展需要资源，而这些国家也需要出口。农业也是如此。

鉴于中美领导人今年至少可能会会晤三次，我相信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能得到妥善处理。

当然，绑架马杜罗总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中国已正式提出抗议，并呼吁释放他。

与此同时，中国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无论对方政府是左翼还是右翼，中国都会与之接触，阿根廷就是其中一例。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许多经济活动并非美国能够轻易取代的。拉丁美洲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正如更广泛的中美关系也并非零和博弈一样。

南华早报：委内瑞拉事件将如何影响更广泛的中美战略竞争？21 世纪的大国竞争是否已进入新时代？

郑永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重建国际秩序的另一个阶段。

联合国体系固然依然存在，但它已与现实脱节。根据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理论，大国将在制定国际规则或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小国在这方面则几乎无能为力，只能搭便车。

这就是中美关系如此关键的原因。特朗普去年在釜山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前就明确使用了“G2”一词。我们无需猜测特朗普提出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但如果客观地从经济、军事和其他实力维度来看待问题，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 G2 世界。如果 G2 能够合作，仍然可以取得很多成就。如果 G2 不能合作或解决问题，反而陷入冲突，那将是自取灭亡。

美国如今本身也是一个能源大国。（在委内瑞拉事件中）能源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能源就像鱼钩一样——足以激励美国资本介入其中。

派兵进军委内瑞拉不是特朗普的本意。他不会做任何会造成美国人伤亡的事情。这次没有美国人丧生，所以他很满意。他改变了美国以往的战略。即便其中也包含殖民主义的成分，但那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而非过去那种老套的殖民主义。

有些事态发展仍需时间观察——我们不应仓促下结论。此外，我们也不应低估特朗普的智力。

南华早报：正如您所提到的，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新殖民主义”路线。这是否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更广泛的威慑作用或寒蝉效应？这对中国而言有哪些风险？

郑永年：这场危机对中国周边的小国起到了警示作用，告诫它们不要把美国视为庇护者并不断挑战中国。特朗普一直未能解决乌克兰冲突。他很可能会承认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范围，而这又将损害小国的利益。

小国未来必须格外谨慎。它们不应挑衅大国，也不应仓促选边站队或依赖某个大国来对抗另一个大国。这种伎俩只能玩到一定程度，一旦越过底线，就必将自食其果。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地缘政治项目。多年来，中国并未试图通过该倡议发展地缘政治利益。它并非要求参与国服从中国，而是旨在发展经贸关系，也并非反美项目。时至今日，该倡议仍然对美国开放。尽管经济方面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该计划仍将继续发展。

我不认为美国会干预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为这将完全违背特朗普的初衷。

如果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收缩战线，聚焦西半球，那么它并非专门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如果美国真的意图破坏“一带一路”，那就等同于重拾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这与特朗普的战略逻辑背道而驰。我认为这并不现实，最终只会导致美国加速衰落。

今年中美关系有望进一步深化。中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美国在基础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等领域拥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应用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对农产品和软件的需求方面具有优势。

但目前的问题是两国之间政治信任度相对较低，因此许多问题都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一旦所有事情都被安全化，商业活动就无法开展。两国领导人在釜山会晤时强调，经贸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基石。去年中美贸易额仍高达数千亿美元。我相信，随着政治互信的增强，中美关系将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调整势在必行。中国或许需要调整其在西半球的部分工作。同样，美国也在欧洲和亚洲做出调整。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如果是一个三方世界，所有参与者都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这是一个重整秩序的过程。

南华早报：委内瑞拉危机和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给今年的领导人互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郑永年：斗争与合作是常态，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

对于美国前总统拜登或者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那些意识形态更为鲜明的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更大。但对于像特朗普这样以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影响相对较小。

如今的中美关系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过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交织其中，而如今，权力政治才是主导因素。中美两国都已意识到彼此的实力。中国有所作为，美国会提出抗议；美国有所作为，中国也会提出抗议。这已成为日常——一切照旧。只要有合作，合作就会继续。

在美国，80 后群体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习如何与中国共存。因此，双方之间的分歧，例如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不太可能严重阻碍双边关系。

斗争与合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以合作为基础，斗争就不会导致彻底崩溃——不像美苏那样。

南华早报：您指出，战后国际秩序实际上已经瓦解，随着世界进入更加无政府状态的阶段，各国必须考虑如何最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强权政治——甚至是丛林法则——是否正在重新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力量？您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吗？

郑永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都是按照丛林法则运作的。大国是法律的制定者。它们奉行的是依法统治，而非法治。国际法是“弱小国家的武器”，而大国往往凌驾于其上，正如历史上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所做的那样。

美国从未真正遵守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编造出一套精心包装的美国叙事。因此，我们不应假定过去的世界并非由丛林法则支配。对于大国而言，世界始终是丛林法则的天下。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但无需过度担忧。我们看到的并非秩序的缺失，而是秩序重建的过程。在我看来，未来的秩序其实相当有趣。俄罗斯与欧洲在近代历史上的复杂纠葛，引发了人们对其区域和国际秩序如何形成的思考。

目前，并不存在统一的国际秩序，只有各个大国各自为政的秩序。因此，我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一种“封建化”，每个大国都按照自己的规则统治着自己的领地。

展望未来，问题在于不同秩序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最终是否会催生出新的国际秩序。这仍然是一种可能性。

南华早报：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断变化的局势？多极格局能否得到巩固？如果可以，该如何巩固？

郑永年：中国目前的做法其实非常明智。尽管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不再那么重要，世贸组织等机构的效力也不如以往，但中国并没有打算“另起炉灶”（set up a separate kitchen）。

西方主导的秩序依然有用。自由贸易起源于西方，并由美国大力倡导，但特朗普出于国内原因选择抛弃它。然而，中国却欣然接受了自由贸易，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的方针是包容性的，其特点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成为自由贸易体系最坚定的捍卫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继承并延续了西方遗产的许多要素。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而且成本更低。

南华早报：您提到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似乎正在将世界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它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转变会随着美国未来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多大变化？

郑永年：我认为美国的调整并非完全出于特朗普的个人观点（尽管他的确持有 19 世纪帝国主义的世界观），而同样也受到美国国内形势的影响。如果美国继续沿用以往过度扩张的策略，将会面临更大的麻烦。因此，这种转变自有其道理。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会损害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精英阶层都对此不满的原因。

特朗普之后，一切会逆转吗？比如说，在民主党或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领导下？我认为不太可能。特朗普的总体判断或许是正确的，可能只有具体方法会有所改变。从根本上来讲，美国必须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麻烦。这一点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有所体现，在我看来，该战略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像万斯（副总统）和鲁比奥这样的年轻一代的理念，并将特朗普的行动纳入了他们的框架之中。

抛开党派之争，美国 Z 世代看待中国和国际事务的方式与冷战时期的一代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虽然会有波动，但美国不可能在结构上回归二战后或里根时代的模式——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做到这一点。

中国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不会参与任何瓜分世界的阴谋。中国从未追求过这种目标。中国目前的关注点在于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但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主权和核心利益，而非地缘政治考量。解决台湾和南海问题关乎中国的主权和核心利益，我们并非试图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

回顾中国长达数千年的、被西方误称为“朝贡”（tributary）的体系，它与罗马时代的西方做法截然不同。像费正清这样的西方历史学家找不到对应的概念，于是便将西方的框架强加于中国。实际上，中国的朝贡体系包含礼节性的馈赠——你可能向皇帝献上价值相当于 5 美元的礼物，而他会回赠价值 10 美元的礼物。礼节过后，中国基本上单方面开放贸易。中国既没有西式殖民地的传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朝贡体系。

因此，今天，中国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既不会加入重新分裂世界的行列，也不会封闭自己，更不会宣称“亚洲是中国人的”。

中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它将继续对外拓展，而不会进行影响其他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考量。

南华早报：与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比，中国避免海外军事行动——这应该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形象，但在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方面仍然面临挑战。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中国的哲学根植于儒家思想，我们古老的智慧认为，真正的武力在于止战——即“止戈为武”。这一点在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从不主动挑起侵略。

但在当今世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这种理念？拥有硬实力，就必须巧妙运用。硬实力至关重要。当然，我们绝不能效仿美国和苏联。但随着中国利益遍及全球，仅靠软实力就足以保护这些利益吗？显然不够。

我们需要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明智地运用硬实力——不是完全避免，而是用它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促进他国的利益。这就是我所说的“天下观 2.0”。

“天下”这一传统概念的核心是正确的：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须顾及他人的利益。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顾及天下。天下并非仅仅是软实力；没有硬实力作为基础，软实力是不可靠的。如果你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人们就不会尊重你。

1820 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一大 GDP 国家。仅仅 20 年后，1840 年，它就被一个弱小的英国击败——那时谁还会尊重中国呢？

中国在与美国的四轮贸易战中都站稳了脚跟，取得了成功。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也赢得了尊重。尊重是通过斗争赢得的——是通过巧妙运用硬实力赢得的。没有恐惧，就没有尊重。

南华早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可能为北京应对台独势力提供借鉴。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社交媒体上关于特朗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讨论甚嚣尘上，但这远非美国首次采取此类行动。他们此前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行动——例如在巴拿马抓捕前领导人诺列加——但我们大多已经忘记了这些事。

当然，中国可以从中学习借鉴。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最有效的行动之一。特朗普本人称之为“完美”——这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灾难性的伊朗人质营救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话虽如此，在军事策略方面，台湾问题必须单独处理。台湾问题本质上与其他问题不同：它涉及双方的中国人。我们一直坚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我们的政策是防止“独立”，同时奉行“一国两制”，而“一国两制”的本质就意味着和平解决和最终统一。

然而，从战术层面和微观层面来看，斩首行动是否可行？当然，我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人考虑过这种方案。真正的问题在于可行性以及它是否真的能够成功。

南华早报：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去年，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曾开玩笑说，如果美国卷入战争，就取消 2028 年的选举。你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时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郑永年：很难断言委内瑞拉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中期选举。这项行动筹划已久，而且的确是一个重大议题——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伊始就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

这次行动无疑会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然而，在我看来，除非民主党取得重大复兴，否则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期选举的整体走向。尽管有人抗议（这次行动），但总体方向不太可能改变。我们不应该美化美国人——他们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都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像（这次行动）这样的帝国主义行径会激起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国内政治或许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阻碍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政策战略。如果此次行动被认为成功，甚至可能通过唤起民族主义情绪来赢得更多支持。

美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他们 19 世纪的领土扩张时期显而易见——他们经常批评别人的民族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南华早报：特朗普曾表达过对美国领土扩张时期历任总统的钦佩之情。

郑永年：的确如此。尤其是在毒品危机方面，这场危机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伤害。例如，芬太尼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夺去了众多美国年轻人的生命。特朗普确实对美国这些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表现出一些真诚的关切——这并非纯粹出于政治考量。

当然，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会利用这些问题，但在大多数普通美国民众看来，他似乎是在为国家利益服务。抗议活动确实存在，但它们不会改变整体局势——他的支持基础依然稳固。

*本文英文版原文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发布于《南华早报》，原标题为 “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Trump, Venezuela and why China doesn’t want ‘a separate kitchen’” 。

作者：南华早报记者 Orange Wang, Jane Cai, Meredith Chen。翻译：周浩锴

【特朗普 2.0 一周年】

特朗普“新现实主义”外交的变与不变

徐伟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既具有巨大风险又存在结构性调整机遇的关键转折期。从外交战略的视角来看，特朗普政府放弃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不再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而是转向了一种具有特朗普个人特色的现实主义理念。特朗普个人对成本收益的高度敏感性以及他独特的决策风格，促成了特朗普式的“新现实主义”。

与“新自由主义”不同，这种“新现实主义”不再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和国际责任承担，而是转向一种“美国优先”的核心政策逻辑，以维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强调对外行为的成本收益考量与战略资源的精准聚焦。

美国的这种战略转向在 2025 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得到集中体现。该文件在目标设定上以国家核心利益为中心，将地区主导地位、经济安全和技术优势置于显著优先地位。报告重新界定了战略区域的重要性排序，将西半球列为首要战略区域，其后依次为印太地区、欧洲和中东地区。这表明，美国已放弃维护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转而实施战略收缩与重心调整，将自身的战略资源更有针对性地投向可直接产生国家利益回报的领域，而非延续以往的普遍性全球干预。

同时，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表述，也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认知与态度的调整。尽管仍然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者，但特朗普政府并未延续传统“现实主义”的冷战思维，不谋求与中国进行一场冷战式的对抗，不追求以政权颠覆为目标的全面遏制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现实主义外交具有明确的倾向性与取舍逻辑，具体表现为以重振美国的国家能力为优先导向，对战略目标进行明确的优先级排序，推动联盟体系的功能性重构，并且在客观上承认大国势力范围的存在，选择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正常竞争与共存。

基于对 2025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以及特朗普政府外交实践的分析，我们对特朗普新现实主义外交做出以下四点基本判断。

第一，战略收缩与重心调整并不意味着能力衰落，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规模与技术创新方面的相对优势依然显著。

2025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所展现的核心逻辑是战略重新定向，即将美国的对外政策从广泛介入全球事务转向聚焦特定地区与领域。该文件将地区主导地位、经济安全和技术优势置于显著优先地位，要求

盟友承担更高比例的责任，并明确以可衡量的国家利益作为对外行动的评判标准。在进行优先级排序后，特朗普政府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其认为重要的地区与议题领域，从而强化美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相对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其核心利益诉求。

这一战略调整的原因并非美国能力的彻底衰落，而是能力仍存与意愿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盟友在责任分担上的不足以及特朗普政府对长期对外投入成本的再评估，共同促成了这一战略转向。特朗普本人鲜明的商业管理思维，使其更倾向于以交易逻辑和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对外介入的范围与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在部分领域选择战略收缩，却在关键领域仍保持高强度投入。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核心领域，美国的能力仍然具有显著的相对优势。

从军事实力来看，特朗普执政以来一系列成功的实战行动，直接印证了美国仍保有强大的硬实力。例如 2025 年 6 月，美国发动“午夜之锤”行动袭击伊朗核设施，精准达成了特朗普预设的战略目标；2026 年 1 月，美国发动“绝对决心”行动入侵委内瑞拉，在对方未形成有效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控制局势并将总统马杜罗掳至美国。在多个地区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展示了快速投送、制空掌控、精准打击与特种作战能力，这表明美军仍然具有强大的实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改变地区政治格局并产生显著的威慑效果。

从经济与科技实力来看，美国在关键技术、资本市场与创新体系方面的深厚基础也能为特朗普政府在非军事领域开展竞争与施压提供长期可用的工具。特朗普积极运用关税壁垒、出口管制、技术封锁、长臂管辖等手段作为国际博弈的重要筹码，将这些非军事工具放在与军事手段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些非军事工具之所以有效，正是源于美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相对优势。

第二，对中国的定位发生变化，淡化意识形态分歧，转而聚焦经济领域的竞争。

	特朗普第二任期	拜登政府	特朗普第一任期
对中国的定位	未点名，但视为战略竞争者	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又日益具备推动该目标所需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者。	挑战者、对手、战略竞争者
		中国构成了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中国正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及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中国意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影响范围，并重塑该地区的秩序，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表 1 近三届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定位

如表 1 所示，相较于此前两届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25 年版报告没有直接对中国的定位进行界定，只是在客观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明确提及中国的内容中，核心议题集中于经济领域，重点围绕贸易平衡、供应链韧性等问题展开。

报告宣称，美国将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优先考虑对等与公平，以恢复美国经济的独立性”，并强调对华贸易应当“保持平衡”且聚焦于“非敏感领域”。这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并不将颠覆中国政权、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作为直接目标，中美之间仍存在维持关系稳定和开展一定合作的空间。

报告并未回避对华战略竞争的内容，例如在列举印太地区的主要经济威胁时，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结合特朗普以往的发言来看，这些所谓威胁实际上都指向的是中国。

具体而言，报告所列举的七项威胁都和中国有关，包括：掠夺性、国家主导的补贴与产业战略；不公平贸易行为；就业岗位流失与去工业化；大规模知识产权盗窃与工业间谍活动；针对供应链的威胁，危及美国获取关键资源（包括矿物和稀土元素）的渠道；助长了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芬太尼前体出口；宣传、影响力行动及其他形式的文化颠覆活动。这些议题构成了特朗普政府新现实主义外交框架下，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聚焦领域。

在特朗普政府 2025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防部门所使用的措辞也印证了对华定位调整的趋势。这一报告在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同时，明确表态美方“无意追求扼杀、支配或羞辱中国”，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战争部将确保他能够凭借军事实力实现这些目标”。

特朗普新现实主义外交对中国定位的这种调整，与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取向、决策风格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动存在直接关联。不同于其第一任期时的情况，当前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已建立起绝对主导的权力地位，其核心执政团队主要由坚定奉行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且唯特朗普马首是瞻的共和党人构成。这使得特朗普的个人意志能够贯彻于党内以及政府决策之中，有效规避了其第一任期党内制衡与政策内耗的困境。

在这一权力格局下，特朗普本人强调利益衡量与可见回报的政策取向，直接塑造了本届政府的对华定位逻辑。与前两届政府相比，本届特朗普政府不在意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倾向于在能够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领域采取主动行动。这种立场降低了中美之间发生全面意识形态对抗的风险，并且为两国在部分领域开展有条件的合作创造了空间。

第三，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导向未变。

在特朗普新现实主义外交的框架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导向并未弱化，只是将经济竞争与军事准备同步置于遏制中国获取地区及全球主导权的核心位置。虽然 2025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直接提及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但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重视程度并未减弱。报告唯一一次提及“战略竞争”是在“遏制军事威胁”部分，其中强调“维持有利的常规军事平衡仍是战略竞争的关键要素”，并且在同一部分表达了工具化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对华战略博弈筹码的意图。

在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围绕对华战略竞争主要提出了四个核心目标：其一，确保盟友经济体不会沦为中国的附庸；其二，协调盟友和伙伴的行动，维护共同的利益，防止中国获取主导权；其三，阻止对台湾的“占领”行为；其四，保持南海海上通道畅通。在相关表述中，报告或使用“竞争国家”“竞争大国”等隐晦代指，或者直接不点名具体对象，但结合特朗普政府以前的政策语境与战略指向，实际上都针对的是中国。

在经济竞争之外，通过军事实力构建对华威慑体系也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一环。报告将“以实力求和平”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将军事实力视为最好的威慑手段。特朗普政府并不追求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而是将军事能力赋予功能化定位。在关于印太地区的部分，报告强调美国要保持在第一岛链及关键海域的常规优势，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增加军事投入，并且在长期的经济与技术竞争中取得胜利。

报告也强调，美国“必须阻止其他国家实现全球性乃至某些区域性的霸权”，但也并不会去“遏制所有大国和中等强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具备在经济领域挑战美国霸权并影响其盟友的相应实力。结合特朗普政府对经济影响力的重视，加之报告显著淡化了对俄罗斯的威胁定位，且在涉及印太地区的部分高度聚焦中国，这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将资源配置聚焦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导向。可以推测，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重心在于阻止中国获取全球性霸权或印太地区的区域性霸权。

因此，特朗普新现实主义对中国定位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弱化，而是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方式与目标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特朗普政府不谋求与中国开展冷战式对抗或热战，而是聚焦长期性的经济主导权与地区影响力竞争。这一转变既为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关系实现相对稳定与有限合作创造了条件，也将中美战略竞争推向更加制度化与长期化的博弈轨道。

第四，重新定义盟友的角色，转向以效益导向、条件性激励与负担转移为核心的同盟治理模式。

在 2025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了“负担分担与负担转移”的原则，要求盟友“承担起本地区的主要责任，并为集体防卫作出更大贡献”。在文本中，特朗普政府提出了落实这一原则的具体政策工具，包括在商业事务、技术共享、国防采购等方面为愿意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国家提供回报，同时通过构建制度化的“负担分担网络”来确保相关安排的可持续性与合法性。

在实践层面，特朗普政府推动北约成员国达成了“海牙承诺”，要求各国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同时，在与日本、韩国等非北约盟友的双边外交互动中，特朗普政府也明确提出了提高国防开支的要求。

这种同盟治理模式的转型势必会引发盟友的不满，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放弃既有的同盟体系，而是转向了一种更考虑效益的工具化利用模式。从美国同盟体系的内在结构来看，其相互依赖关系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特征。盟友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盟友的战略需求。这种不对称性对盟友的政策选择造成了结构性约束，从而为特朗普政府推行负担转移策略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基础。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对盟友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在经贸领域的强硬施压，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日本等盟友寻求战略对冲，选择改善对华关系。但 2022 年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构成了重塑美国盟友战略偏好的关键外部变量。

对北约盟友而言，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对印太盟友而言，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也使其产生强烈的安全焦虑。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对美国的要求存在不满，但盟国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性的安全保障提供者，也无法在国防工业体系与供应链上迅速重构其战略自主性。

因此，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施压，盟友更可能在政治经济成本与安全战略需求之间做出取舍，选择对特朗普要求的妥协，而非彻底脱离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虽然这会加剧盟友与美国之间的离心倾向，但在短期内将会显著提升美国同盟体系的资源整合效率与任务执行能力。

从战略影响的维度来看，在短期层面，这一调整能够让美国减轻在同盟体系中的负担，从而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其认为更关键的战略竞争领域，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的对华战略竞争上。同时，盟友被动承担更多责任后，同盟体系整体上在特定任务上的运作效率与战备能力也有望得到提升。

但从长期来看，盟国内部的政治分歧与财政压力将会持续累积，同盟体系的凝聚力将会不断损耗。一旦外部安全威胁出现淡化趋势，缺乏共同价值纽带与利益共识支撑的同盟体系，或将难以为继。

【特朗普 2.0 一周年】

特朗普“情定”格陵兰，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李品保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北极，这个曾经象征科学合作与环境保护的典范，如今正演变为地缘政治对抗的焦点。美国近期在北极战略上的步步紧逼——从对格陵兰岛的不懈图谋到区域军事化部署——暴露出其从多边合作转向单边主导的危险倾向。这种根植于单边行动和霸权逻辑的路径，不仅威胁北极稳定，也危及全球秩序的根基。

在战略定位上，美国已将北极视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地缘舞台。其《北极地区国家战略》（2022）及《2024 年国防部北极战略》均将“安全”与“战略竞争”置于优先位置，并明确将俄罗斯和中国标注为竞争对手。这清晰地表明，美国看待北极的视角已从“需要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区域”转变为“维系全球霸权的战略支点”。

美国政府的行动早已超越言论层面。2025 年美国副总统万斯未经邀请突访位于格陵兰岛的美军基地，配合特朗普总统“不惜动用武力”夺岛的威胁言论，昭示着其刻意绕开丹麦主权的战略意图。

同时，美国借助《红白蓝地法案》（Red, White, and Blueland Act of 2025）规避常规外交渠道，直接投资格陵兰关键矿产项目，并部署 F-35 战机群至该区域，所有这些都冠以“国家安全需要”之名。这种多维施压诠释了美国的战略转向：北极越来越不像共同治理的空间，而更像是待攫取的“战利品”。

此类行径折射出“美国优先”思维驱动的强大政治逻辑，与国际社会期待的合作精神背道而驰。其危害体现在以下四个关键方面：

第一，撕裂多边治理机制。北极理事会作为该地区气候、生态与原住民事务的核心治理平台，正在美国施压下分崩离析。通过胁迫北约盟友配合其议程，并以“安全”为由排挤非北约成员，美国加速了理事会的瘫痪进程。俄罗斯和芬兰相继退出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进一步印证了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削弱重要的区域合作框架。失去这些合作平台，针对北极变暖等议题的协同应对，以及对脆弱社区的支援都将陷入停滞。

第二，助长危险的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美国正将格陵兰岛上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快速改造为一个永久性进攻枢纽。这种单边安全追求加剧了区域军事对抗，迫使各方重新评估其安全边界，引发紧张局势螺旋式升级。其恶果是，北极正面临沦为核冲突引爆点的风险。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中，哪怕出现一次误判，都可能引发超出北极圈范围的危机。

第三，破坏国际法与基于规则的秩序。美国通过政治和军事压力挑战丹麦对格陵兰主权的完整性，同时却在“航行自由”和总体“国家安全”的旗号下，为其自身在北极的军事扩张辩护。这种对原则的选择性适用形成了双重标准——尽管中国在格陵兰矿产领域的投资纯属商业行为，美国仍以“安全威胁”为由加以阻挠。这种对合法经济活动的“安全化”操作，侵蚀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信任基础，将北极变成强权规则的角力场，而非共同规范治理的空间。

第四，动摇全球秩序稳定。美国通过向北约盟友丹麦施压来试探同盟体系的边界，暴露出跨大西洋联盟信任关系的脆弱一面。连锁效应已然显现，北极利益攸关方各有反应：德国、法国等欧洲北约成员国以应对区域威胁为由启动对格陵兰的侦察行动，其他北极及近北极国家则被迫在大国竞争升级背景下重新评估其安全与合作框架。当美国将“美国优先”置于共同安全之上时，世界正被推回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

关键在于，美国的北极战略本身就存在缺陷。将北极视为待争夺的“战利品”，使得美国有时忽视了一个现实：北极变暖正是更广泛的气候变化趋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直接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气象模式与沿海城市。美国声称要维护“稳定”，但其行动却在制造所要防止的动荡。

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和负责任大国，始终倡导构建基于规则的北极治理。通过“冰上丝绸之路”、联合科考及对北极理事会的支持，中国证明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于合作而非对抗。相比之下，美国战略则是过时世界观的产物，终将事与愿违。

北极不是大国博弈的棋盘。它是人类共同遗产，是原住民家园，是地球气候调节器，也是全球贸易通道。美国选择将其军事化并排挤他国，绝非实力的体现，而是让世界更加分裂、更不安全、更难应对气候危机的战略误判。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摒弃美国的单边行径。主权原则、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应当得到维护——这正是北极治理数十年的基石。唯有通过包容性对话，我们才能确保北极的未来是和平之地而非战争舞台。

中国秉持以国际法为根基、以科学合作为纽带、以主权尊重为准则的立场，为北极参与提供了建设性方案。随着北极加速变暖，世界绝不能任由大国竞争凌驾于集体行动之上。前行之路需要克制、透明，更需要回归指导北极治理的核心原则：合作而非对抗，规则而非武力。

*文章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刊登于 CGTN 官网。

【特朗普 2.0 一周年】

面对特朗普步步紧逼，欧洲盟友仍将忍气吞声

徐伟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6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已满一年。在这一年中，美国对盟友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遇了显著而深刻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危机、经贸摩擦、防务分摊与北极事务等多重议题上，奉行更具单边主义色彩的强硬策略，并在关键磋商中屡次绕开传统盟友。这不仅颠覆了以往基于规则与协商的协同治理模式，更加剧了跨大西洋同盟内部的裂痕。

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以“越顶外交”的思维主动与俄方直接接触并商讨停火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美方未提前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调，而是在美俄双边商定方案后，直接向乌克兰及欧洲国家施压逼其接受。这种行事方法严重忽视了欧洲盟友在涉及自身安全事务中的战略关切与政治自主权。

在经贸问题上，华盛顿不加区分地对盟友加征高额关税，导致跨大西洋供应链成本的上升与经贸摩擦的加剧。例如 2025 年 3 月宣布对欧洲进口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4 月又针对欧盟和英国出台“对等关税”措施等。即便经过一系列谈判，欧盟与美国最终达成的贸易协议仍规定，美国对所有欧盟商品维持 15% 的关税水平，这对欧洲国家造成了沉重负担。

在防务问题上，特朗普展现出了模糊立场，这尤其体现在对北约集体防卫承诺的态度上。他甚至威胁北约盟友如果未能履行财务义务，将得不到美国的安全保护。美国政府明确要求北约盟友大幅提升国防相关支出，并在 2025 年 6 月的北约峰会上，迫使盟友接受将防卫开支提升至 GDP5% 的“海牙承诺”。这一目标远超现有水平，将进一步加重欧洲盟友的防务负担。

更具颠覆性的是美国围绕格陵兰的一系列言辞与动作。特朗普公开讨论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取该岛屿，甚至暗示可能动用武力夺取。尤其是在 2026 年 1 月公然入侵委内瑞拉后，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将成为美国的干预对象，宣称掌控格陵兰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此外，特朗普还动用关税手段向反对其图谋格陵兰的欧洲盟友施压，对立场不一致的国家加征关税。这些举措直接触及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底线，引发了丹麦及北约多国的强烈不满。同时，北极问题已经从资源与环境治理维度，升级为大国地缘政治的潜在爆发点。

从本质上看，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的图谋，是对北约盟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这一举措将会产生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第一，对北极相关治理体系的冲击。

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将进一步加剧北极治理的停滞与分裂。长期以来，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依靠北极诸国求同存异的共识开展功能性合作，构建了相对稳定的区域治理框架。美国对丹麦的强硬施压，将严重削弱其他北极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这可能导致北极治理从制度化合作退回到大国权力博弈的状态，区域公共治理能力与公共产品供给将遭到实质性削弱。

第二，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冲击。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对盟友的领土主权进行公然干涉与胁迫，具有极强的规则破坏性与负面示范效应。此种行为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以武力侵害他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的核心准则，并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小国家传达一个危险信号：强权能够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凌驾于国际法与多边规范之上，而现有机制都无法约束其肆意妄行。

事实上，当前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社会对普遍规则的遵守以及多边机制的程序正当性。当具有显著军事与政治影响力的行为体公然无视这些基本规则时，规则本身的权威便不可避免地遭受侵蚀，进而动摇国际秩序的根基。再加上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即便其采取军事手段夺取格陵兰岛，安理会也无法达成共识对其行动实施限制或惩戒。由此产生的现实后果是，国际规则的执行不再取决于规则本身的公正性，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与权力意志，国际法的规范性作用在实践中被权力政治的逻辑所替代。

第三，对美国同盟体系的冲击。

对盟友主权的胁迫，直接侵蚀了同盟关系赖以维系的信任基础，使北约及更广泛的美国同盟体系面临解体危机。此前美国入侵委内瑞拉时，西方国家还能通过污名化马杜罗政权合法性的方式，为美国的行径进行辩护，从而避免直接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但在格陵兰问题上，丹麦及格陵兰在意识形态上完全符合西方价值标准，丹麦更是美国同盟体系的正式成员。与此前美国对盟友的各类施压不同，主权胁迫触及同盟伦理与条约承诺的核心底线，可能在联盟内部引发前所未有的分裂与信任危机。

欧洲国家难以再用意识形态或政策差异为美国的强权行为合理化，从而不得不重新评估盟主的可靠性。丹麦等国的强烈反应表明，当盟友感受到来自同盟内部的主权威胁时，这些国家开始怀疑条约机制与集体安全承诺的有效性，进而重新审视自身的战略定位。这些国家可能因此加强对战略自主化的追求，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逐步探索替代性的安全与外交方案，以降低未来遭遇类似主权胁迫时的脆弱性。

尽管格陵兰危机及特朗普政府的强硬言行在欧洲引发强烈反弹，但从现实安全格局、物质基础与财政约束，以及欧洲政治结构的短期演变趋势来看，欧洲盟友大概率仍将选择忍气吞声而非与美国决裂。因此，跨大西洋同盟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全面瓦解的可能性较低。

做出这一判断的核心原因有三。

第一，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依然是欧洲国家安全政策的决定性约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仍在继续，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威胁仍然显著。即便部分欧洲国家在外交层面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举措，但真正脱离北约或与美国全面决裂，将迫使这些国家在短期内独自面对一个军事能力远超其现有水平的对手。因

此，欧洲国家更可能选择在安全领域继续依附美国，同时在外交层面采取绥靖式的应对，避免立刻陷入安全真空。

第二，欧洲盟友短期内缺乏实现战略自主的物质基础。特朗普政府的系列举措确实刺激了欧洲盟友追求战略自主的意愿，但当前欧洲在财政与军工体系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这种意愿的实现。在财政层面，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欧洲国家长期面临财政困境，难以在短期内为大规模军费扩张提供可持续的财政支撑。在军工体系层面，欧洲盟友长期高度依赖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在军事装备研发、生产制造及供应链自主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短期内难以重构独立的军工体系与军事力量。因此，即便政策意愿发生转向，物质能力的滞后也使欧洲国家战略自主的意愿难以快速实现。

第三，欧洲内部的右倾化与跨大西洋政治共鸣，可能抑制盟友脱离美国同盟体系的倾向。特朗普政府明确支持欧洲内部的极右翼势力，试图构建跨大西洋的右翼联盟，以此巩固美欧之间的意识形态纽带。对于右翼势力而言，特朗普强调本国利益优先和反对全球化等主张能够引发他们的共鸣，格陵兰问题难以成为动摇其与美国关系的关键议题。

从欧洲各国的表态来看，相比于明确表达反对态度甚至宣布向格陵兰岛派遣士兵的国家，由极右翼势力执政的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的表态较为克制。随着欧洲内部在主权、移民等议题上的立场日益右倾化，极右翼政权可能成为维系跨大西洋联系的重要纽带。只要自身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直接挑战，这些右翼政权大概率将继续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文章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刊登于 CGTN 官网

【特朗普 2.0 一周年】

美联储政策是否会“换人换路”？

——三种可能影响情景与应对

区富祝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美联储换帅背后的政治压力与全球关切

近期美联储主席的更替议题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因为这已不仅是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常规调整，更是一场关系到全球金融权力结构的再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储备，提升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化涉及的不只是应对外部政策冲击，更触及长期战略目标，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体系自主性，并逐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转变。

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新任美联储主席可能重新定义美元的利率节奏、资产负债表管理方式及与财政、大国竞争之间的政策互动，中国必须正面审视这一不确定性，防止外部周期牵动国内政策空间，避免在全球金融博弈中处于被动。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双重约束的视角出发，浅析白宫与美联储博弈下未来美联储政策的可能走向、美元霸权的可能演化趋势，并进一步从国际经济影响机制、外部风险——机遇传导链条及与国内经济相互作用关系三个层面展开情景分析。

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其领导层变动往往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沟通框架及金融监管理念的潜在重构，市场预期随之调整，汇率、利率与资本全球流动也可能发生阶段性乃至趋势性波动。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化涉及的不只是应对外部政策冲击，更触及金融体系自主性、人民币国际化等长期战略目标。

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将于 2026 年 5 月届满，特朗普政府预计在达沃斯论坛之后正式公布新任美联储主席提名，以尽早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目前，美联储主席更替已进入实质博弈阶段，并呈现高度政治化特征。美国国内政策方向与全球金融格局可能随之迎来再定价窗口。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司法部近期就美联储总部翻新项目的相关言论罕见地向现任主席鲍威尔发出传唤。鲍威尔反击称，这是对其未迅速降息的政治报复。这一事件迅速激化了矛盾，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已发出警告，在调查未决之前，任何美联储提名人都将面临最为严苛的审查。

美联储主席人选之争随即再生变数。特朗普改口暗示，他或许希望留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让其继续担任现职。1月21日，预测市场平台 Kalshi 的数据显示，沃什目前被提名的概率提升到了第一位（47%），而里德尔获提名的概率则大幅上升至第二位（25%），第三位是沃勒（13%）。而在此之前，特朗普曾强调下一任主席需拥护其大幅降息议程，并宣称“任何不同意我观点的人，都不会成为美联储主席”，引发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受损的深刻担忧。

在此逻辑下，华尔街倾向认为特朗普的核心考量将围绕“政治忠诚”与“政策可行性”展开权衡，人事结果或将重塑白宫与美联储关系，使货币政策面临政治化加深风险。

美联储主席提名充满不确定性、政治化特征强化、独立性争议升温，美元政策方向及全球金融风险偏好将因此进入观察期。这意味着中国外部金融环境可能更趋复杂，既包含风险暴露，也蕴含战略机会。我们需要厘清以下问题：围绕美联储主席提名，白宫与美联储博弈的本质与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走向将怎样？此次美联储换帅，对美元霸权本身的影响多大？是结构性的还是暂时性的？结合中国国际金融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如何应对？

二、美联储换帅，将如何影响美元霸权？

（一）围绕美联储主席提名的博弈，将沿着国家意志方向达成新的均衡

近年来，美国的内外政策趋势表现为“美国优先”。这一政策强调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自主性。美联储的决策，尤其是在主席提名和货币政策方向上，往往会受到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特朗普时期，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不仅仅是人选问题，还涉及是否能适应“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框架。因此，未来美联储在某些方面不再单纯以全球经济稳定为目标，而是更多地服务于美国国内的经济诉求，包括财政可持续性、产业回流、资产市场稳定等。

当前，美国财政利息支出攀升，长期高利率不可持续。美国债务规模已从2019年约22万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约35万亿美元，债务/GDP自约105%升至123%。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从约8%升至约15%，预计未来仍有继续走高趋势，如表1所示。

指标	2019	2022	2024	2025—2030 (预测)	政策含义
联邦债务 (万亿美元)	22	31	35+	持续上升	高债务常态化
债务 / GDP	~105%	~120%	~123%	>115%	财政脆弱性增强
利息支出/财政收入	~8%	~12%	~15%	>18%	对高利率高度敏感

表 1 美国联邦债务与财政压力（数据来源：FRED、CBO、美国财政部财政数据）

高债务与高利率共存将带来财政脆弱性快速累积，长期维持高利率会迅速加剧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这种趋势反映了美国对其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这将推动美联储政策的重新调整。

重新调整并不等于美联储完全放弃其独立性，而是在更大的政治压力下寻求平衡。美联储依然受经济数据、金融市场、政治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它的政策决策在通胀、就业等基本目标的框架下运行。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决策过程中会加以考虑美国的国内经济周期、选举周期等因素，体现出一种妥协式的均衡。

如表 2 所示，美国通胀虽明显从高位回落，但核心 PCE 物价指数^[1]、服务价格等与就业和租金相关的黏性通胀仍处于高位区间，未回落至 2%目标水平，近期核心 PCE 物价指数处于 2.6%—2.8%区间，服务通胀率高于 3%，5 年通胀预期维持约 2.3%—2.4%，尚未完全回归锚定状态。

与此同时，AI 技术扩散带来就业结构变化。传统意义上，降息应刺激资本开支与就业，但当前形势下，企业更可能借低成本资本加速 AI 替代人工，这使降息的“稳就业”功能弱化，并可能增加宽松政策决策的复杂性。

指标	2023	2024	2025（最新区间）	政策含义
CPI同比	3.0%—4.0%	3%左右	2.5%—3.0%	通胀回落但仍高于2%目标
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	3.5%	2.8%—3.0%	2.6%—2.8%	美联储最关注指标，黏性明显
服务通胀	>4%	>3.5%	>3%	与工资、租金高度相关
5年通胀预期	~2.3%	~2.4%	~2.3%	未明显脱锚，但高于目标

表 2 美国通胀关键指标（2023—2025 年，近似区间）（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FRED。）

此外，银行与房地产风险尚存，要求“稳利率、托流动性”。2025 年美国银行体系仍存在未实现亏损（约 3371 亿美元），并面临期限错配压力^[2]，虽较 2022 峰值下降，但风险未出清。同时，美国商业地产办公空置率在 12%—14%高位运行^[3]，再融资周期集中叠加高利率环境，使违约风险具有潜在放大性。

在美国国家意志主导下，美联储会更多关注如何确保经济稳定，特别是面对长期的财政赤字、制造业空心化、债务上升等问题。此时，美联储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部分，可能会逐步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寻求应对财政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通胀和就业目标，还会考虑如何支持美国的国内经济动能，例如通过促进产业回流、刺激消费和投资等。

[1] 该指标通过剔除食品（占比约 8%）和能源（约 5%）价格的波动影响，反映个人消费支出的基础通胀趋势。

[2] 数据来源：FDIC，《Quarterly Banking Profile Q3 2025》。

[3] 数据来源：CoStar，《CBRE Q3-2025 Commercial Property Reports》。

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调整利率、控制通胀、稳定就业的过程中，也将适度回应政治因素与市场预期，从而在多重压力下调整政策路径，最终实现一个适应美国国家意志的新均衡。

美联储政策的转向也将影响全球资本流动与美元的信用基础，尤其是在美元依赖度较高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国国内政策的倾斜和美联储决策的改变，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外汇储备和资本流动产生波动。此时，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不对称的“新均衡”。

（二）美元霸权的可能演化趋势

美联储主席更替背后实际牵动的是美元霸权制度的韧性。当货币政策逐渐嵌入政治逻辑，美元全球信用定价机制将面临新周期的重构。美元国际地位仍具强基础，但“稳霸权—弱信用—高波动”的特征正隐约浮现。

1. “信用弱化—需求惯性仍强”或将成为美元霸权的新常态

美元的霸权主要依托三根支柱：全球贸易与能源结算体系、流动性强的美债市场、全球范围的美资产偏好。当前这些基础尚未动摇，因此美元霸权短期不会根本性逆转。然而，政策政治化、财政赤字长期化推高未来通胀预期，将导致“储备弱分散化+地位强惯性化”的并存格局。即美元信用边际走弱，但短期难被替代；美债仍是全球资产配置“不得不买”的品种；储备货币多元化趋势增强但节奏缓慢。

2. 财政与货币边界模糊化可能削弱全球信任锚

未来宽松若更多由政治周期触发而非经济指标，美元将面临“降息换流动，债务换时间”的结构性风险。一是美债规模扩张使得对宽松依赖增强；二是货币逐渐成为财政融资工具；三是市场长期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来承接美债。此过程不会突然爆发，但信用侵蚀将呈现缓慢—持续—不可逆的特征。美元霸权或从稳固型霸权迈向波动型霸权。

3. 全球储备体系或从“美元主导”走向“美元+组合化”

各经济体在风险管理逻辑下将更强调资产结构安全性，多极化趋势强化。黄金、大宗资产持有比重可能上升。人民币、欧元、日元等替代品在区域内使用提高。更多央行可能建立“美元+非美元”双轨储备体系。美元不会被取代，但单极化秩序松动，国际货币格局将更趋网状化与碎片化。

若美联储独立性弱化，美元风险波动可能外溢全球

货币政治化加剧将带来多层影响。短期内，降息将提高流动性，美元走弱、商品走强，新兴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中期范围内，若财政主导强化，美债利率上行压力持续，美元或将出现双向大幅波动。长期来看，美元信用稳定性将下降，储备多元化使美元全球定价权逐步减弱。

未来，美元或不再是“强者恒强”的霸权，而是周期性震荡中维持主导，但缺乏过去那种一锤定音的稳定感。

三、对中国有何影响？

（一）中国国际金融政策长期战略视角下的影响

从中国国际金融政策的长期战略目标来看，美联储主席更替构成以下重要外部影响：

首先，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看，未来中国力求增强人民币跨境定价与结算功能，与美元主导的全球结算体系形成差异化与可替代体系；而新任美联储主席如倾向强势美元或主动压降利率以刺激经济，将改变全球货币利差与资金配置偏好，直接影响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与跨境使用空间，人民币国际化需更加注重策略节奏与制度支撑强化。

其次，从构建金融自主性与安全屏障的角度看，中国长期目标之一是提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抵御外溢冲击能力，而美联储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会强化外部变量对我国金融稳定的牵引效应。例如，若美联储未来出现政治化倾向并加速货币周期反转，全球资金流向可能剧烈波动，倒逼新兴经济体防御性加息或资本管控。这就要求我国加快构建多层次金融稳定机制，巩固外汇储备安全体系与跨境流动调节能力。

最后，从参与并塑造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战略角度看，作为全球金融规则核心制定者，美联储的政策理念与国际沟通方式，会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议程设置。中国长期目标是从体系参与者迈向规则塑造者，而美联储主席更替可能改变国际金融沟通结构与联盟格局。如若美方输出更具政治色彩的利率与流动性政策，全球治理可能呈现“美元优先化”强化趋势，中国推进多边金融合作、推动区域清算体系建设及货币互换网络扩展的难度与策略空间将随之变化。

（二）分情景下的影响分析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特朗普行政风格与人事安排可能强化政治因素参与的背景下，市场波动性与预期敏感度或显著上升，制度稳定与政治扰动将并行存在。

我们可能面临以下三种情景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一是低扰动情景，即制度压倒政治、政策方向延续基准趋势；二是中扰动情景，这一情景最可能出现，即政治影响存在但未突破制度底线；三是高扰动情景，即尾部风险，金融政治化显性上升。

1. 低扰动情景（制度压倒政治、政策方向延续基准趋势）

在该情景下，新任美联储主席虽更替，但货币政策仍以技术判断与制度约束为主，政治干预相对克制，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内部形成稳定多数，市场对政策预期可控，美元信用未受明显挑战。此时，美联储政策延续当前趋势——通胀回落背景下利率高位缓降、节奏按数据推进，不出现方向性激烈转折。

此情景适合中国利用外部温和期推进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以稳为主、以改为先。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外部金融环境边际缓和，汇率压力减轻但难以形成持续升值动力。人民币双向波动更具稳定性，贬值压力弱化但不转为单边强势。

第二，资本流动与资产定价压力下降，市场预期可控。外资波动性减弱，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第三，出口与对外需求节奏趋于平缓，外部拖累有所减弱但无法形成强刺激。全球利率回落有助于需求斜率放缓，而非呈现明显反转。

第四，总体影响偏“托底”而非“拉升”。外部环境改善为国内政策操作争取窗口，但外部利好难直接转化为增长动能。

2.中扰动情景（现实中最可能，政治影响存在但未突破制度底线）

政治因素频繁介入话术层面，美联储政策路径仍以数据与制度为基本约束，但沟通风格与预期可能更具波动性。特朗普公开施压降息、提名亲近主席候选人，但最终仍需 FOMC 内部形成多数。市场将更多关注言论与提名信号，预期波动提升、价格反应提前化。

此情景是最应重点准备的主情景，中国需强化预期管理与资本流动监测，防止短期波动向实体经济传导。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汇率与跨境资本波动扩大。短期资本更敏感，人民币可能阶段性承压，但趋势依赖中美利差与基本面而非单向变动。

第二，金融市场风险溢价提升。全球资产可能进入高频震荡，A股、债市、汇市对外部消息反应增强，需警惕情绪化行情。

第三，资本流动呈“短快敏”的结构性状态。长期配置资金保持观望，短期套利资金活跃，需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第四，政策沟通成为关键变量。若外部扰动传导叠加国内预期不稳，可能影响居民与机构风险偏好。

第五，对中国出口、融资、外债成本的影响方向不变，但波动放大。即趋势稳定但“抖动幅度变大”。

3.高扰动情景（尾部风险，金融政治化显性上升）

美联储独立性受到明显侵蚀，货币政策出现政治化倾向。若极端宽松或降息时间点脱离数据基础，可能压制美元信用，引发美债期限溢价抬升甚至阶段性抛售。美联储若以政治目标优先执行降息，被市场解读为牺牲长期通胀治理，可能引发美元霸权层面的信心动摇，全球避险升温。

这一情景发生的概率较低，但需预先储备应对工具和制度韧性。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更具复杂性和系统性：

第一，全球避险情绪上行，资本可能快速回流或撤出新兴市场形成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显著放大，央行需强化稳预期措施。

第二，跨境资本管控面临更高要求，短端资金流动性敏感度提高，中国需加强外汇储备调度与逆周期调节工具使用。

第三，国际结算体系与美元金融基础设施出现结构性不确定，将倒逼中国加快多元结算体系建设和人民币跨境使用。

第四，全球金融周期剧烈震荡时，国内资产价格会更易放大外部冲击，股债汇联动风险上升。

第五，长期视角下，这反而形成人民币国际化与制度型开放的倒逼机遇，但必须以风险安全为优先进提。

四、中国应如何应对？

中国的应对策略需从“外部趋势+政治扰动”双维考虑，区别低扰动、扰动放大、高扰动三类情景，形成分层式政策储备。确保国内政策具有稳预期、稳风险、稳增长的自主空间，实现外部冲击下的韧性抵御。

在低扰动情景下应侧重稳政策、促改革、托底预期；在中扰动情景下则强调稳波动、稳资本、稳金融传导；高扰动情景下要着力稳底线、固韧性、强体系自主。

（一）低扰动情景下的对策

这一情景下，外部趋稳、扰动有限、窗口期可利用，因此政策取向可以以稳为主，借机推进改革，利用外部压力缓和期提升内部经济修复能力。政策目标应包括对冲外部摩擦、托底预期、换取改革时间等。

一是坚持货币政策以国内目标为锚，不跟随美联储节奏。以国内通胀、就业、信用扩张为主要依据，减少对外部利率变化的短期反应；淡化单纯总量宽松或紧缩的周期性争论，加强精准滴灌、结构性支持。

二是利用国际利率高位回落阶段推进结构性改革。将外部环境阶段性缓和视为“低成本改革窗口”。重点推进房地产风险出清、地方财政体制重建、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完善等中长期任务。

三是提升资本市场中长期资金占比。完善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入市机制，形成“稳资金结构、稳估值基础”的市场底盘，减少对短线跨境资金敏感度。

四是稳住汇率预期，强化双向波动常态化认知。通过明确政策沟通与逆周期因子应用，避免市场形成单边预期，提高汇率政策的稳定锚定作用。

（二）中度扰动情景下的对策

这一情景在未来最可能发生，也就是政治言论频繁、波动放大。对此，政策取向要稳预期优先、防止波动向金融体系传导，增强逆周期调控灵活性。政策目标应包括稳波动、稳信心、防外部波动向内放大，是当前最重要策略方向等。

一是强化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与逆周期管理。完善跨境资金预警系统，重点关注期限错配与杠杆资金。通过宏观审慎工具“削峰填谷”而非一刀切收紧。必要时动态调整跨境融资杠杆、外债风险准备金等参数。

二是加强政策取向一致性与前瞻指引。外部噪声大时减少模糊表述，保持政策信号清晰。提前公布利率、汇率、资本管理的边界与底线。对市场误读及时纠偏，降低情绪与舆情放大效应。

三是开展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联动压力测试。针对短期冲击路径与金融脆弱环节开展高频压力测试，为可能出现的快速资金流动、汇市波动预留应急操作空间。

四是稳信用稳融资，防止市场波动传导到实体经济。通过政策性工具保障中小企业与科技创新融资不断档，避免外部扰动形成内部信用收缩。

（三）高扰动情景下的对策

这一情景存在高尾部风险，金融政治化导致金融市场发生剧烈波动。

相应的对策取向应以金融安全为底线，在极端波动下确保系统韧性与战略自主。政策目标则是守底线、防系统性风险、为人民币国际化与自主空间赢得战略主动。

一是将金融安全置于宏观政策优先级首位。高波动阶段应以稳体系、稳资金链为首要任务，适度提高对短期波动的容忍度，防止过度顺周期应对导致风险内生。

二是加快外汇储备与国际结算体系多元化布局。优化储备资产结构与币种配置。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与本币结算网络。强化自主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性与可替代性。

三是完善极端情景下财政－货币－监管三方协同机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缩短决策链条，在极端情况下可采取临时政策组合以维护金融稳定。

四是为潜在美元信用波动准备长期制度性应对方案。包括能源、原材料、战略产业链进口支付体系备份机制，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双边本币互换网络拓展，培育人民币定价能力。

【特朗普 2.0 一周年】

欧洲能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吗？

郭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2026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第 62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超过 60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约百位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及来自约 120 个国家的千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在俄乌战争以及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受到考验的大背景下，出席本次会议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分别就乌克兰战争表达并交流了各自立场。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四年之久。双方伤亡总数超过两百万。巨大的破坏规模凸显了局势的紧迫性。对于欧洲领导人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特朗普政府显著减少对安全承诺与投入的情况下，欧洲能否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采取行动？

虽然自 2025 年 6 月以来，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但欧洲仍然没有组织任何针对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干预。欧洲在集体安全问题上行动迟缓，其制度性根源显而易见。

欧盟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结构，防务体系高度碎片化。欧盟现役大约有 178 种不同的武器系统，而美国约为 30 种。欧盟 2017 年的一份文件指出，欧洲拥有 20 种战斗机（美国为 6 种）、29 种护卫舰（美国为 4 种）、17 种主战坦克（美国只有 1 种）。正如一篇欧盟政策分析报告略带讽刺地指出：

“欧洲的直升机生产商数量，甚至多于有能力采购它们的政府数量。”

欧盟常以多样性自豪，然而在战场上，多样性往往意味着重复建设、互操作性不足、后勤效率低下等结构性弱点。武器平台的高度繁杂意味着，即便欧盟在政治上具备建立统一军队的意愿，其仍将面临巨大的技术、产业以及政治经济层面的障碍。统一采购标准、整合分散的指挥系统与军工产业、克服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往往需要数十年之功。只要美国仍在北约框架内充当可信的安全保障者，欧洲国家就很难有足够动力去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欧盟军事体系。

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承诺的显著收缩，终于为欧洲敲响了警钟。多年来，欧洲在战略上处于某种“脑死亡”状态。但如今，欧洲领导人似乎终于意识到，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已沉睡太久了。若要维护集体安全、保有战略自主，欧洲必须在为时未晚之时，针对俄乌冲突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这种重新觉醒的紧迫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尤以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的发言最为突出。

马克龙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长达 30 分钟的演讲，语气格外迫切：“欧洲必须学会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他的愿景显然超越了传统的法德双边框架。“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作为欧洲来思考和行动……我们必须在欧洲尺度上进行思考。”马克龙的核心信息十分明确：欧洲的安全战略必须走向制度化。

斯塔默将欧洲称为一个“沉睡的巨人”。他还指出，欧洲“必须建设硬实力，因为在这个时代，硬实力就是通行的货币”。斯塔默对防务能力与威慑力量的强调，反映出欧洲人正在形成的共识：价值观本身并不足以捍卫自身，而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实力，才能得以支撑。

默茨的发言更具颠覆性。他直言，“美国的领导地位主张已受到挑战，甚至可能已经丧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已不再以原有形式存在”。他宣布，德国将把国防开支目标提高至 GDP 的 5%。同时，他还透露，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建立“欧洲核保护伞”的可能性——这一构想在几年前的柏林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默茨还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美国划清界限。他表示：“MAGA 运动的文化战争不是我们的文化战争……言论自由在我们这里是有边界的。我们不相信关税和保护主义，而相信自由贸易。我们支持气候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发言。鲁比奥将跨大西洋关系置于“西方文明”的叙事下，在相当程度上重新赢得了欧洲听众的共鸣。鲁比奥没有像万斯在去年的会议上那样居高临下地向欧洲人“讲课”，也没有将欧洲战略迟疑简单归咎于布鲁塞尔的官僚体制，而是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危机”。

鲁比奥将美国称为“欧洲之子”，强调双方在文化、制度以及基督教信仰上的共同纽带：“我们在精神上相连，在文化上相通。”他还将特朗普过去对欧洲的批评，重新诠释为一种家庭式、兄弟式的关怀：

“归根结底，我们的命运始终与你们交织在一起……我们深切关心你们的未来，也关心我们的未来。”

在鲁比奥看来，欧洲的问题并不主要源于经济停滞或制度缺陷，而是一场更深层的精神危机：欧洲“被负罪感与羞耻感所束缚”，将自身的自信、阳刚之气与意志力拱手让渡给左翼和“觉醒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判断在他随后的一段讲话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

“我们所想要的盟友，不应因恐惧而陷入瘫痪。我们唯一的恐惧，是担心无法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更自豪、更强大、更富裕的国家；我们需要的盟友，能捍卫人民、维护利益、保有塑造自身命运之行动自由，而不会为了运营全球福利国家、为所谓的历史罪责赎罪；不会让自身力量被外包、被约束或从属于其无法掌控的体系；不依赖他人满足国家生存关键需求；不会假装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众多选择之一，并在行动前还要向他人请求许可。”

很大程度上，鲁比奥的演说重新界定了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叙事。欧洲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被动并非仅仅源于制度或能力不足，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明自我否定。鲁比奥描绘了一幅西方文明衰落的图景：因为过度包容、对人性过分天真、在自我防卫上日益松懈，欧洲在逐渐失去活力。

然而，这种叙事是否能唤醒欧洲这头“沉睡的巨人”，仍是未知数。从迄今为止欧洲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实际行动来看，欧洲国家充其量只是谨慎应对，甚至可以说仍然在战略上犹疑不决。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斯塔默宣布，英国将部署航母打击群至北大西洋和“高北地区”（北极地区）。但他并未具体说明将对俄罗斯军队采取何种直接行动。马克龙的立场同样相对克制。尽管有俄罗斯

情报来源声称法国已承诺提供 100 架“阵风”战机，并授权私人军事公司协助乌克兰，但法国武装力量对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度仍然有限。默茨提出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并探讨加入法国主导的欧洲核保护伞，姿态显得雄心勃勃、颇为进取。然而，德国的防务战略总体上仍然以防御性为主，而非主动干预。

各国政府言辞与行动之间的落差表明，欧洲仍未全面觉醒，依然处于谨慎调整阶段。一方面，欧洲国家确实在推动更高层次的战略协同，并在实质性地提高军费投入；但另一方面，他们依然在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

除了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结构外，至少还有三个因素制约着欧洲各国政府在对俄问题上采取更统一的行动。

首先，公众意愿。尽管许多欧洲民众认为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也支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但他们显然不愿意亲自卷入军事冲突。2025 年 12 月，法国民调机构 Cluster 17 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欧洲人怀疑本国是否有能力在军事上抵御俄罗斯的进攻。在原则上支持乌克兰是一码事，而在现实中为此承担生命风险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其次，从战略角度看，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与俄罗斯直接开战风险极高；相比之下，在乌克兰东部领土上妥协所带来的成本更低、回报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一个秘而不宣却始终存在的问题正是：欧洲究竟是否愿意为乌克兰东部地区提供实质性的安全承诺。欧洲领导人一再强调保护乌克兰的主权，但从未明确提及维护其领土完整。

最后，欧洲地缘政治被动的背后，埋藏着一场更为深层的精神危机。欧洲并不缺少表达团结的演讲与会议，但在这些话语的背后，却隐含着两种未曾言明的免责心理：其一，期待他人来承担安全责任；其二，以“民主”和“团结”作为借口，不断推迟行动，以免承担责任。对于欧洲集体安全而言，“各国间战略协调”与其说是政治前提，不如说是一种人为阻碍。在这一点上，鲁比奥对欧洲人的批评一语中的。

马克龙所言不虚：欧洲必须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但欧洲人似乎仍在等待——等待公众舆论的转向，等待制度层面的整合，等待外在条件的具足。

然而，历史从不会按既定剧本上演。如果欧洲真心希望保护自身安全，那么它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会议、演讲和意见统一，而是如鲁比奥所说的那样：无需请求他人许可，立即行动。

【特朗普 2.0 一周年】

世界秩序的临界点：中等国家正重塑全球格局

梅里·马达沙希 (Mehri Madarshahi)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荣誉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ICCSA) 顾问委员会成员

当全球领导人齐聚达沃斯时，曾经熟悉的“合作”与“改革”话语，逐渐让位于对碎片化与权力政治的更为冷静、严肃的审视。不同于以往强调全球化、气候共识与技术乐观主义的会议，今年的议程更多由地缘政治竞争、经济约束与社会极化所塑造。经济增长放缓、通胀持续以及财政压力压缩了各国的政策空间；与此同时，战略竞争日益主导贸易、投资与技术领域，并成为会议议程的核心内容。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进展也不再主要被描绘为推动共同繁荣的引擎，而是更多被视为带来冲击、加剧不平等并引发治理争议的来源。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氛围中，达沃斯已不再是一个用以重申全球共识的论坛，而更像是一只测量仪，反映出一个正在艰难应对不满情绪、复杂性与加速变迁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清晰的判断力与果断的领导力不再是理想化的追求，而成为制度运行层面的必须条件。

达沃斯的讨论进一步揭示，多边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并非因为其制度架构已经消失，而是由于缺乏能够激活并持续支撑这些制度的可信领导力。今年达沃斯会议上对领导力缺失与制度疲劳的突出关注，标志着一次更深层次的反思：全球挑战的复杂性正在不断上升，而既有治理体系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却在持续下降。这正是第 56 届世界经济论坛——2026 年达沃斯年会——所呈现出的整体图景。该会议于 1 月 19 日至 23 日在瑞士举行。

在过去，达沃斯会议的性质既由其所讨论的议题决定，也由被邀请参与界定这些议题的人群所塑造。近几年反复出现、彼此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补充的三大支柱，通常构成了达沃斯议程的基本框架：

对全球化的信心。这种信心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不断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将继续为稳定与增长提供支撑。尽管不平等与韧性问题的阶段性提及，但全球化本身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很少受到根本性质疑。

气候议程的同步。这反映出围绕多边气候治理逐步形成但仍相对脆弱的共识。过去，达沃斯越来越多地扮演推进“净零承诺”、绿色金融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平台，其前提是相信环境可持续性能够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气候行动常被呈现为并非零和取舍，而是一项能够围绕共同目标动员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的统一议程。

技术驱动的进步。这一支柱往往以创新的乐观叙事呈现。数字化、人工智能与自动化被广泛描述为提升生产率、促进包容、解决问题的引擎。治理挑战并非不被承认，但常被视为次要问题，置于技术进步的变革潜力之后。

这些议题原本都将在今年的会议上展开辩论。本届会议的与会阵容也达到创纪录规模：来自 65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场，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约 3000 名与会者齐聚其间，另有近 850 位来自全球领先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董事长出席。

贯穿始终，论坛呈现出一种由矛盾所界定的状态：乐观情绪被不确定性所调和，宏大的议题被更为强势的个人所遮蔽，而人工智能的迅猛势头也不断受到“能否真正交付、落地”的现实问题挑战。这一切的核心，是特朗普的回归。他在周中抵达后，几乎同时主导了会议的议程安排与整体氛围——甚至在正式发言之前，几乎所有公开分论坛与私下会谈的注意力，便已被他的到来所吸引与聚拢。

在一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与经济色彩的讲话中，特朗普将美国描绘为全球经济实力的引擎，宣称在其领导下，美国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与韧性，并将之与他所称的欧洲国家表现乏力形成对比。他公开批评欧洲和北约，称欧洲“并未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言论超出了常规外交层面的批评，在谈及格陵兰问题时，他对部分传统伙伴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语气。他表示，“美国希望获得对该岛的控制权，因为只有美国具备独特的能力来对其进行防卫”。在强调美国工业生产能力与能源部门的重要性时，他再次表达了对部分可再生能源的怀疑态度，并尤其对风力发电提出了批评。

这场讲话迅速成为论坛最受关注的时刻之一：一方面源于特朗普本人的高度曝光度，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政策立场——尤其是在格陵兰问题与跨大西洋关系上的表态——被普遍认为可能对长期盟友关系带来破坏性冲击。

这场演讲之后，紧接着登台的是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他的发言题为《原则与务实：加拿大的道路》（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nada's Path）。卡尼发表演讲之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围绕贸易与主权问题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在此前一年中，美国总统多次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并公开发表言论，称要将加拿大变成“第 51 个州”。

在一番带有含蓄批判意味的表态中，卡尼对美国政策作出指向明确的回应。他呼吁采取行动，倡导全球中等强国之间加强合作，并指出，中等强国应当“停止自欺”，不再假定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仍然存在，而应接受它们所处的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他强调，由于美国政策持续出现不可预测的摇摆，依托“美国霸权”而形成的冷战后规则型世界秩序，已经经历的是“一次断裂，而非一次过渡”。

卡尼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来自大国的经济胁迫。他指出，这些大国“已经开始将经济一体化当作武器，把关税作为施压工具，把金融基础设施作为胁迫手段，并将供应链视为可以加以利用的脆弱点”。卡尼认为，如果中等强国能够在这一被感知到的地缘政治转向面前实现团结，那么它们将拥有巨大的获益空间。

在这番对美国政策的有力修辞中，卡尼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在现任美国政府主导下，继续对美采取安抚策略注定无法奏效——因为现状只会使中等强国处于缺乏足够谈判筹码的地位。他指出，中等强国可以通过在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结成联盟、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来改变这一局面，并补充道：“如果我们不在谈判

桌上，就会被摆上菜单。”卡尼在演讲结尾强调，加拿大有意在推动建立真正合作的努力中发挥引领作用。

卡尼的演讲构思极为出色。尽管这场演讲在论坛上获得了热烈反响，但据称却激怒了美国总统，并由此改变了美加关系的整体基调。随之出现的一系列显著动向包括：加拿大被撤回加入“和平委员会”的邀请——该委员会的设立此前正是在达沃斯由特朗普总统宣布；有关对加拿大商品大幅提高关税的信号不断释放，所提及的税率最高可达 50%；以及随后采取的具有惩罚性质的航空相关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加拿大制造的飞机和直升机被迫停飞。此外，近期有关美国方面与主张提升阿尔伯塔省自治权的团体进行接触的报道，也为加美关系引入了一个敏感的主权维度。

在当前地缘政治与环境不确定性并存的时期，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立场变化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美国释放出在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承诺上出现一定程度回撤的信号，中国则日益明确地表达了其有意在全球摆脱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而这些技术中相当一部分已实现国内生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国际气候议题讨论中的分量不容低估。中国拥有约 14 亿人口，2024 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这使得中国的政策走向对全球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成效具有决定性意义。

去年 9 月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计划在 2030 年前开始降低整体排放水平，这一表态被广泛解读为中国气候战略出现重要再校准的信号。

与这一立场相呼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本届论坛的发言中，将中国描绘为在日益碎片化的国际格局中发挥稳定支柱作用，并坚定维护多边合作的国家。在谈及可再生能源时，他强调了风能、太阳能和电池技术所蕴含的经济潜力，突出强调了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他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把握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机遇，与中国开展紧密合作；同时还指出，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制造国。

上述表态以及其他相关发言，使中国在本届论坛上被置于填补能源转型领导力空缺的位置——这一空缺，正是由于美国及部分其他西方国家在相关议题上的缺席。

一、全球秩序：模块化的多极格局？

在达沃斯 2026 上，马克·卡尼明确表达了一个如今已被许多分析人士认可的判断：全球秩序正在经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刻。

冷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曾以美国领导力与多边机制为稳定锚点，如今已不再可靠。卡尼强调，中等强国——如加拿大、欧盟成员国及其他国家——应当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组建联盟，而不是等待大国“施惠”。

这一表述并非只是修辞上的，还反映了各国对“权力”理解方式的更深层变化：从依赖超级大国的安全与制度庇护，转向追求战略自主，以及更具弹性的联盟组合方式。

由此衍生出的“模块化” (modularity) 特征,也并非新秩序的偶然副产品,而是其内生属性。中等强国之所以在这一格局中展现出相对优势,正是在于它们能够在多重利益与议题之间灵活游走,避免被完全卷入零和式的阵营对立。

这一趋势正变得愈发清晰:全球秩序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转向更加分散化、模块化的多极格局。包括欧盟、印度、加拿大、韩国以及若干拉丁美洲关键国家在内的中等强国,正通过定向贸易协定、联盟构建与议题导向的外交,更主动地确保自身的行动空间与政策能动性。

最新的一系列动向——包括欧盟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对中国展开的双边接触,以及长期停滞的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谈判的重启——都在实践层面展示了这一重新对齐的过程,并加速推动中等强国的战略多元化。

与此同时,大国日益不可预测的行为——例如美国重新对韩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削弱了长期联盟关系的可预期性,并引发了首尔加速推动面向东盟和欧盟的贸易多元化布局。

这些全球体系的快速变化,正在加速国际秩序从以美国为中心的结构,转向一个多极化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广泛的经济外交,已吸纳 140 多个国家参与;印度在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正试图成为一个关键枢纽,在西方、东方与“全球南方”之间保持平衡;与此同时,欧盟、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等区域性力量也在不断扩大其独立角色,并有望证明:中等强国不再处于体系边缘,而是跨阵营合作的重要通道,并且能够在超级大国立场分化之际参与塑造规则。除此之外,近期英国与欧盟在加入防务基金问题上的关系缓和,也可被视为这一趋势的最新例证。

这些发展并非出于理想主义,而是对权力格局碎片化的一种功能性适应。它们所指向的,是从制度转向联盟的变化。由此可见,这一转型并非朝向新的普遍性框架,而是迈向由中等规模国家所支撑的、分层化、议题特定型的联盟结构。在这一体系的核心,“贸易即地缘政治”发挥着更为广泛的功能:在一个权威由区域性与议题性集团共同分担的多极秩序中,构建战略自主性、降低供应链风险,并参与塑造规则与标准。

让我们以欧盟与印度之间达成的新贸易协定作为一个关键支点,来具体说明上述发展。经过长达 18 年断断续续的谈判,印度与欧盟宣布达成一项规模庞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有望大幅削减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若该协议获得批准并付诸实施,将形成一个覆盖约 20 亿人口、占全球 GDP 四分之一的自由贸易区。双方的政策制定者与分析人士普遍将该协定视为一项重大胜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更将其称为“所有贸易协定之母”。

其他类似安排还包括“气候俱乐部”,例如欧盟与伙伴国家围绕碳标准形成的合作机制;以及防务或技术领域的联盟,包括类似“四方机制”(QUAD)那样、成员构成具有可调整性的框架。这类安排通常是围绕具体议题展开的,而非全面性的战略或跨边界协定。尽管如此,这些协议强调的是共同利益,而并不要求在所有议题上实现完全一致。在这一空间中,中等强国能够跨越不同阵营发挥“中介者”的作用,并有助于缓解大国之间的零和压力。

这种动态同样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务实主义取向：欧盟—印度伙伴关系具有“模块化”特征——在利益契合的领域（如贸易、技术与韧性）中合作紧密，同时在存在结构性分歧的领域（如地缘政治与安全优先事项）中保持审慎管理。

新德里与布鲁塞尔已就一项贸易协议达成一致，该协议将取消多达 40 亿欧元的欧盟对印度出口关税，并可能使欧盟对印度的出口规模翻倍。

二、达沃斯年会释放的信号

世界经济论坛在未发布正式宣言或经谈判形成的联合公报的情况下闭幕，这与其作为“对话与汇聚平台”而非“决策机构”的长期定位一致。论坛的使命并非给出答案，而是创造条件，使高度极化的行为体能够开始共同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问题。

尽管如此，论坛结束后所呈现的发展，对多边主义与全球秩序具有高度重要性。闭幕阶段所传递的信息强调对话、反思与持续参与，既凸显了论坛在当下世界中的现实意义，也暴露了其在碎片化全球背景下的局限性。未能形成集体声明，本身就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与外交环境的状态。尽管达沃斯仍能为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领导者提供一个关键的交流空间，但形成共同承诺与统一方向所必需的条件，依然难以具备。因此，论坛并非在共识中结束，而是在对不确定性的承认中落幕，并以前瞻性的姿态强调：在不断加深的地缘政治、经济与制度性分裂之中，持续对话本身仍具有价值。

对论坛讨论及其结果的简要回顾，足以支撑上述判断：

全球化不再被默认视为稳定器；它日益被置于“脆弱性、依赖性与战略风险”的视角下加以理解；气候议程的对齐不再被视为共同的远景，而是逐步成为与安全、增长与政治稳定相竞争、相冲突的优先事项；技术不再主要被框定为集体机遇，而更被视为一种需要加以“约束、监管与地缘政治定位”的扰动性力量。

三、我们将走向何处？

总体而言，冷战后以美国为锚点的国际体系，正在让位于一种更加分散，也更具模块化特征的全球架构。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且高度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我并不认为旧秩序会被一种“干净利落”的新秩序所取代。正如马克·卡尼所言：“我们必须主动面对现实世界，而不是等待那个我们希望存在的世界。”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接受这样一种现实：与那些曾被我们视为生存所必需的原则与纪律发生“断裂”？是否应当承认，一个真正全新的结构性秩序，不可能在一年之内，甚至数年之内完全成型？抑或，我们应当将当下理解为进入了一个“分布式合作”的阶段，其特征是多极化、战略务实主义，以及围绕具体议题形成的联盟组合？

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后者。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分层式的架构逐步成形，其中区域治理机制——如欧盟、东盟、非洲联盟——不断强化。诸如欧盟—印度自由贸易安排、印太地区的多边接触、中东经济走廊以及区域性标准框架的形成速度，已明显快于五年前。围绕具体议题构建的网络——气候俱乐部、数字贸易标准、技术规范——正日益超越普遍性制度结构；而在大国之间难以形成共识的领域，具有灵活性的

“小多边”联盟正在协调应对相关议题。围绕人工智能治理、能源安全与数字标准的中等强国集团不断扩展，加之以对危机、战争、供应链冲击与气候紧急状况的及时反应，正在以一种快于审慎制度设计的速度，迫使国际关系格局重新调整。

这一转型的核心，是中等强国——那些不具备超级大国地位，但拥有外交灵活性、经济杠杆能力与规范塑造影响力的国家。正如马克·卡尼所强调的，它们的集体力量并不在于挑战霸权本身，而在于构建替代性的合作路径，这些路径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而非对大国的依附。

这一新的秩序并非由正式的阵营或普遍性的制度所界定。相反，它采取的是模块化、可调整的框架——务实而具有战略性，其设计目的不是消除结构性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长期共存与运作。

【特朗普 2.0 一周年】

美国强掳马杜罗说明，世界已处于“准战争”状态

郭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2026 年 1 月 3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称，美方已成功对委内瑞拉实施打击，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其带离委内瑞拉。美国副总统 J·D·万斯则强调，马杜罗已在美国因贩运毒品被起诉。国务卿鲁比奥在 X 上转发其去年 7 月的旧帖：“马杜罗不是委内瑞拉总统，他的政权也不是合法政府。马杜罗是‘太阳集团’的头目，这是一个控制了委内瑞拉的毒品恐怖组织。他因把毒品送入美国而受到起诉。”

事件引发多国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他对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行动“未遵守国际法”表示关切。古特雷斯表示，美国的行动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呼吁“委内瑞拉各方在充分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前提下，开展包容性对话”。俄罗斯外交部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武装侵略行为”。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对委内瑞拉领土的轰炸和对该国总统的绑架越过了不可接受的底线。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并为整个国际社会树立了又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打击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美方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并对一国总统动手深表震惊，予以强烈谴责。美方的这种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停止侵犯别国的主权安全。”

特朗普似乎再次做出了颠覆常理的事情：美国不仅以“禁毒”为名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打击，而且还公开抓捕并控制了其国家元首。这一行为在战后国际秩序中极为罕见，其冲击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跨境军事行动，直接触及国家主权这一敏感红线。

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名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部署军力，迄今已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击沉约 30 艘“贩毒船”，造成逾百人死亡。然而，马杜罗在 2025 年 12 月 26 日曾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释放出了一定的缓和信号。也正因如此，几乎没有专家预料到，事态会向着如此激进、令人大跌眼镜的方向发展。

此次事件不仅反映出特朗普个人决策风格的高度不可预测性，也显示了特朗普政府推动“新门罗主义”的政治意志。

从世界秩序演进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将成为国际社会进入深度“封建化”乃至无政府主义阶段的又一标志性案例。

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做法不仅未违背常识，反而非常合理。

第一，从历史经验看，通过军事手段对外进行政权更迭，一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美国在经历“9·11事件”之后，就通过发动“反恐战争”在中东推动“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但由于派驻了大量地面部队深入中东腹地，美国犯了战略过度延伸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军事、社会和经济代价。

早在第一次上任的2017年，特朗普就声称，他有推翻马杜罗、对委内瑞拉进行政权更迭的构想。当时服务于特朗普的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曾提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战略是推进“和平的权力更迭”。

事实上，通过综合手段打击不服从自身利益的周边小国，一直是部分大国的惯常做法。例如，俄罗斯在冷战后一直尝试在乌克兰扶持亲俄政权，但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以至于普京不惜在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第二，从战略上看，抓捕马杜罗是特朗普政府“新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实践。在2025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提出要把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源更多集中在西半球，巩固其在拉丁美洲的传统霸权地位。在视拉丁美洲为自身“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容忍委内瑞拉继续由反美政权掌权。

委内瑞拉是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马杜罗政权的存在，不仅削弱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地位，也阻碍了美国资本进一步获取当地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在“新门罗主义”的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行动迅速从军事压迫升级至政权更迭。

第三，从战术上看，利用特种部队直接抓捕马杜罗，是一种成本极低但效果极佳的做法。历史证明，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进攻他国不仅严重耗费国家财力、人力、物力，而且对对手的震慑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可能激发对手的反抗意志。

过去二十年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反恐战争”使美国陷入了泥沼；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样也陷入了持久战，严重损耗了俄罗斯的国力。相对而言，直接通过特种部队对委内瑞拉进行“手术刀式”的军事行动，抓捕其国家元首，不仅能直接达成政治目标，而且更能体现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及其维护自身势力范围的政治意志。

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抓捕马杜罗将对国际政局造成以下影响。

第一，委内瑞拉很可能将迎来政权更迭，被亲美政权接管。

一直以来，美国都把马杜罗视为“眼中钉”，并希望推动政权更迭，扶持亲美政府上台。如果马杜罗下台，有两位政治领袖可能接管委内瑞拉政府。

其中一位是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乌鲁蒂亚。他是2024年委内瑞拉大选中主要反对党的候选人。在2024年9月总统大选后，他被马杜罗政府指控颠覆政权，随后逃亡至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

另外一位有力的候选人是“委内瑞拉版昂山素季”——玛丽亚·科丽娜·马查多。马查多是反马杜罗示威行动中的领袖人物，也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反查韦斯主义者，支持委内瑞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同性婚姻合法化。2025年10月，马查多因“她为促进委内瑞拉人民民主权利的工作以及为实现从独裁到民主的公正和平过渡而斗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获奖后，马查多公开表示，她将这一荣誉“献给饱受苦难的委内瑞拉人民，也献给特朗普总统，感谢他对我们事业的坚定支持”。

第二，特朗普政府将进一步确立和稳固其在拉美的传统霸权地位，遏制域外大国染指其势力范围。

面对美国的持续军事施压，马杜罗并非没有尝试进行抵抗和反制。2025年10月8日，马杜罗在普京生日之际与俄罗斯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力求通过俄罗斯强化委内瑞拉国防。马杜罗也曾向中国和伊朗请求安全援助。或许正是因为马杜罗向域外大国靠拢并继续与美国对抗的姿态，使得特朗普对其采取强硬行动时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抓捕马杜罗、对委内瑞拉进行政权更迭的行动，尽管遭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反对，但也同样得到了部分拉美国家的配合与服从。自2025年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已通过与圭亚那、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等拉美国家达成军事协议，获得了这些国家的机场通行权，以方便美军围绕委内瑞拉周边海域展开军事部署，进行“禁毒战争”。

事实上，强烈谴责与反对美国做法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不多。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于2026年1月3日谴责美国袭击委内瑞拉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对此采取紧急行动，墨西哥和巴西也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表示谴责。但除此之外，大部分拉美国家只是强调要和平地处理冲突，并没有直接对美国提出批评。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卡姆拉·珀塞德-比塞萨尔强调：“我们不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

第三，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特朗普政府抓捕马杜罗，意味着世界秩序正在陷入更深层的“封建化”，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状态。

首先，联合国和国际法等机制今后很难再有能力约束国家行为。联合国在冷战之后，一直没有能力制约大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无法发挥其作为集体安全体制的作用。美国的“反恐战争”完全绕开了联合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再一次证明了联合国的失效。特朗普政府直接抓捕马杜罗的行径，则再一次为联合国开出了“死亡证明”。联合国和国际法今后依然会继续存在，但更多只是作为传统和参考，而非有约束力的规则。

其次，特朗普政府直接抓捕外国国家元首的做法，为各国潜在的激进军事主义开了“绿灯”。

再次，“门罗主义”将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新常态。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突袭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门罗主义”的实践。在这种形势下，南亚的印度、中东的土耳其乃至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都有可能打起自己的地缘政治算盘，谋划拓展以自身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第四，“混合战争”将日益常态化，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形态之一。

所谓混合战争，是指行为体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信息、舆论、法律与社会动员等多种手段，在不正式宣战或低烈度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目标、投射国家意志并削弱对手战略能力的一种战争形态。混合战争的具体手段既包括散播假消息、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也涵盖认知塑造、心理战、舆

论操纵、非正规武装与代理人力量的运用，以及特种部队的隐蔽介入等。混合战争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战争与和平界限的高度模糊化。

在这一逻辑下，传统意义上“战时”与“平时”的区分被不断侵蚀，政治、经济、社会与信息空间均被纳入作战范围，呈现出“一切皆可用于战争”的总体态势。

冲突不再必然以大规模地面部队推进和高强度军事对抗为标志，而是以持续性的低烈度对抗、结构性施压和系统性消耗为主要表现形式。从实践层面看，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一系列行动——从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打击再到政权更迭——可以说是混合战争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甚至无法清晰地界定特朗普是否对委内瑞拉发动了一场“战争”。

经验地看，无论是美国在冷战后频繁运用的“政权更迭”“颜色革命”，还是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都体现出混合战争思维的广泛运用。不同国家在具体操作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通过多领域联动、非对称手段和灰色地带行动，最大限度地破坏对手战略力量乃至政权本身的稳定性。

从混合战争的视角来看，当今世界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只是由于人们对战争的认知仍主要停留在以大规模武装冲突为核心的传统范式，未能充分意识到信息战、认知战、经济战和制度战等非传统作战形式所构成的现实战争形态。

总之，特朗普看似“颠覆常识”的一系列做法，并非全然背离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与其说国际社会正在走向失序，不如说它正在褪去道德、制度与规范话语的外衣，逐步回归以权力、利益与安全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底色。这种逐步趋于无政府主义的变化并非例外，而正是国际政治一直以来的常态。

【特朗普 2.0 一周年】

全球化进入“安全化”新阶段，中企出海风险正加速分化？

刘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我想与各位探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进程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一、经济全球化的三阶段演进

我们通常将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视为战后全球化的起步期：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安排下运行，整体呈现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全球分工主要表现为产业间分工，即以相对典型的“垂直整合”方式展开，跨国公司在这一阶段尚未成为主导力量，国家间经贸往来更多以传统贸易形式实现。对应的理论图景接近我们常提到的比较优势理论——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与农产品等要素型产品为典型特征。

自 1960 年代起，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将部分生产环节向墨西哥等地外包、分包。这一变化虽然仍处在早期，但为此后更深层次的全球生产网络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全球化的条件发生改变：物流与交通成本显著下降，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管制相较前一阶段更为宽松。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步让位于产品内部（或价值链内部）分工。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苹果手机的生产组织：产品的设计、品牌与营销可能在北美或欧洲完成，而制造与组装等环节则通过全球供应链外包给亚洲地区，例如在深圳等地完成。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在国家间投资与贸易中的作用显著上升。这也解释了为何研究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往往需要首先把握跨境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再进一步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但自 2018 年以来，我们进入第三阶段。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 2.0”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若说此前全球化主要以效率，尤其是生产效率为导向，那么在“安全化”逻辑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化的运行规则开始发生偏移：企业的产能布局与资本流向不再能单纯按照经济效率最大化来决策，而不得不更多纳入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与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的约束。

二、中国投资“出海”的四个阶段

在上述三阶段全球化框架下，我们可以用几组数据来观察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变化。为了避免只看单一指标带来的误判，我们采用三组数据：以对外直接投资（ODI）观察资本跨境配置与企业国际化的节奏，以进出口总额观察供应链分工结构与跨境贸易，再以实际利用外资作为“引进来”的参照，从而更完整地把握“走出去”与“引进来”的互动关系。

第一组数据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整体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

ODI随时间变化趋势 (1982-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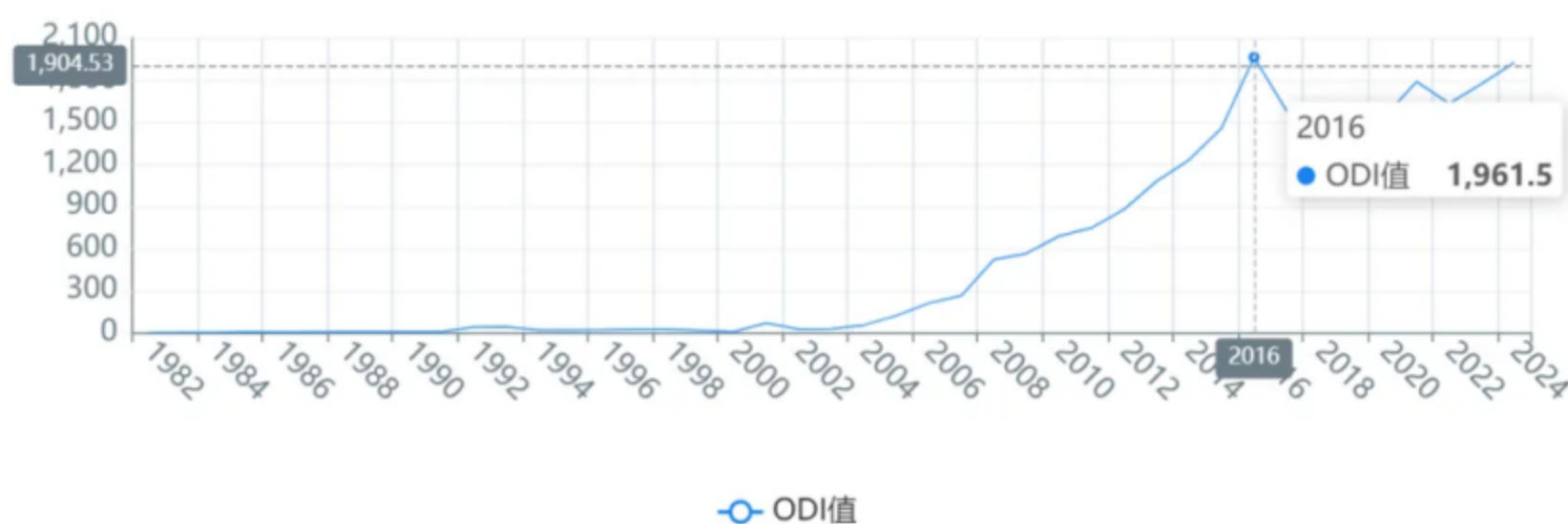


图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随年份变化总体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 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一阶段是 1982—1991 年，处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对外投资规模整体平缓、水平较低，年均流量大体在较小规模徘徊，可视为低水平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是 1992—2001 年（加入 WTO 之前），对外投资开始出现明显的波动与抬升：总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但由于当时资本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制度与政策环境仍在调整中，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第三阶段大体对应加入 WTO 之后的时期。我国于 2001 年 11 月加入 WTO，随后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快车道”。这一阶段中尤为突出的峰值出现在 2016 年，彼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1961.5 亿美元，与 1982 年相比增长接近 200 倍。2016 年前后对外投资规模一度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的特征。

第四阶段出现在 2017—2018 年之后，对外投资数据再次呈现明显波动。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全球化规则发生偏移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节奏与结构受到更强外部约束，波动性显著加大。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组数据（见图 2）——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与进口）相关指标。

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趋势 (1981-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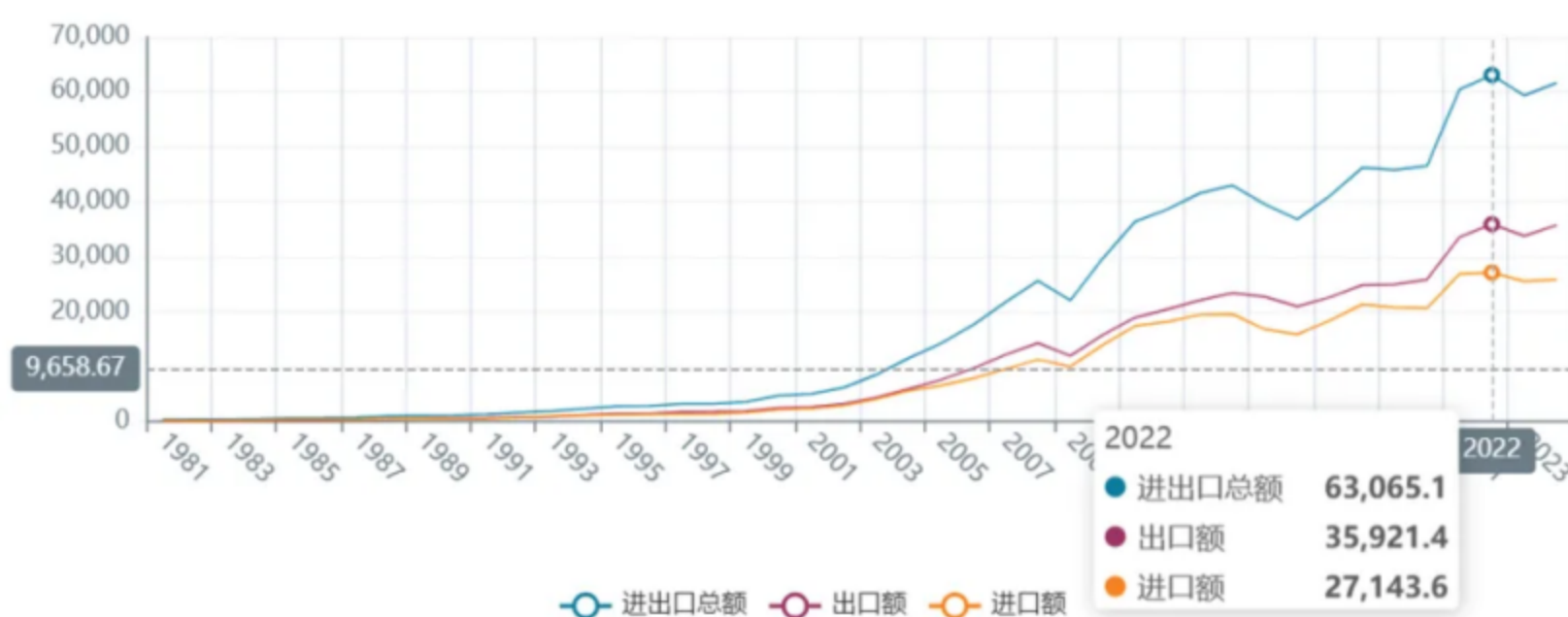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趋势 (1981—2024 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这组数据的总体走势与图 1 所示 ODI 在直观结构上较为接近。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跨国公司通过组织资本流动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而引发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变动。

不过，贸易数据也呈现出值得注意的差异：虽然中国企业进出口在阶段划分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相似（例如 1980 年代与 1990 年代总体为较缓慢增长，入世后进入高位增长），但峰值并不同步——对外投资的显著高点出现在 2016 年，而贸易数据的峰值则出现在 2022 年。

第三组数据（见图 3）是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相较于前两组数据，这一指标的走势更为平缓，整体呈现较长时期的稳步增长态势。从长期趋势观察，外资流入整体呈现持续增长的轨迹。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趋势 (1983-202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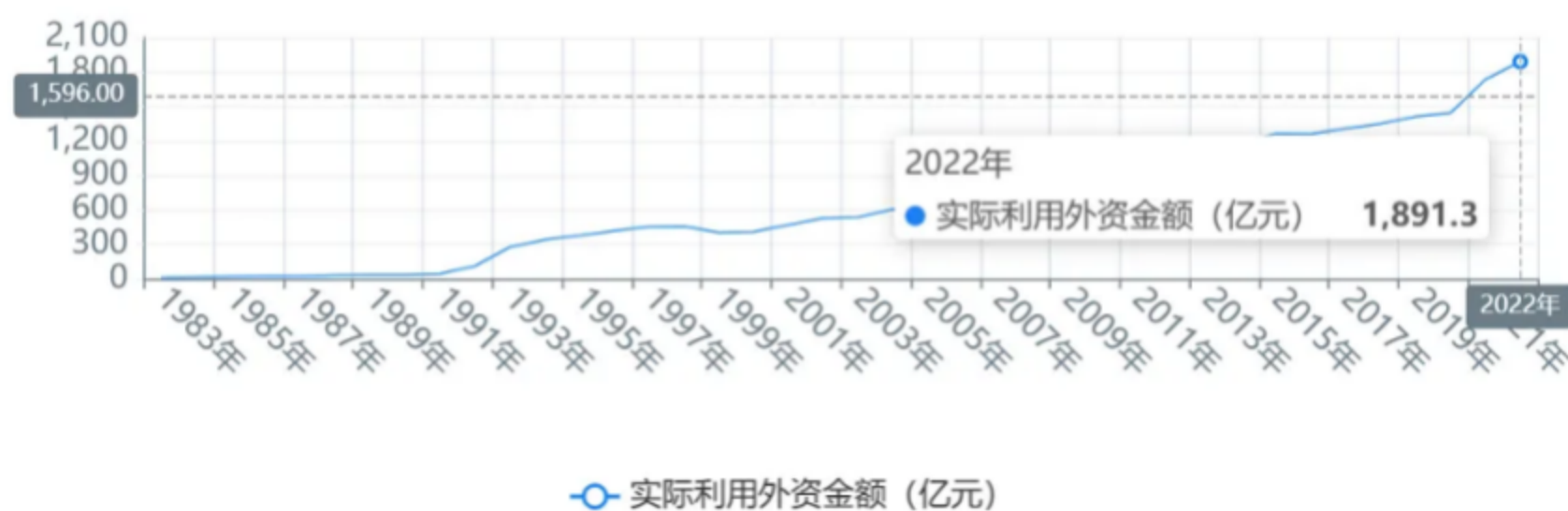


图 3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趋势 (1983—2022 年)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 国家统计局 & 海关总署

综上所述，以 ODI 为主线、并结合贸易与 FDI 作对照，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划分中国资本与企业参与全球配置资源、开展海外投资的四个阶段：从低水平的探索阶段起步，到波动中抬升，再到入世后的高速增长，并在“安全化”背景下进入更为显著的波动期。

在 1992—2001 年这一阶段，尽管中国尚未加入 WTO，但国家层面已经为“走出去”做了大量制度性铺垫。一个重要体现是双边条约网络的快速扩展：仅在 1992—2001 年间，中国就已签署了 100 多个双边条约；而截至目前，与中国签署相关双边条约的国家总量也不过 130 余个。

进入 2002—2016 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对外投资的主体结构与活跃度进一步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领域显著活跃。也正是在这一轮加速扩张中，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全球配置资源的力度上升，使得对外投资与招商引资均成为中美竞争中的“正面战场”。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一个榜单：在其 2024 年的相关报告中，全球前 100 家跨国公司里，中国企业占据 10 席，而美国约占 18 席。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大型跨国公司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另一方面，从行业分布看，不少企业集中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名单中还包含多个公众熟悉的平台型巨头，如京东、美团、希音、蚂蚁集团、滴滴等。中国确实成长出一批具备全球化组织能力的企业主体，但也存在行业与模式差异巨大的特征。

Top 100 non-financia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by home economy
(Number)

Region/country	2010	2020	2024
Europe	63	53	52
France	14	13	13
Germany	10	11	10
Switzerland	6	5	5
United Kingdom	18	12	11
Others	15	12	13
North America	20	22	20
Canada	1	2	2
United States	19	20	18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8	11	13
Australia	1	..	..
Japan	7	10	10
Republic of Korea ^a	..	..	3
Developing Asia	7	14	15
China	4	10	10
Hong Kong, China	1	1	1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	1	1
Malaysia	1	..	1
Republic of Korea ^b	1	1	..
Saudi Arabia	..	1	1
Singapore	..	..	1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	..	..
Total	100	100	100

图 4 各母国经济体的全球前 100 家非金融类跨国企业数量

图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三、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

我们需要进一步判断，中国的跨国公司和海外投资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这里可以引入“投资发展路径”（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这一理论框架。按照该理论，招商引资（FDI 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ODI 流出）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如果一国持续吸引外资，会推动本土企业在技术、管理、规模与组织能力上不断提升；该国的角色会分阶段从“主要吸引外资”逐步转向“既吸引外资、又对外投资”，企业会自然走向海外扩张，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阶段性跃迁。

基于这一逻辑，如果以 2016 年为标志，当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一度超过外资流入（出现资本净流出特征），则按该理论判断，中国在总体上已进入投资发展路径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成熟期——因为只有成熟期，境外投资的总流出才可能在结构上转为“正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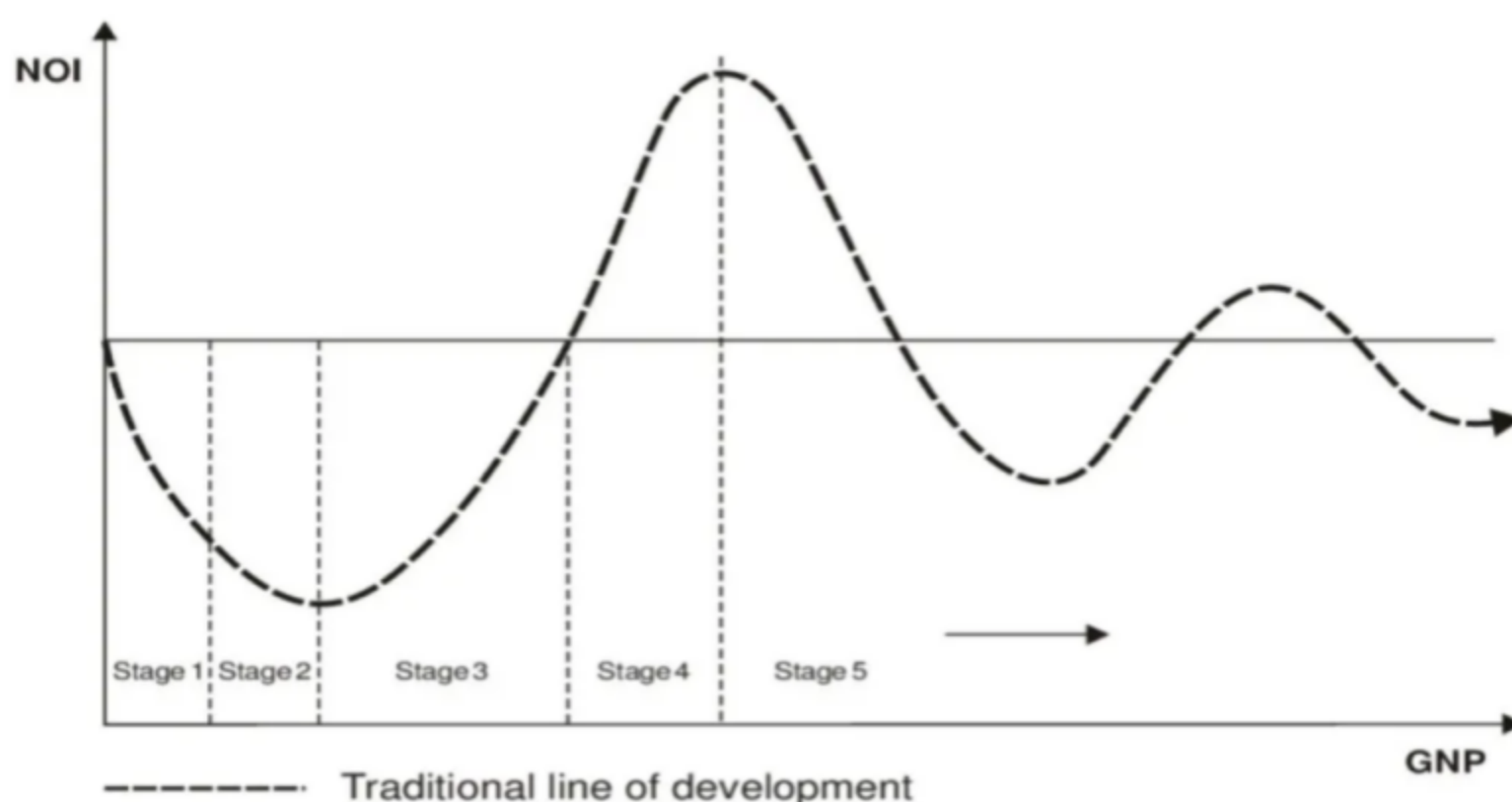


图 5 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曲线

注：投资发展路径认为，一国会随发展水平提升，依次经历低参与、引资主导、双向并行、资本输出主导，最终进入高度嵌入型双向投资阶段。

来源：Gorynia, M., Nowak, J. & Wolniak, R. (2010).

但即便接受这一判断，仍需做更细致的解释，因为中国的“走出去”至少存在两类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类是以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为代表，基本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渐进式发展；另一类则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及部分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则呈现出更明显的跨越式发展（例如一些高科技/平台/部分基建相关企业）——它们其实在尚未完成第三阶段所对应的“成熟内生市场竞争与内部整合”的条件下，就更快迈入了第四阶段的海外扩张。

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型企业在地缘政治波动期所面临的外部法律风险，也可能呈现显著差异。这进一步逐步分化出两类较为典型的发展模式：

一类以美的、海尔、海信等企业为代表，遵循相对传统、渐进式的国际化路径；另一类则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呈现出更明显的跨越式扩张特征。两类企业虽然都可能在总体上进入投资发展路径所指向的“第

四阶段”，但由于形成路径、能力结构与外部依赖程度不同，它们在同一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也正因此，在地缘政治波动加剧的时期，不同类型企业可能遭遇差异化的合规约束与法律风险。

四、地缘政治波动下的资本流动新态势

可以看看 UNCTAD 在 2024 年发布的另一组数据，用以观察全球资本流动的整体趋势。从图 6 可见，相较贸易数据，FDI 的波动更为剧烈。一个普遍趋势是全球出现“资本回收”，其中美国资本持续向本国回流的特征更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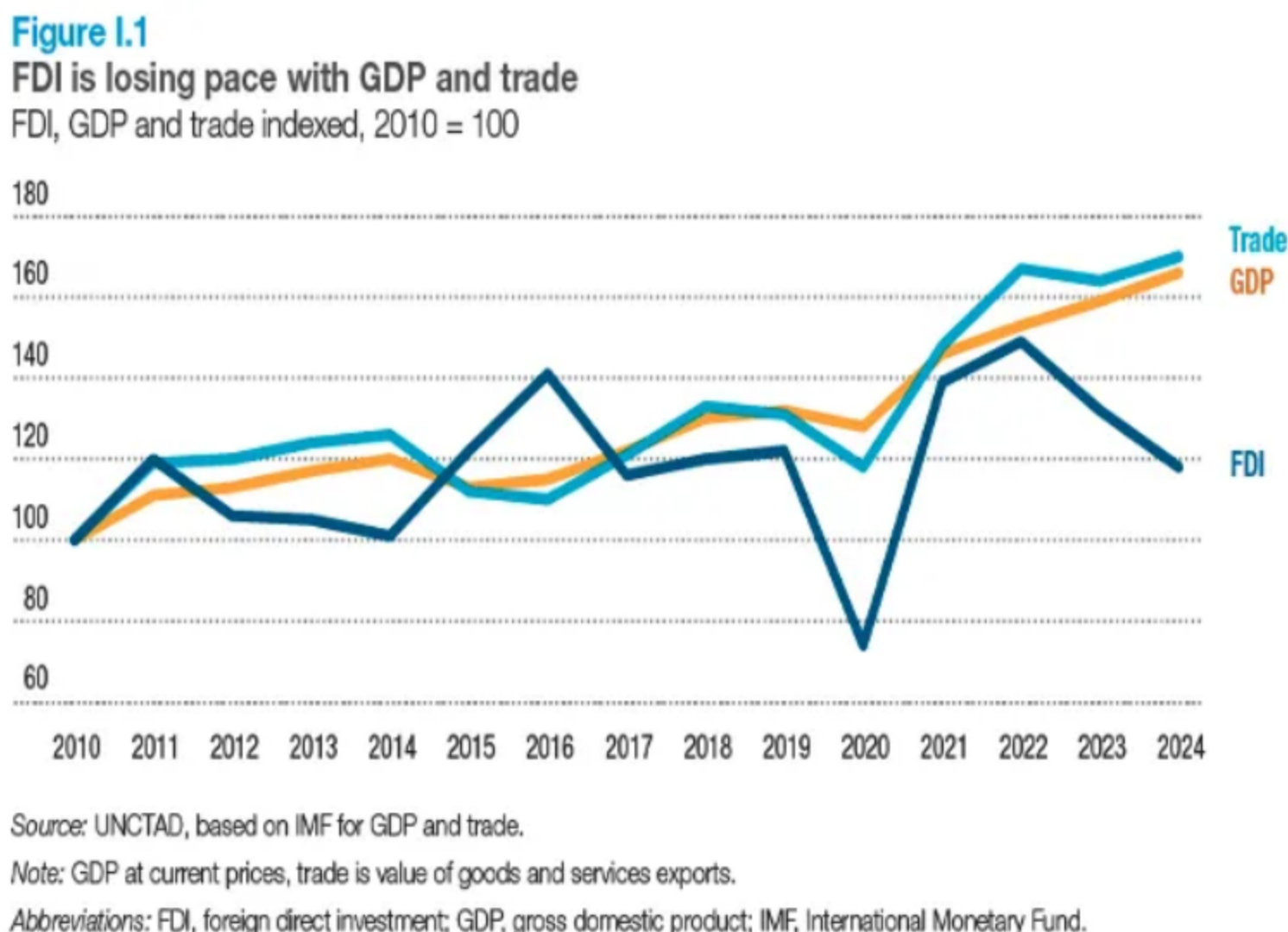


图 6 外国直接投资 (FDI) 相较于 GDP 和贸易增长放缓。

图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在此背景下，中国资本在亚洲等地区的布局究竟受到怎样的影响？

中东与拉美是当前必须重点关注的两个区域。这一判断是基于对投资目的地结构的进一步剔除与再观察：如果先将“通道资本”排除（以香港为典型代表，资金流入后往往进行再投资，不能简单等同于最终目的地），再将视角聚焦于批发零售、信息技术、制造业等更能反映实体与产业链配置的领域，就会发现中国的海外投资大量流向亚洲，同时拉美也占据显著比重。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北美地区：在北美，中国资本更多集中在金融业与第三产业，占比更大，且存量规模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领域。可见，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语境下，亚洲与拉美事实上成为中国海外资本投入最为集中的区域。

最后，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以色列的情况。从 2024 年的数据看，其资本流动呈现“负向”变化。相比之下，其他地区虽也存在调整，但变化幅度并不如此剧烈。结合以色列所处的地缘环境与制度条件，其地缘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具有现实性且不容忽视的强度。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 5 年的发展蓝图。从“一五”到“十五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以其连续性和有效落实，成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实现新发展。世界关切中国全国两会，关注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对全球作出的贡献。中国自身发展的世界意义不断彰显，关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开源式”现代化。

一、充分体现了“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责任担当与价值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深刻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中国对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也是推进世界现代化的新动力，对国际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危机形态多样，但大多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式现代化造成的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范围内对“何谓现代性”的认同危机。不可否认，西方式现代化曾塑造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经济体系和发展路径，国际秩序亦很大程度建立在西方国家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之上。如今，这两大影响力支柱均已动摇。西方式现代化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不再认同和接受西方式现代化，现代性危机随之而来。

现代化发源于西方，但西方式现代化如今辉煌不再，西方国家无法回答现代化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中国在探寻现代化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但如今却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成功道路？各国如何吸取西方经验教训，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孕育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思维构架之中，在聚焦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充分体现了“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责任担当与价值选择。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具有超出一国范畴的重要性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则指向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达成两者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在高度开放的状态下进行的，由此可以将“开源”概念引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中。

在技术发展领域，“开源”是一种开放共享的生产模式，即技术设计公开可见，任何人都能修改、完善和分享。如今，“开源”更广泛地指一种强调信息自由共享、快速试验和协作创新的理念：任何人都能贡献想法、改进技术、推动迭代发展。

西方诸国现代化的成功受益于其开放性，一个国家可以学习另一个国家的经验，学习的过程也是调整的过程。但当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现代化模式时，却将其现代化经验固化为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囿于意识形态的不可修改性，这种现代化模式自然难以适应其他国家国情，“开源”变成了“闭源”。同样，即使是其他国家主动引入现代化，当它们把西方现代化视为一套意识形态时，也会导向同样的结局。

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于高度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式现代化在主体性层面，把“中国”而非“现代化”作为主体，强调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是把“现代化”加于中国之上。在思想层面，中国把现代化视为经验而非系统的意识形态；在实践层面，中国以开放姿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同时坚守自身主体性与独立性，结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进行修正适配。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其“开源性”。中国吸取西方式现代化“闭源”的教训，不将现代化视为单一固定模式，不输出、不强加自身模式，为世界提供可参照、可适配的发展经验，是推动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现代化范式。

二、兼顾了物质、制度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协调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围绕 3 个基本点展开。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源”的，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第二，中国以开放的心态和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选择，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第三，当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经验时，更多学习的是强调自主性、独立性和实事求是的经验，从而修正各国的现代化道路。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 5 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现代化最高标准、最完整的定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至少包含 3 层含义：人是现代化的主体，现代化必须回应人的需求；超大人口规模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远高于西方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关键领导作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对一些西方国家“富而不公”现代化模式的修正，强调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公平与共享，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对西方顾此失彼的现代化的修正。作为儒家文化的起源地，中国既追求经济发展与物质富足，也重视精神建设，力求避免物质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全面进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生态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现代化的规避。不同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路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在实现自身进步的同时推动合作共赢。

中国式现代化 5 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囊括了现代化的 3 个层面，即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共同富裕”的“富裕”指的就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它使精神现代化有所依托。制度现代化最为重要，它介于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物质现代化属于客观范畴，容易度量，而人的现代化是主观范畴，大多发生在社会心理层面，以主观判断为主。二战以来，人们越来越把制度要素置于现代化的核心位置。

从制度范畴保障现代化建设需要把握 3 个方面：一是制度能够保障实现物质现代化，二是制度能够保障实现人的现代化，三是制度能够协调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第三方面最为重要，也容易被忽视。如果物质现代化实现了，而人的现代化没有实现，即物质现代化没有反映到现代化的主体上，现代化就毫无意义；如果人的现代化过于超前，物质现代化没有跟上，反过来也会影响由人组成的社会整体。制度的意义在于推动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作出的理性选择，兼顾了物质、制度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协调。相信在这些经验之上，中国完全有能力去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目标。

三、深化制度型开放、扩大单边开放，是中国携手各国发展的有效途径

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开源”的前提。在封闭状态下，要素很难流动，犹如一潭死水。正是因为开放，中国得以有效发挥自身相对于外部的比较优势，产生了推进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并通过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推进发展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互为条件、互相强化：没有对内改革，就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对外开放，也难有对内改革的动力；改革与开放相结合，进一步激发了创新。这便形成了一种“开源式”现代化的模型：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创新落实改革；以开放联通世界，以创新开拓未来。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这个过程曾被一些人误认为“只发展了中国”“没有促进世界发展”。但他们忘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增长，甚至一度高达 50%。直到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也保持在 30% 左右。可以说，在全球所有国家中，中国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这也证明了中国“开源式”现代化对于世界的积极影响。

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二是单边开放。制度型开放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国际接轨。今日中国不仅是规则的对接者，也是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单边开放是一种不涉及他方的自主选择，不附加对等条件，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单边开

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而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主动作出的开放决策，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开放试点，循序渐进、由点及面、逐步推广。

区别于一些西方国家动辄“撒梯子”，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乐于“递梯子”，帮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获得发展。

深化制度型开放、扩大单边开放，是中国携手各国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中国的单边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并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各国企业、各国产品，都希望在中国市场的“大海”里“畅游”。中国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有效化解零和思维、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推动全球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优质资源更好聚集。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通过“开源式”现代化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日益互相嵌入、互相依赖。中国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此付出不懈努力。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安全治理和发展治理，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更大作用，帮助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福祉、增强发展韧性，携手各国迈向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源”，为更多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提供启发，不同国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将形成百花齐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相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特性，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新机遇，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原文刊登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 17 版：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探索建设科创特区，深化大科研体系体制机制改革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

针对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提出了驱动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理论，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三驾马车”将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主体）、应用技术转化、企业和产业化一体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产学研政”一体化，这理顺了科创的整体逻辑。人们可以把这称为大科研体系。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层面已经非常清楚，但要把理论转化成为现实，依然需要付出大量甚至更大的努力，尤其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尽管因为制度背景不同，各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科研体系，但不管什么样制度背景的科研体系都必须符合科创的基本逻辑。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背景主要指的是“三驾马车”在不同国家体现为不同主体的问题。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将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表明我们对大科创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尽管管理构架有了，但这三块得到有机的整合而成为一个大科创体系依然需要很多的努力。

这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从大科创体系的要求出发，来看现在有关制度要素的哪些方面还存在短板，或者还没有理顺。就教育、人才、科研三者关系来说，尽管有协调机构的存在，但协调力量还不够。

科研管理的问题明显。首先是“人才”的定义。人才有时候还是以人们所说的“帽子”来定义，而“帽子”很多时候是以研究成果来定义，更多强调学术人才，而对应用型人才重视不够，尤其是工业人才。在基础科研领域，学术人才的定义并无大碍，但一旦到了工业领域，这种人才定义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比如，“杭州六小龙”企业中的人才，通常并不在我们的“人才名单”上。为此，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和科教界“帽子”治理，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鼓励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厚积薄发。

现行人才定义也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取向。我们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在那些已经有了“帽子”的人才身上，往往是比较年长的人才甚至老龄人才，而年轻群体则得不到足够的科研资助。尽管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为年轻群体设立了一些项目，但年轻群体缺乏资助的情况依然明显。考虑到人类自进入互联网

时代以来，年轻群体越来越成为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如果上述情况不改变，就很难实现具有突破性的科研创新。

人才定义也影响到了对“科研”的定义。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片面的认知，把发表论文和做科研等同起来，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技术转化率依然不高。

就科研的工具来看，我们不少科技实验室呈现为一个个“土豆”，即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过度的浪费。如何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型成为“又多又强”呢？这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机制改革。

在技术转化端也存在问题。现在一些部门鼓励甚至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去做技术转化，这相当于要求一个科研人员既要做基础科研，又要做技术转化，同时还要去筹钱。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容易导致基础研究的“应用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

应用技术的人才培养也存在问题。在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缺乏很好的转化机制。如职业学校缺乏足够的要素，包括政策、人才、资源等，所以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

在创新领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充分理顺，没有充分确立在分工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制度，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对创新的金融支持有待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坚持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当家，有效避免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金融的过度虚拟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科创的金融系统，有效的金融系统尚未充分形成。很多新技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而被外国资本所收购，或者不得不流落到海外。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凡是搞投机性金融的不仅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会出现大问题，但凡是投资技术创新的最终都会孵化出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因此，如何发展能够为未来技术提供足够金融服务的金融业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连接产学研的是一整套体制机制，这方面的改革有待加快。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韩国有类似处，早期是应用技术，随着技术的积累，逐渐转向原创。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因为监管不够科学等因素，有些技术不能很好落地。

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产生的新质生产力，有些正在流向可以落地的经济体。必须意识到，美国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来自一代、二代移民，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移民。考虑到新的经济活动需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获得，这些技术的流失就导致了国内新的经济活动不足。这也是“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竞争。即使偶尔产生新经济活动，也因为种类过少，导致各地一哄而上的局面。这种局面，唯有通过发展增量经济才能破解。

当然，类似上述问题还可以列出很多。问题是怎么办。对此，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尽快确立一个大科研体系。如前所述，国家层面理念和政策已经到位了，但落地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改革是政府的责任。尽管自下而上也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体系，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在国家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期待一个大科研体系完全依靠自我生成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需要进行试验区式的改革，即需要设立科研科创特区。在我们条块管理的体制内，通过“条条”发生有效的改革难度大，因为“条条”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效的改革还需要从“块块”进行。中央政府给予“块块”充分的授权，这类授权往往是一揽子的“政策包”，而非通过中央各个部门逐项审批，其改革所构建的科创系统更能体现出系统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再向国家其他地方扩散和推广。中国早期的特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应当指出的是，“块块”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功能领域。我们可以围绕新工业革命所需的要素，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具有良好创新生态的地区，设置多个表现为“块块”的科创特区，这些特区将根据不同技术领域的需求，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并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成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动力。

例如，深圳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高度集中在南山区，南山可以设立地理区域意义上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创特区。再如，广州集中了大量的医院并且生物医药比较发达，广州可以设立功能领域意义上的科创特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可以设立科创特区的“块块”。

在这些“块块”，国家赋予真正实现基于“三驾马车”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各项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成果，在引领未来产业的同时赋能现存产业。

总之，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各个层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唯有深刻领会党中央顶层设计的理念，毫不动摇地加以落实，我们才会取得长足的科技进步，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原刊登于《新经济》2026年第1期“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南方智库论坛笔谈”，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第十四届南方智库论坛上的主旨发言，部分内容于2025年11月6日发表于《经济日报》。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AI 都在替人打仗了，为什么仍未能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
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卫报》近期一篇文章揭示：“据报道，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被美国军方用于大规模打击行动中，该技术‘缩短了杀戮链’——从目标识别到获得法律批准再到发动攻击的整个过程。”

“此前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加沙地区识别目标的美国和以色列，在仅头 12 小时内就对伊朗目标发动了近 900 次袭击。在此期间，以色列的导弹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研究该领域的学者表示，人工智能正在缩短复杂打击行动所需的规划时间——这一现象被称为‘决策压缩’。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人类军事和法律专家仅仅对自动化的打击计划进行盖章批准。”

“2024 年，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Anthropic 将其模型部署到了美国国防部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以加快战争规划进程。Claude 成为由战争技术公司 Palantir 与五角大楼合作开发的一个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旨在‘显著改善情报分析，并使官员们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将这个报道结合特朗普近日宣布的“封杀 Anthropic”，可以了解到，AI 的确日益深入地应用于美国军事领域。但是，AI 目前如何起作用、起到怎样的作用、还将发展成什么样，并没有详细信息。

上述看法其实与我们近年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具体需求领域的思考相符：与具体的应用需求相结合，人工智能会获得更多样的创新发展空间。AI 军事化应当予以抵制——至少如同美国的 ChatGPT 用户近日做的那样。然而，探索人工智能产业的供给与需求相衔接、在应用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的适宜技术，却是值得大力激励的努力。

事实上，美国、中国等国家的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先进技术产业发展在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产业供给侧的急速扩张，尚未能引发需求侧的相应发展。如何联动供给与需求两侧，是当前提振经济景气、实现内需拉动战略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为围绕经济社会中的多样化需求而发展先进技术制定了基本遵循。有研究者解读中国近年的政策创新，提出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认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需要用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崔之元，2022）。

本文沿着这个思路推进，从重构人工智能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入手，探讨需求侧的企业、劳动者等主体参与人工智能工具设计，实现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选择，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多样发展的可能性。

一、焦虑与审慎：AI 时代的双重社会心态

人工智能（AI）在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一方面引发了先进技术如何改变全球化发展模式、地缘政治格局、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讨论，另一方面，也导致普遍的社会焦虑，如人工智能是否会造成大规模失业、用于军事目的、操控舆论和民主选举、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加剧对少数群体的歧视等种种疑虑，反复出现在各类媒介中。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新技术产品日益广泛地进入日常生活，针对未来变化的简单的情绪化反应逐步被审慎的思考所替代，开始有更多的资料反映先进的智能技术是否改变以及如何影响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

春节过后，关于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热烈讨论，体现了这种审慎思考正在日益增强的趋势。

《经济学人》杂志 2 月中旬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需求”目前作为最大的市场驱动力，激发了产业供给侧的急速扩张，但“当前从‘能后空翻的机器人’到形成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路径尚不明晰。目前市面上购买的人形机器人，多数如同春晚舞台上那些，仅作展示用途，鲜少参与实际生产工作。”

该文分析，最大的瓶颈在于“机器人若想突破新奇娱乐工具的局限，就必须常态化部署于替代人力的作业场景，以持续收集训练数据”，同时也指出“中国政府正积极推动场景落地。多地政府已建立机器人应用测试中心，供企业投放机器人执行多样化任务并收集数据，部分数据经整合后实现共享。”^[1]

上述文章的审慎态度可以与《经济学人》的另一篇文章相对照。该文对正以惊人速度迭代的人工智能先进技术是否助推生产率大幅提升提出质疑，认为根据实证研究，综合技术普及广度、应用深度以及具体任务场景中的产出改善程度三个方面的表现，人工智能对生产率并没有明显影响：

（1）技术普及度有所提升，如 2025 年 11 月美国职场中使用生成式 AI 的劳动者比例已达 41%，较一年前的 31% 显著上升。（2）技术应用深度不显著，如仅有约 13% 的劳动适龄人口每天使用 AI。多数应用局限于独立任务而非全流程自动化：OpenAI 数据显示其模型主要用于职场写作辅助与信息检索；Anthropic 的 Claude 则主要协助编写代码。（3）在某些应用场景中有改善工作效率的表现，如使用 ChatGPT 可使写作任务耗时缩减近 40%。该文由此提出一个认识：生产率跃升通常不仅源于劳动者更频繁使用新工具，更关键在于企业围绕技术重组生产体系。^[2]

以上根据实证研究展开的审慎思考，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先进技术与经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人工智能是人类知识积累形成的一种“公共品”，其社会价值在于被寄托了实现多样经济社会发展价值的希望。

[1] “China’s humanoids are dazzling the world. Who will buy them?”,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6/02/18/chinas-humanoids-are-dazzling-the-world-who-will-buy-them>.

[2] “The AI productivity boom is not here (yet)”,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6/02/22/the-ai-productivity-boom-is-not-here-yet?itm_source=parsely-api.

现有的人工智能产品显然还不能满足这种价值期望。那么，是否可能改变这种技术发展现状？从这个关切出发，我们可以把上述《经济学人》文章提出的审慎思考持续推进。

二、供给与需求的错位：AI“生产率悖论”

人工智能产业目前的急速扩张，更多得益于产业政策的偏重支持以及全球少数科技巨头的大力推动。按照哈佛大学杰森·弗曼（Jason Furman）的估算，美国 2025 年上半年约 90% 的 GDP 增长来自数据中心及相关资本投资支出。剔除投资驱动因素的调整指标更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旧金山联储的研究发现，排除此类投资影响后，实际生产率增长几乎为零。^[3]

同时，根据 Gartner 发布的《2025 年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曲线》，全球 AI 领域融资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融资达 8912.8 亿元，较 2024 年全年增长 49%；全球 AI 领域融资的头部聚集效应持续加剧，十亿级融资事件数量占比 8%，对应的融资金额占比却高达 82%，单笔融资均值攀升至 80.2 亿元，较 2023 年的 53.6 亿元，2024 年的 75.5 亿元持续增长。

关于中国的状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伍晓鹰教授近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推算：2001 年加入 WTO 后的 7 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 2.1%；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转为负值，但 ICT 制造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仍在提升；2018 至 2023 年，ICT 生产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贡献为 0.4 个百分点，其中 ICT 密集使用的制造业组更高，达到了 0.9 个百分点；一些服务业、非市场化服务部门和密集使用 ICT 行业中的服务业组，对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造成显著的拖累，分别为 -0.4、-0.7、-0.5 个百分点。^[4]

这几组数据揭示了我国当前存在的“生产率悖论”问题（Productivity Paradox）：在产业政策偏重支持 ICT 行业的条件下，ICT 产业出现了一定的扩张，但是并没有带动其他诸多生产部门效率的改进。换言之，目前的人工智能产业供给还未能满足多数行业的发展需求。

AI“生产率悖论”问题的产生在于尚未有意识反思两个关键性难题：（1）供给与需求的关系；（2）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

先看第二点。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近年发起“重新设计人工智能”大讨论，所针对的正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偏向自动化与监控，这种创新方向对增强劳动者话语权和自由产生不了帮助。^[5]阿西莫格鲁强调了对于技术发展方向进行重新“选择”的必要性：“社会向无工作和监控行进，并非不可避免。人工智能的未来依然是开放的，可以带我们走向很多不同的方向。如果我们最终拥有了强大的监控工具和无所不在的自动化（即没有足够多的工作留给人去做），那只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径。”^[6]

由此，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对人工智能这样复杂的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选择”？这涉及重新审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应对 AI“生产率悖论”问题，在于使先进技术真正融入生产和生活的具体应用场景。

[3] “The AI productivity boom is not here (yet)”,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6/02/22/the-ai-productivity-boom-is-not-here-yet?itm_source=parsely-api.

[4] 伍晓鹰：“AI：一个新的‘索洛悖论’？”，<https://finance.sina.com.cn/cj/2025-07-24/doc-infhqpau9151563.shtml>.

[5] Daron Acemoglu, Redesigning AI: Work,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Boston Review Forum, 2021.

[6] 同上，第 24 页。强调为原文所有。

但是，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企业如何应用人工智能”“如何拥抱人工智能时代”这类仅站在产业供给侧立场上提出的问题，更需要回答“目前的人工智能是否对企业有用”“如何使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等需求侧的疑问。

一篇同样讨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博文，把这个视角转化的意义讲得很清楚：“当前产业中存在一种‘供给创造需求’的幻想，即认为只要创造出令人惊艳的产品，需求自然会出现。这种幻想被iPhone的成功放大——苹果似乎证明了，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展示给他们看。

然而，这一逻辑的适用性是有限的。iPhone创造的是消费端的全新需求，其价值可以直接被消费者感知和体验；而机器人首先是生产力工具，它的价值必须通过替代或辅助人类劳动，并显著降低成本来证明。工业企业购买机器人，不是因为它酷炫，而是因为它能算得过账——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回收周期多长？可靠性如何？”^[7]

西方政党政治长期的左右轮换，其政策形式大体表现为在供给学派（“供给自动创造其需求”）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之间的摇摆。这种左右摇摆的状况成为常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超越左右立场去思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如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的分析，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逐步形成系统地综合把握“供给侧改革”与“有效需求管理”的政策认识，蕴含着超越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创新。^[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系统地表述了这个政策认识：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是进一步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导。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中国人工智能+”政策时，将推动人工智能供需衔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强调。^[9]

中国政策对此已有较为系统的部署。国务院早在2017年7月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就提出“根据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行业应用的不同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系统发展策略”等基本原则。《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健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指引、开放度评价与激励政策，完善应用试错容错管理制度。”2025年11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制定了关于场景应用的系统性政策：“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具有重要牵引作用。”相应形成了“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全链条路径及一系列有关资源配置和要素改革的配套保障。

“应用场景引领”政策以促进供给与需求、研发与应用、试验与推广之间反复互动为特征，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技术工具，为应用端提供了参与新技术创造和改进过程的机遇。

[7] “舞者与工作者：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死亡谷’困境”，https://mp.weixin.qq.com/s/_fcB8j1JfMG_KSjlU76mWg。

[8] 崔之元：《新三位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和共同富裕》，载《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第3期；《文化纵横》2025年第41期总第241期。

[9] 扩内需有何新举措？如何实施好“人工智能+”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当前经济热点”，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8/content_7038283.htm。

三、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创新：突破科技巨头主导的路径依赖

但是，践行应用场景引领、从需求出发选择技术发展方向，还需要考虑“需求侧是否有创新资源解决实践问题”这样的现实难题。实际上，作为长期处于赶超战略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与产业政策受“线性分工”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中国工程院李国杰院士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个现象：“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几乎没有能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企业，本应由企业完成的产业创新就都交给了大学和科研单位。因此，在经济系统之外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科技系统，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几乎成为科研的唯一载体。由于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我国在‘科研线性模型’的末端又加了一个‘成果转化’阶段，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中国科研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10]

在“线性分工”的思维下，第一，“创新”被狭隘地理解为先进科技的输入，研发与生产构成相互隔离的两套系统，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生产体系的内生创新需求和实践被排除在所谓创新系统之外，在政策上得不到支持；

第二，科学优于技术、科研优于生产的观念具有压倒性影响力，“创新能力”在指标体系中被等同于“发明专利”。全球许多城市为模仿硅谷模式而投入巨资，但所谓“创新高地”长期只属于少数几个地区。创新系统相对于生产系统的封闭性，使科研机构往往脱离产业发展实践，不能从企业实际的创新需求中提炼科研问题，造成许多新兴科技产品无法深度融入生产过程，而相当多的企业找不到适宜的科研资源来辅助其解决转型升级问题。由此，无论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发展路径上，都经常难以摆脱被锁定在发达国家的既定技术路线内的命运。我国很多重要行业中出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者陷阱”，正是这个政策思维导致的企业获取科技创新资源严重不足的后果。^[11]

在当前的人工智能前沿发展中，少数科技巨头所起到的作用已经无以复加，这构成了从需求侧出发来选择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重大阻碍。这个状况是人工智能的创新特性所决定的。实际上，自从辛顿（Geoffrey Hinton）探索出“反向传播”的算法，给予了神经网络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即能够将所判断为错误的信号一层一层地传导回去，自动调整内部参数，从而实现机器的自我学习，人工智能就具备了打破规则主义所遵循的“向后看”的线性时间路径。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进一步突破，神经网络表现出更加不可限量的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特征（“向后看”）、最终识别出复杂对象的思考深度（“有限的向前看”）。这种突破人工智能“线性时间”科研路径的方法，在 Transformer 架构的发明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在 2023 年 3 月发表于《科学》

（Science）杂志上的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三位专家指出：在人工智能研发中，所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比如谷歌大脑研究团队（Google Brain）在 2017 年推出的主要用于自然语言处理

[10] 李国杰：《大力推进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科技创新》，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 年第 5 期。

[11] 陈玲、孙君、付宇航：《政策协调、不确定性与大型技术系统创新——中国核电技术赶超的案例研究》，载《公共政策评论》2024 年第 3 期。

(NLP) 和计算机视觉 (CV) 领域的深度学习模型 Transformer 架构, 既是技术发明上的创新, 又是原理发现上的突破。^[12]

人工智能的这种创新特性决定了, 少数科技巨头有可能依靠其拥有的庞大算力、超大规模数据集和更多的技术专家来完成通用性强、与一般性实践问题结合更紧密、跨越多个学科的前沿探索, 由此产生“产业界对应用端的主导也给予了它塑造基础研究方向的权力”的支配性效果。^[13]

少数科技巨头以其庞大的资源聚集能力而形成的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主导, 的确不易被打破。但是, 如李飞飞提出不同于大语言模型的“大世界模型” (LWM)、理查·萨顿 (Richard S. Sutton) 等提出“基于经验的学习模式”、麻省理工学院初创团队推出挑战 Transformer 的 LFM (Liquid Foundation Model) 新架构模型等, 这些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的探索, 都在寻找更直接从物理世界和人类经验中学习、从而形成“智能”的可能性, 更彻底地突破线性时间对于人工智能先进技术发展路径的桎梏。可以将需求侧的多样要求融入这些丰富的探索中, 使得更多的技术创新能够更紧密地从需求侧的多样要求中产生。

因此, 需要以极大的精力推进产业政策和创新系统的变革, 给予需求侧的广大非 ICT 或 AI 行业和企业以政策支持, 同时突破长期“线性分工”思维形成的科研与生产、高校与产业相分割的障碍, 使各行各业有可能基于自身发展需求来动员各类创新资源, 共同进行改善具体领域生产率的技术研发和创造。

四、以需求侧为本: 探索“人机协同”的包容性发展路径

在近期有几篇研究报告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探讨, 值得在此处加以介绍。值得引起重视的是, 较之前述《经济学人》那篇文章提出需要将机器人“常态化部署于替代人力的作业场景”的见解, 以下的这三份研究报告更侧重于对劳动者发展能力的保护和提升, 因此不仅关注在先进技术加速时期企业的发展, 同时还注重普通劳动者的成长空间。

2025 年 4 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UNCTAD) 公布报告, 倡议“包容性人工智能” (Inclus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政策方案, 提出“以工人为本位的 AI 发展路径”^[14]: 要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技术发展, 就需要更加重视劳动者及其职业成长。这包括将传统旨在实现最高生产率和效率的目标范围扩大, 以促进技能发展, 并使劳动者能够适应并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中蓬勃发展。

为了建立信任和认可, 工人应当有机会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工具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工作流程和任务应当进行重新安排, 以有效整合人工智能技术, 同时满足工人的需求并保持有意义的人类角色。这种“协作型人工智能系统”应当增强而非取代工人, 促进工作满意度, 并为个人和职业发展创造机会。报告用更多的篇幅指出, 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数据和技能上如何进行重新设计, 使工人参与设计的人工智能工具有可能得到研发和应用测试。

[12] Nur Ahmed, Muntasir Wahed, and Neil C. Thompson,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industry in AI research: Industry is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technology’s future”, Science2 Mar 2023, Vol 379, Issue 6635, p.885.

[13] Ahmed, Wahed, and Thompson,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industry in AI research: Industry is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technology’s future”, p.885.

[14] “2025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report: Inclus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evelopmen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ir2025_en.pdf.

伯克利加州大学劳动研究中心 2025 年连续发布两份研究报告，提出实际应用先进技术的劳动者参与技术设计的思路，如通过以“工人中心”的治理、加强企业责任、提升透明度以及强化劳动力保护等手段，构建安全、公平的未来工作形态。报告指出，应引入一线工人的声音来防止工作岗位被过激策略所取代，并通过“人机协作模式”确保技术创新惠及所有劳动者，而不仅仅依赖技能培训来提高工人辅助先进机器运作的能力。^[15]

有意思的是，这三份报告都提到了人与机器协作系统的重要性。在参加阿西莫格鲁发起的大讨论时，一位技术专家指出了以“人机协同”（Human-AI Interaction, HAI）替代自动化取向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的可能性：“人工智能系统，反过来，可以在用户的帮助下与时俱进。当任务变更或流程调整时，系统可依托用户输入来修正认知、捕捉相关案例，并通过自我训练适应新场景。要实现这种运作，系统需要特定的能力：首先，能够观察用户，稳健地推断其状态、预测其意图和行动——甚至他们的参与程度和情绪状况。其次，基于对物理世界的常识，与用户进行有效沟通。这类似于人类的互动：通过借助物体、手势和指向来消除歧义，预判后续行动，必要时主动干预。我们需要突破现有聊天机器人的局限，打造多模态、有情境感知力的交互系统。最后，协同系统需要不断从用户那里学习，根据用户的输入持续优化感知和决策。它需要对自身的不确定性有原则性的理解，并寻求更多数据来改进自身的学习并解释自身的行为。”^[16]

实践中，“人机协同”研究近期取得快速拓展，最新的进展是探讨如何让人类深度参与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运营与采用过程，突破“可争议性”的局限，赋予用户自主权，使其能够调整乃至共同设计 AI 的内部机制。^[17]

形成用户自主调试人工智能的“人机协同”技术突破，或许能为各行各业，尤其是从事灵活就业的群体，提供辅助其独立处理复杂信息、独立决策的帮助——人工智能成为 David Autor 所希望的“私人专家”（personal expert）？

无论如何，这些不同于少数科技巨头引领的以自动化和监控为主要功能的技术发展探索，值得专门予以总结和推进。在政策上夯实“从需求侧来选择先进技术发展方向”的理念，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有机衔接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使先进科技落地为对多样发展需求有益的技术进步。

[15] Take the Mic: How Worker Voice Shapes Workplace Technology” , <https://techequity.us/wp-content/uploads/2025/07/Take-the-mic-worker-voice.pdf>; “AI & Workforce Development: Building a Secure, Equitable Future for Workers” , <https://techequity.us/wp-content/uploads/2025/11/AI-Workforce-Development-2025-Report-final.pdf>.

[16] Lama Nachman, “Beyond the Automation-Only Approach” , in Daron Acemoglu, Redesigning AI: Work,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p.74.

[17] Muhammad Raees, Inge Meijerink, Ioanna Lykourantzou, Vassilis-Javed Khan and Konstantinos Papangelis, “From Explainable to Interactive AI: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urrent Trends in Human-AI Interaction” , <https://arxiv.org/pdf/2405.15051>.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AI 是“大国博弈”工具？我们更需强调的是“多元探索”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
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成果，人工智能（AI）是能够影响大国博弈格局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到各界高度重视。但是，对人工智能的理论思考，却不能仅局限在大国竞争、科技竞赛等话题上，而是需要提出更多至少同样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例如，人工智能是否只有目前少数科技巨头引领的那一条发展路径，还是能否实施多样发展策略？

本文最初完成于 2024 年，彼时正值中美人工智能竞争话语兴盛之际。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事实上存在的状况，但是，在话语上过于强调“大国博弈”“先进技术竞争”，有可能掩盖公共政策推进多样发展、包容性发展的责任。结合当时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的反思，本文揭示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人工智能新发展路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文章隐含的主张是，“大国博弈”的要害在于综合国力的竞争，沿着目前美国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的那种人工智能技术路线（本文有时简称为“主流技术路线”）发展，不仅难以获得竞争优势，更可能损害中国政策急需关注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文章指出，可以在“非线性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技术方案；而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近期的一些产业政策，显示了对于人工智能多技术路线发展的激励，其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一、人工智能，不能仅从“大国博弈”视角来看待

仅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思考技术发展，容易将既有的主流技术路线看作唯一选择，从而既忽略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多重影响，又无法想象是否可能通过改变技术路线去实现更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价值。

近年来，仅将人工智能视为大国博弈工具的话语屡见不鲜。2021 年底，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Belfer Center）发布一系列报告，分析中美两国在科技、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实力差距，宣称中国是“世界曾经唯一大国的劲敌”，引起国际战略界的热议。^[1]

2024 年 8 月，独立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ITIF）发布报告，就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专利获取数量、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和算力）四个方面提供了更为翔实的数据，支持了贝尔弗

[1] “The Great Rivalry: China vs. the U.S.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great-rivalry-china-vs-us-21st-century>.

报告的结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懈努力和战略投资表明，它赶上（如果不是超过的话）美国此前的领先地位只是时间问题。”^[2]

无论贝尔弗报告还是内容更为丰富的 ITIF 报告，都把焦点放在中国对美国领先地位的挑战上，我们国内舆论在转载这些报告内容时也多仅突出中国在某些指标上的进步，这种强烈的大国博弈意识造成了对更紧迫议题的忽视：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有什么问题？中美两国是否应坚持在此路径下实施竞争？

事实上，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最显眼的一点就是少数科技巨头主导了人工智能研究。近年来的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科技巨头的影响力不是学术界或者任何其他机构所能比拟的。这些科技巨头在近年来创建的有价值的数据集、吸引的人工智能专业博士毕业生、获得的巨量资本投入，都远远超过大学、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

例如，2024 年 10 月 4 日 OpenAI 官网宣布获得的最新一轮融资 66 亿美元，这是有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性融资规模。斯坦福大学人本人工智能研究中心（Stanford HAI）发布的《2024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在 2014 年之前，是学术界主导机器学习模型的发明，而在此以后，产业界的主导地位愈加突出：2023 年全球有影响的机器学习模型中，产业界推出了 51 个，产业界与学术界合作推出了 21 个，学术界仅推出 15 个。^[3]

应该承认，如同创新与垄断关系的理论文献争论不休的那样，少数科技巨头主导人工智能研究，并不一定不能为消费者带来某些好处（例如可以节省探索成本、产品比较时间等），但会限制对主流技术路线的反思以及对多样技术工具的研发：主流技术路线被当作唯一的选择。这种“唯一选择”，对世界未来而言，并非福音。

首先，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的人工智能研究已出现成本越来越高、竞争性越来越弱的状况，表现出高度垄断化和集中化。

如 HAI 指数报告估算，2017 年最初的 Transformer 模型培训成本约为 900 美元；2019 年发布的 RoBERTa Large 培训成本约 16 万美元；2023 年，OpenAI 的 GPT-4 和谷歌的 Gemini Ultra 的培训成本分别达到约 7800 万美元和 1.91 亿美元。HAI 的一家合作研究机构提供了另一组估算：在过去 8 年，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成本每年增长 2 至 3 倍，这表明到 2027 年最大的模型的成本将超过 10 亿美元。^[4]

另外，在 2018 年大语言模型 GPT-1 问世后，人工智能研发进入“百模大战”时期，行业发展极为迅速。但是 HAI 指数报告指出：2015 年人工智能专利授予率为 57.8%，2022 年降至 32.6%，未获授予的申请（128952 件）是获授予数（62264 件）的两倍有余——人工智能领域专利资格授予率的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领域新产品的创新难度在上升，竞争在下降。

[2] “How Innovative Is China in AI?” <https://www2.itif.org/2024-chinese-ai-innovation.pdf>.

[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4”, AI Index Steering Committee,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I,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April 2024. https://aiindex.stanford.edu/wp-content/uploads/2024/05/HAI_AI-Index-Report-2024.pdf.

[4]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Train Frontier AI Models?” <https://epochai.org/blog/how-much-does-it-cost-to-train-frontier-ai-models>.

这种成本日益高昂和竞争愈加艰难的发展特征，在事实上将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所有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一般社会大众等都排挤在主流技术路线之外，少数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更为巩固，对数据等科技资源的集中控制也更加强有力。

其次，为大国博弈目的而推动主流路线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举措依然不时出台，许多决策经常不顾可能产生的多重经济社会后果。可以试举三例：

一是为了实现先进芯片制造的安全化，美国亚利桑那州在 2020 年引进台积电建设工厂。台积电承诺为这一项目斥资 650 亿美元，拜登政府在 2024 年 4 月宣布台积电获得由《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资助的 66 亿美元直接补贴。但是，这样的巨额投入能否对缓解美国日益恶化的发展不均衡有帮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就提出尖锐批评：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的三座晶圆厂预计雇佣 6000 名工人——每个工作岗位成本将超过 1000 万美元。即使预计在供应商行业增加的数万个工作机会成为现实，这在就业的回报上也是微不足道的。”^[5]

二是 2024 年 5 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牵头公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政策路线图，提议到 2026 年每年投资 320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寻求减轻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尤其建议实施国家数据隐私法和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出口管制。^[6]这个远超《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资助规模，致使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Forbes*）的专栏作者分析认为，舒默等议员其实并没有很大期望最终通过立法，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基于“保护美国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免受外国对手特别是中国的影响”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两党共识”。^[7]

三是与国会的努力相一致，美国商务部也在考虑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实施出口管制，尽管这种不涉及实物产品的限制措施，无论标准如何确定，都会较为武断地损害到一定范围的企业利益（例如，是以训练模型的算力为标准，还是使用较低的计算机功率阈值，同时考虑使用的数据类型和模型的预期用途等其他因素）。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出于大国博弈目的未加反思地支持主流技术路线，会威胁到未来发展的多样性可能性。2024 年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近年来一直在提醒，主流人工智能路线具有强化监控与自动化的技术取向。他的这个认识目前已经部分获得了证实。例如，阿西莫格鲁自己研究指出，谷歌（Alphabet）和微软（Microsoft）牵头开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就需要高度集中信息，在数据控制下产生进入壁垒，使持续在线参与和个性化数字广告的商业模式得以发展，滋生情绪愤怒、极端主义和网络回音室效应。^[8]此外，国际劳工组织（ILO）2023 年 8 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

[5] Dani Rodrik, “America’s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Will Create Few Good Jobs”,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manufacturing-employment-falling-despite-investment-policies-by-dani-rodrik-2024-04>.

[6] “Driving U.S. Innov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Roadmap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in the U.S. Senate”, https://www.schumer.senate.gov/imo/media/doc/Roadmap_Electronic1.32pm.pdf.

[7] Owen Tedford, “AI Industrial Policy Takes Shape In Washington”, <https://www.forbes.com/sites/owentedford/2024/05/16/an-american-industrial-policy-for-ai-takes-shape/>

[8] Daron Acemoglu, “Hayek vs. AI Socialis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 37, Iss. 2, (Spring 2023), p.49.

告分析指出，目前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大规模取代劳动力的风险，但是这项技术将某些任务自动化的能力十分显著，受自动化影响的职业和工作群体在明显增多。^[9]

总的来说，有研究已说明，主流技术路线的取向是倾向于将关于未来的想象限制在监控和（自动化导致的）无工作上。仅出于“大国博弈”的目的而强力支持这一路线，则相当于在遏制未来的多样可能性。

但这种关于未来的受限的想象并非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认识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人工智能还有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真实需求出发“选择”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创造更丰富多样的未来发展景象。

实际上，美国也并不是仅仅执着于少数科技巨头领导的那一种技术路线，联邦政府同样在探索多样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如从 2019 年开始推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NAIRI）项目计划，2023 年又制定“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方案”（NAIRR Pilot），推动产业界和学术界共享国家研究基础设施。

作为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大国，中国更不能囿于目前的人工智能主流发展路线。因为坚持在此路径上追赶，既难以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如仅仅在研究发表、专利获取数量等指标上突飞猛进，实质影响力却相当不够），又可能在勉强的追赶过程中产生意想不到的重大损失（如资源大量浪费、忽视对劳动力的持续培育等）。

二、非线性创新：人工智能多技术路线探索的可能性

那么，从技术实现的角度讲，是否可能“选择”新的人工智能发展路线？

注意一个悖谬之处：执着于“大国博弈”的话语，对于长期处于追赶地位的国家而言，反而更容易放大美国科技政策的某些局部经验，将之奉为圭臬。

比如，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二战结束时呈交给美国总统的著名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在我国知识界长期被解读为倡导了一种“线性创新观”（即创新沿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的线性路径发展），用以论证国家对基础研究的特别支持。

但是，其一，布什报告中并没有线性创新模式的内容；^[10]其二，线性创新模式也不是美国科技创新能力飞跃的保证。布什报告在科技政策方面体现出的主要作用，是它建立了争辩联邦科学资助的话语策略，使后来成立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形成了一种政策论述风格。^[11]

“线性创新观”所主张的创新分工方式——基础研究在大学等科研机构，应用和转化主要依靠企业——能在美国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占据一定的位置，与二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企业日益增强从外部获取发明创新的能力等特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不能仅从美国在此时期开始增加对大学科研投入的事实，简单总结出一个“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就能实现科技实力整体提升”的线性创新经验。^[12]

[9] Paweł Gmyrek, Janine Berg, David Bescond, “Generative AI and Jobs: A global analysis of potential effects on job quantity and quality”, https://www.ilo.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7/WP96_web.pdf

[10] Benoit Godin, Models of Innova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7, p. 75.

[11] 王作跃（Zuoyue Wang）：《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安金辉、洪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2] 阿希什·阿罗拉、沙伦·贝伦佐、安德烈亚·帕塔科尼、徐政奎：“不断变化的美国创新结构”，载乔希·勒纳、斯科特·斯特恩编著：《创新政策与经济发展》，孙国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

与我们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是，如果将创新视为线性发展过程，那么就很难看到创新过程中改变技术路线的可能性——科技实力落后的国家，多数仅强调在基础研究领域“追赶国际学术前沿”，只在先进国家的问题意识后面亦步亦趋。必须认识到，要实现新的探索，当然需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能力，但如何加强，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整体提升科技实力，则需要更加深入地认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等活动本身。

两位工程学专家分析指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是一种基于研究动机的分类。要是考虑到研究活动是复杂、系统且动态的过程，则会发现这个二分法的局限。他们梳理了从 1956 年开始由于在信息通信领域的理论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六项科学工作，其中一些工作还同时获得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颁发的德雷珀奖（Draper Prize，奖励工程类技术发明），揭示出科研活动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六项科学工作“展现了多种类型知识在创新中的作用，正是这些创新创造了我们当前的信息通信时代。……这些研究都可被划归到‘基础’或‘应用’研究类别，但这种分类方式忽略了这些研究的复杂性和跨类别性。更糟糕的是，它会让那些反对‘应用研究’者的偏见更加强化。”^[13]

他们因此提出：“研究活动应该被更精确地描述为‘发明-发现循环模型’，而不是固化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我们相信，这种方法更适合这一公共物品（the public good）。”^[14]

“发明-发现循环模型”揭示的是一种“非线性创新观”：创新过程并不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线性路径前进，而是通过技术发明与科学发现二者之间的交互促进得以实现的。科学原理、技术发明、应用技能及经验、管理策略、日常需求等多种知识都在其中起到作用。在科技发展史上，蒸汽机的发明与热力学的发现是证明非线性创新观的更著名的案例。

有趣的是，这两位专家发现，他们所梳理的六届诺贝尔奖的 16 位获奖者中，有 10 位有着在美国大型工业实验室长期从事科研的经历；另外 6 位科学家中有 3 人来自苏联的研究机构，1 人来自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另外两人分别来自美国政府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这个认识很有意思，表明了传统被分别称为基础/应用研究（工业研究）的经历，其实存在着很强烈的相互促进的联系。

依照这个思路简要检索一下，还能够看到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得主，其研究成果也多与政府任务型项目或产业领域相关。比如 2000 年以后获奖者中，有 5 位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得到过政府任务型项目支持，有 4 位化学家的获奖成果是在产业领域做出的理论创新。

人工智能与非线性创新观有什么关系？这里值得专门介绍麻省理工学院三位专家 2023 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该研究明确指出，所谓“大学负责基础研究，企业负责应用和转化”的线性创新分工在人工智能领域根本不存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比如谷歌大脑研究团队（Google Brain）在 2017 年推出的主要用于自然语言处理（NLP）和计算机视觉（CV）领域的深度学习模型 Transformer 架构，既是能即刻投入应用的产品，又是基础知识探索上的重

[13] 那拉亚那穆提、欧度茂苏：《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黄萃、苏竣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6 页。（译文略有调整，下同）

[14] 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图鲁瓦洛戈·欧度茂苏：《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第 47 页。

大进步^[15]——Transformer 与循环神经网络 (RNN) 和卷积神经网络 (CNN) 相比, 实现了借助自注意力机制捕获输入序列中的长程依赖关系, 更能处理长序列并且自行计算。^[16]

2024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位人工智能专家, 表彰他们“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的基础发现和发明”, 更展现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震撼全球的科技产品, 同时又是物理学的发现和知识突破。由此可知人工智能同样具备显著的非线性创新特征。

“发明-发现循环模型”的提出者这样总结科研活动的非线性创新特性: “在我们的模型中, 发现与发明循环可以双向跨越, 研究知识可被视为在跨越循环中随时间演化的一个整体。循环的双向性表明一个事实: 发明并非总是发现的产物, 它也可能是其他发明的产物; 同时, 重要的发现也可能来自新的发明。”^[17]

人工智能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显著的“双向跨越”特征, 才能实现多技术路线的探索。

一方面, 这种特性造成了科技巨头有可能通过加强其应用端的优势反过来增强其在研究端的主导作用: 科技巨头拥有更强的算力、更为庞大的数据集和更多的技术专家, 这使得产业界的研究具有通用性强、与一般性实践问题结合更紧密、跨越多个学科等特点。在基于其产品影响力而吸引更为巨量的资金和人才资源之后, 这样的结果就顺理成章了: “产业界对应用端的主导也给予了它塑造基础研究方向的权力。”^[18]

而在另一方面, 这种特性也潜藏着探索更多技术路线的理论保证: 通过重新定义和强调“应用需求”, 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需求部署创新活动, 有可能形成更多的不同于少数科技巨头所主导的研究方向。

这里的重点问题因此变成了如何重新定义和强调“应用需求”。

抽象地讲, 答案不言而喻, 因为即使是科技巨头也从不反对科技进步是为了“人”, 如 OpenAI 宣称它的使命是开发“安全且有益”的“在最具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表现优于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谷歌人工智能部门在其官网上展示的理念同样是“让人工智能造福每个人” (Making AI helpful for everyone)。

然而, 关键在于, 是科技巨头根据其“单方面主张人类经验作为转化成行为数据的免费原材料”^[19]的特权, 还是每个个体作为“不可能被局限在我们所构建和栖居的理念和社会世界之中”^[20]的有自主发展能力的主体来定义应用需求?

[15] Nur Ahmed, Muntasir Wahed, and Neil C. Thompson,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industry in AI research: Industry is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technology’s future”, *Science*, 2 Mar 2023, Vol 379, Issue 6635, p.885.

[16] Ashish Vaswani et al.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https://arxiv.org/pdf/1706.03762>.

[17] 那拉亚那穆提、欧度茂苏: 《发明与发现: 反思无止境的前沿》, 第 57 页。

[18] Ahmed, Wahed, and Thompson,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industry in AI research: Industry is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technology’s future”, p.885.

[19]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p.8.

[20] Roberto M. Unger, *The Knowledge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9, p.44.

美国从 1970 年代中期以来推动信息技术革命，着重支持前端研究，但创新议程并不涵盖能够扩大就业规模的制造业等产业，由此导致信息技术研发脱离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停滞的劳动生产率、持续衰败的制造业没有产生帮助。^[21]

现在，在科技巨头主导下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很大程度上在加剧此前的发展不均衡。

因此，目前需要强调的是，尊重每个个体作为有自主发展能力的主体，首先应当尊重其日常生产生活经验和具体需求，然后再思考是否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对其自身处境的超越。就公共政策而言，是要使研发活动与日常生活生产的创新紧密联系起来。^[22]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工作”研究小组为此在 2019 年就提出倡议，^[23]他们的政策建议已经体现在美国联邦政府 2019 年开始推动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NAIRI）项目计划中。^[24]

三、中国政策蕴含对 AI 多技术路线探索的激励，需要大力推进

仅从“大国博弈”视角出发，可能会将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就看成对世界既有秩序的重大威胁，而忽略许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来的一些政策，显示了激励多技术路线探索的意图，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值得持续挖掘。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4 年 1 月印发《2023 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及 2024 年主要工作计划》，提出“在 6G、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采用多技术路线平行探索的方法抢占技术制高点”“制定《广东省关于大力发展通用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千行百业的实施方案》，拓展千行百业应用场景，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同时，要加快人工智能嵌入制造业各领域各环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4 年 2 月通过《“数字住建”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加强应用牵引和场景驱动，构建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综合应用体系，全面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业务数字化转型，赋能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原则；

——农业农村部 2024 年 10 月出台《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需求牵引、以用促研，立足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实际需求，树立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因地制宜探索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引导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21] 李寅：《当代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缘起——“新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漫长阴影》，载《文化纵横》2022 年第 6 期；蒋余浩：《数字经济、参与式发展和技术路线可选择性——共同富裕战略的初步思考》，载《开放时代》2023 年第 5 期。
[22] 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沈开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年，第 45-47 页。顺便说明，本文强调的“需求”既是内生的，又是可建构的，因此需要以一种“结构变革的视野”来加以思考，使供给—需求交互促进起来。See Roberto M. Unger, *The Knowledge Economy*, pp. 203ff. 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丰富的政策运作空间。相关理论分析，见崔之元：“新三位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和共同富裕”，载《清华金融评论》2022 年第 3 期。

[23] MIT Work of the Future, “The Work of the Future: Shaping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http://web.mit.edu/2.810/www/files/readings/WorkOfTheFuture.pdf>.

[24] 关于 NAIRI 项目运作机制及其理论基础的详尽分析，见戴明洁：“多点开花：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启发”，2024 年未刊稿。

工业制造、建筑建材、农林牧渔等领域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背景下相继提出的政策主张，深刻表明了探索多技术路线发展的需求。不同的行业都有其成熟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方案，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抵制可能改变它们既定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的创新”。^[25]

需要考虑的，正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发明能为之提供切实帮助的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地颠覆掉原有的技术路径和发展生态。^[26]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对此有明确指导：国务院 2017 年 7 月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围绕不同的应用需求而一体化配置研发、应用和产业培育力量。这种非线性创新政策可以成为发展嵌入不同行业的人工智能的保障。

在中国，产业界也有相当不同于美国的情景。如华为、阿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相继推出了公共云，服务于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华为还推出了“盒装人工智能”（AI in a box），供企业在本地运行。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有益尝试，其持续的发展依然需要通过研究与应用的一体推进、发现与发明的循环促进。

公共政策可以提供的支持，一方面是更多拓展应用场景，让不同的理念和产品得到应用端检验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激励学术界同产业界深入合作，既共同解决应用问题，又从应用过程中提炼科学问题，推动实现科学原理的新发现。只有将人工智能的非线性创新特征充分展现出来，我们现有的丰富实践，才可能真正展露探索多样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路线的价值。

还应建设一些关键性基础设施和制度机制，既提高各个区域和各个行业获取科技资源和研发资金的机会，又促进技术应用和原理探索真正实现相互促进。

例如，其一，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打造 AI 研发公共基金，牵引科研机构、产业界和社会资本组成攻关团队，支持从该区域的真实应用需求出发展开研究探索，同时围绕这些探索部署人才培育、政策法规、核心算法和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软硬设施建设，在整体上逐步构建出多技术路线探索的发展格局。

其二，基于需求建立多类型公共数据语料库，训练不同性能模型。数据与模型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并不必要一味模仿大模型训练方法。可以在数据结构化、数字化、标准化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和提升，创建公共研究云和公共数据集，训练通用性能模型。此外，对于许多传统行业和专业领域，由于商业价值不高，难以吸引数据科技企业进入，可以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建立专业数据集，以知识密度更高、维度更多元的语料训练具备专业性能模型。

其三，学习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Gesellschaft）、美国“创新园圃”（Innovation Orchards）等支持中小初创企业实施创新升级的机制，^[27]针对中小微创新型企业开放科技资源并提供融资、科技服务和企业成长扶助等方面的帮助，培育更为丰富的创新型市场主体。

[25] 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第 5 页。

[26] 关于传统行业技术创新的需求和难点，William B. Bonvillian and Charles Weis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Legacy Sect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 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第七章。

其四，深化改革人才培育和人才考评体制，突出强调跨专业性、协同性和实际效用。尤其需要变革目前基于学历、专业、人才帽子、履职经历等标准评价人才的做法，既激励不同行业的优秀人士有热情、有勇气不断学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新技术与各个行业的深度融合、交互促进，又激励各类科研人员参与、观察实际发展状况，从实践中提炼科学问题，推动科学原理探索创新。

无论怎样，本文主张，针对人工智能，一是需要考虑技术变革引发的多重经济社会后果，二是基于经济社会多样发展需求探索多技术路线。人工智能研究活动的复杂性展现了非线性创新的基本特征，可以在“（技术）发明－（科学）发现”交互促进过程中寻找多元创新契机。中国的政策已有关于“应用牵引”“场景驱动”“以用促研”“产学研用各创新主体共创共享”等一系列引导性设置，更进一步的工作是建立切实的制度机制，使供给（科学原理发现和应用技术发明）与需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自身的发展需要）二者联动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全社会积极参与和促进科技进步，并且公平共享创新发展红利的环境。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美国加速 AI 军事化，硅谷的华人人才怎么办？

戴明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硅谷的代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入五角大楼的指挥系统。去年以来，从 OpenAI 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携手，到马斯克旗下的 xAI 为美国军方开发专用 AI 模型，一条清晰的“科技-军工”融合路径正在美国迅速铺开。叠加 2026 年开年美国在抓捕马杜罗与美以对伊军事行动中对 AI 技术的应用，全球 AI 竞赛正加速迈向“下半场”，从前沿科技和商业竞争维度，转向国家安全与战略优势领域。

在这一趋势下，那些在美国顶尖 AI 实验室和科技巨头中承担关键研发工作的华人工程师与科学家们，其处境与选择也被摆上了大国博弈的棋盘。尤其是在美国将 AI 与国家安全、新战争形态捆绑的趋势下，AI 顶尖人才在科技企业、发展目标国之间的选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人行为与商业利益考量，成为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议题。

一、硅谷华人 AI 人才的“选边站”困境

一个关键事实是，自二战以来，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一直建立在吸引全球人才的基础之上。此轮 AI 科技革命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华人人才首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眼下，美国 AI 技术的军事化转向，正将硅谷顶尖华人 AI 人才置于“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夹缝之中。

2020 年，《纽约时报》就曾发布过以“美国 AI 的秘密武器：中国人才”为主题的报道。美国智库 MacroPolo 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工作的顶尖 AI 研究员中，超过 2/3 本科毕业于其他国家，其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最高，达到 38%。^[1]

这一图景印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在基础学科和工程人才培养上的显著成功，但在美国 AI 军事化以及硅谷日益由“科技右翼”主导的环境下，一个尖锐的问题随即浮现：美国关键 AI 项目中的华人人才，将被置于何种位置？他们是会遭遇“安全隔离”，还是会被吸纳进美国的“科技-军工”体系？

一方面，基于美国日益严格的安全审查制度，涉及国防和敏感技术的核心项目对非美国公民，特别是持有中国国籍的研发人员将设置更高的权限壁垒。中国国籍的研发人员甚至会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来

[1] MacroPolo 智库。《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 2.0》：75% 顶尖 AI 人才来自美中两国，2024-03-19，<https://mp.weixin.qq.com/s/tBD4oqrNW1BIg7TpfLQWgQ>

自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压力将日益增大。在硅谷集体“右转”、“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舆论环境中，硅谷的“科技理想主义”色彩日益褪去，“科技应服务于国家竞争优势”的“科技右翼”主张日益凸显。这些顶尖华人人才即便贡献卓著，其忠诚度也时刻受到美国社会的质疑，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撕裂与职业的不安全感。

二、“在美国的中国人”与“在中国的中国人”之间的竞争

除了个人的“选边站”困境，在国家层面，中美 AI 也将面临“在美国的中国人”与“在中国的中国人”之间竞争的可能。

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顶尖 AI 人才的“最大培养国”，但却不是“发展首选地”。根据 MacroPolo 智库报告，中国培养了全球最大比例的 AI 人才（46%），远超美国（17.5%）和欧洲（11.65%）的总和，占据全球 AI 人才培养的几乎一半。

硅谷 AI 华人人才大多具备“中国本科—美国硕博—美国工作”的发展路径。他们大多在中国顶尖院校接受本科教育，毕业后选择赴海外深造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然后加入当地的科技型企业或科研机构。如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首批“AI 超级天才”名单中，有 22 人具有中国教育背景，占比达 50%，其中 18 人毕业于清华、北大、中科大等国内顶尖院校。

这意味着，随着硅谷的这部分力量日益深入地与美国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军事安全战略相绑定，其带来的不仅是人才的流失，更是国家风险的累积。中国付出巨大成本培养的顶尖人才，不仅将在美国的商业与科研体系中创造价值，更可能在其国家机器的驱动下，被用于构筑针对母国的“非对称优势”。

历史的殷鉴并不远。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流失到美国的人才，与苏联竞争并取得了胜利。今天，基于美国军民技术融合的传统（美国国防部历来是硅谷创新的重要推手）和当前的新型“科技—军工复合体”趋势，正让类似的剧本在 AI 领域重演。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与当时苏联类似的情况，即：美国正在用全世界的人才，尤其是从中国到美国发展的人才，来与中国竞争。

三、美国为何能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尽管可能在未来的军事化浪潮中面临去留抉择，但为何如此多的中国顶尖 AI 人才仍选择在美国发展？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剖析美国为什么能持续几十年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其中的关键是，美国打造了一个涵盖经济激励、产学研协同、创新文化等多维“隐性优势”于一体的人才吸引策略，为全球顶尖人才创造了一个“回报高、成长快、阻力小”的世界一流创新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如何动荡，也不论全球的经济格局如何演变，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会向它聚集，并且来了之后就很难离开，从而呈现出一种“地域嵌入型”的特征。^[2]

[2] 郑永年。人才高地建设与中国的科技现代化。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37(12): 1671-1674.

首先，是财富激励与价值实现的双轮驱动。美国科技企业开出的高薪酬对全球人才都有巨大吸引力。以 2024 年全球 AI 工程师年收入中位数为例，美国旧金山湾区最高，达 31.8 万美元；中国排在第 10 位，薪资约 9.3 万美元。^[3]

而且，相比于高薪酬，顶尖人才其实更加重视其在 AI 变革中的“参与感”。相较于单纯的经济激励，他们更希望能够参与到新一轮科技革命中，通过个人价值去塑造参与社会变革的影响力。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分析，许多跳槽者都表示，经济回报并非他们单一的追求，仅 31% 的受访者将薪资列为首要因素；而超过 60% 的人才更看重“技术变革参与感”“研究自主权”“社会影响力”等。

其次，是多元化、讲求实用性的人才评价体系。xAI、OpenAI 等 AI 企业在招聘顶尖研究员时，并不拘泥于国籍、学历、经验等标准，而是看重人才在研发项目中锻炼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比之下，中国人才评价体系的核心问题是设定了一系列诸如学历、就职履历、人才“帽子”、论文专利数等“形式主义”指标，未考虑人才的实用价值。这样的评价体系可以产生大量的一般性成果，但却不利于产出有重要性、原创性的颠覆性成果，因而很难吸引顶尖人才。

再次，美国在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与科技企业的“硬环境”下，还配套了“产学研”高效协同的“软环境”。其中，校企“旋转门”机制为人才流动与跨组织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机遇——大学教授可以便捷地创业或到企业兼职，企业专家也可以到大学授课。这种人才的高频流动确保了知识、创意与需求的高效流转。

相比之下，我国近年来虽然一直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但产学研体系仍处于相互分隔的碎片化状态。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有各的人才培育标准、考核评价体系，导致产学研三方难以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的创新合力。产学研之间的分隔，割裂的是人才发展的广阔空间，以及人才在交叉复合型空间中发现创新点子的机遇。

最后，是创新文化的隐性优势。美国的创新文化继承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总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北贝塞斯达的跨国国防及航空航天企业) 的创新组织模式，其核心是认为颠覆性创新需要“去官僚化管理”。这种文化认为，最顶尖的人才只有在最开放的环境中自由探索，才最有可能产生颠覆性创新。

相较而言，中国的“内卷”文化正在消耗着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国内科技行业普遍存在的“996”高压工作制与过度竞争，正导致人才身心俱疲。中国互联网大厂的研发人员虽然薪资较高，但普遍被戏称为“码农”，这种戏谑折射出的是一种牺牲身体健康、牺牲休闲时间来换取高工资的无奈和疲惫。

四、从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到 AI 时代的“中国人才之问”

关于中国的人才问题，历史上有着经典的“李约瑟之问”和“钱学森之问”。当代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提出：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中国？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结合这一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使得相当一部分国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怀疑中华民族是否本身就缺乏创新基因。

[3] Levels.fyi. AI Engineer Compensation Trends Q1 2024. 2024-05-14. <https://www.levels.fyi/blog/ai-engineer-compensation-q1-2024.html>

但是，“钱学森之问”却把思考指向了体制因素。他的原话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换句话说，钱老并不认同中华民族缺乏创新基因的“文化宿命论”。他更相信，通过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是可以培育出科技人才的。

当前，中国的人才培养实践至少已经证明了两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优秀的中国人才，如李政道、高锟等，在海外创造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以事实驳斥了“中华民族缺乏创新基因”的谬论；二是在近期的 AI 革命浪潮中，大量接受中国本科教育的华人在全球顶尖机构和企业中担当科学家与工程师，打破了钱老对于中国“难以培养出科技人才”的担忧。

因此，继“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之后，如今中国最需要思考的人才问题应该变成：中国人有创新基因、中国也能培养出世界顶尖人才，但为何中国留不住？

面对“中国培养—美国发展”的 AI 人才困境，我们思考的重点可能要回到中国人才培育体系中存在的“重培养、轻发展”问题上：国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前期的人才培养上，而在后续上没有为人才发展建立激励机制和创造发展环境。

如果说中国是人才的“早期培养型”大国，那么美国则是人才的“中后期发展型”大国。这种差异导致中国正面临着人才“培养—流失—再培养”的恶性循环。这不仅是对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恶性循环中流失的大多是能力出众的顶尖人才而非普通人才。

在现有的中美人才格局下，“走出去”（出国留学并在海外找到工作）要比“留下来”（本土深造和工作）对人才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

五、从“货币化”人才政策转向打造“地域嵌入型人才生态”

面对美国 AI “军事化”带来的新挑战，以及“中国培养—美国发展”的人才困境，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如何才能不止于培养世界顶尖人才，更能构建一个足以留住他们、吸引全球英才的“人才发展高地”？

近年来，国家已经推出一系列的海归政策与引才计划，旨在通过优厚的待遇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发展。然而，这种依靠“重金挖人”的“货币化”人才政策，在当前的竞争格局下已显现出其局限性乃至副作用。

一方面，这样的政策不利于当前中国本土 AI 人才的稳定发展。当中国以高报酬吸引在美国的 AI 人才回国，就相当于为目前在中国本土读大学的学生、在中国企业工作的研究员与工程师释放一种政策信号：去美国读书深造或者跳槽到美国企业工作，未来就会被国家以更为优厚的待遇吸引回国，甚至享有更加尊贵的人才身份或“帽子”。这显然不利于本土既有人才的稳定。

另一方面，片面的高报酬人才计划很难真正吸引 AI 顶尖人才，反倒更容易吸引普通人才，甚至是“投机分子”。中国科学院王贻芳院士在访谈中曾提及：一般的科研人员、一般的科研成果，中国已经有

很多。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最顶尖的人才还是在海外。经费很重要，但外国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是科研环境——志同道合的圈子，能够一起讨论、得到启发，这是科研人员成长最重要、最有效的条件。^[4]

因此，相较于传统的“货币化”人才政策，新的人才政策需要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将政策资源更多地放在打造创新生态上，从而营造出让人才愿意来发展的“嵌入型生态环境”。

这一转变的核心是打造“地域嵌入型人才生态”。可以在少数具备条件的区域（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通过突破性的“块块”改革，打破行政与体制壁垒，将一流的大学、顶尖的企业、活跃的资本和高效的政府服务深度融合，构建一个让人才可以自由流动、让资源可以高效配置、让创意能够快速实现的“开放式创新共同体”。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这里之所以还未成为比肩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人才平台”，关键原因在于广州、深圳和香港等核心城市并未形成协同互补的合力，而是呈现出内部恶性竞争的态势。另外，由于行政壁垒与体制机制障碍，粤港澳大湾区的产学研协同效应还并不突出。

就个人层面，想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人才，更多的是需要在广州、深圳、香港这几个大城市之间做出选择，难以自由流动于各个城市之间，充分利用各大城市的红利来激发自身潜能，以实现协同效应。

因此，在未来，一方面要打造开放的基础科研、技术研发与科技金融系统，承载和吸引人才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产学研之间的开放合作，将人才成长嵌入基础科研、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的创新全链条中，加强人才对本地创新生态的嵌入性。

[4] 中科院院士评价国内的人才流失：最优秀的人才，现在仍然是流失的。而流失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外国的科研环境好。2024-12-14, <https://mp.weixin.qq.com/s/6w7y8rbKF2wMZgOnvA4zQQ>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与人才】

Manus 被收购背后，中国 AI 正在“向外生长”吗？

对话人

戴明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刘深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新媒体主管、政策分析师

刘深：就在 2025 年末，中国科技圈和人工智能圈爆出了一条重磅消息：今年年初曾引发广泛关注的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 Manus，据报道将被 Meta（Facebook 母公司）收购。报道称，这笔交易规模约为 20 亿美元，是 Meta 成立以来第三大收购，金额仅次于 WhatsApp 和 Scale AI。随后，Manus 也在官网发布消息称，公司即将加入 Meta；相关产品与订阅服务将继续通过 App 和网站向用户提供；同时，公司将继续在新加坡运营，Manus 创始人之一肖弘也将出任 Meta 副总裁。那么到了 1 月 8 日，商务部在回应有关审查 Meta 收购人工智能平台 Manus 的提问时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收购与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对外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开展评估调查。商务部的这一表态，也让 Manus 被 Meta 收购的前景蒙上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从年初在国内“火得一塌糊涂”，到短时间内完成业务外移并被美国科技巨头纳入旗下，这家一度被认为前途无量的 AI 公司，为何会选择离开中国？这一转折背后，又折射出哪些更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围绕上述问题，我们特别邀请 IPP 研究员戴明洁博士，为我们带来解析。

戴明洁：关于 Manus 事件，如果将其发展轨迹作一番简要梳理，最重要的无非两个节点：一是年中公司整体迁往新加坡，二是年底被 Meta 收购。将这两个节点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 Manus 会在今年反复进入公众视野，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讨论样本。

这一关注首先源于其年初推出的产品。年初，Manus 发布首个 AI Agent，迅速引发市场对 AI 智能体研发与应用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公司本身长期活跃于资本市场和科技圈，一直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

在产品走红之前，市场对 Manus 的资本走向就已多有讨论。早在 2024 年，业内曾传出 Manus 可能被字节跳动收购的消息，当时讨论的交易规模约为 3000 万美元。进入 2025 年 3 月，公司首个智能体产品正式发布并迅速走红，关注度随之显著上升；随后在 6 月，投资人和创始团队公开宣布将公司整体搬迁至新加坡，中国区的 120 多名员工中，80 人被裁员，其余 40 名核心技术人员则整体随迁至新加坡。这一决定在当时也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关注。到 2025 年底，Meta 收购 Manus 的消息逐步浮出水面，并最终成为焦点。

需要指出的是，Manus并非首个被国际科技巨头收购的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早在2018年，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之初，苏州一家从事AI芯片研发的企业——深鉴科技，就被美国芯片巨头赛灵思（Xilinx）以3亿美元收购。

近一两年，在芯片和AI相关领域，类似并购案例出现得愈发频繁。以英伟达为例，其持续收购由华人创立或以华人团队为核心的AI初创企业，其中较为知名的就包括焦建涛创立的NexusFlow。

将这些案例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英伟达CEO黄仁勋本身是华人，而其收购的多家AI公司，无论创业地点在美国、加拿大，还是中国，往往都具有明显的华人背景。与其简单理解为“美国企业收购中国企业”，不如说，美国科技企业正在系统性地吸纳由华人创立，并在海外（或外迁后）发展的AI公司。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更倾向于从中美科技竞争的视角，尤其是从战略资源外流的角度，来理解Manus事件。它所牵涉的，并不只是单一企业的去留问题，而是中国长期投入资源培养的科技人才，以及在本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科技初创企业，正被纳入全球科技竞争的另一条轨道之中。

从目前的观察来看，这类企业与人才的外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培育、由华人创业，随后流向海外，并最终在海外被收购，Manus即更接近这一类型；第二种，是华人创业者从一开始就选择在海外创业，例如360副总裁陆剑锋于2019年前往新加坡创办WIZ.AI，以及前百度副总裁景鲲直接在美国成立MainFunc；第三种，则是企业本身起步于海外，由华人团队主导，随后被美国科技巨头收购。

尽管路径各不相同，但这三种形态背后反映出的核心问题是相通的：中国投入大量资源培养的人才，以及在本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科技企业，在全球技术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仍在持续外流。

刘深：接下来也想请您进一步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才不选择留在国内，而是远走海外？毕竟我们也看到，近两年国内AI的整体发展态势并不差——模型很多、资金也不少，各方面支持力度都在加大，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要走？

戴明洁：在这一问题上，企业与人才的流动逻辑并不完全相同。这里我主要从企业，尤其是AI初创企业的角度来谈。总体来看，企业选择外迁，既受到美国科技地缘政治压力的影响，也与国内创业生态和商业化环境密切相关。

以Manus为例，其当年选择外迁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动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美国投资审查带来的资金压力是Manus快速出走的直接原因。最直接的导火索出现在B轮融资阶段。去年5月，由硅谷顶级风投公司Benchmark领投的7500万美元B轮融资，成为Manus出走的导火索。因为这笔投资触发了美国《对外投资安全计划》的严格审查，而这类审查通常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对初创企业而言，如此漫长且高度不确定的周期会使其在现金流上难以承受。在这一现实约束下，若希望继续推进融资，迁出中国便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策略选择。

第二，美国出口管制升级使得Manus面临硬件获取与软件生态接入的技术限制。自中美“芯片战”以来，初创企业在获得先进芯片方面普遍面临更大压力，而Manus的情况尤为突出。作为一家专注AI

智能体的公司，其对芯片和算力的需求本身就更高。公司内部研发负责人曾提到，由于无法获得英伟达最新芯片，相关研发进度一度被迫延缓约 2—3 个月。在智能体这样的前沿赛道上，这种延迟会显著削弱其与美国同类公司的竞争力。相较之下，若迁往新加坡，或直接被美国企业收购，上述压力会明显缓解。

第三，中美 AI 付费市场的差异以及中国企业间的低价竞争，使得 Manus 面临着巨大的商业化压力。今年国内频繁出现“内卷式”竞争“低价竞争”等说法，Manus 也难以置身事外。整体来看，中国 AI 市场的付费意愿与美国仍存在明显差距：美国市场 AI 产品的付费率接近 20%，客单价约 30 美元；而中国市场的付费率约为 3%，客单价折合美元约 5 美元。Manus 作为智能体产品，其单次任务处理成本大约在 10—50 美元之间，这样的收入水平难以覆盖研发和运行成本，使其在商业化阶段本身就承受较大压力，也更加依赖融资“回血”。

与此同时，公司还面临本土大厂的低价围剿。同期字节跳动推出的“扣子”（Coze）海外版三档会员价格仅为 9、19 和 39 美元，直接对标 Manus 的 19、39 和 199 美元定价体系。凭借更强的资本实力，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在早期通过持续烧钱，对初创企业形成“降维打击”。在这样的环境下，若继续留在国内市场，无论是市场本身的变现能力，还是来自本土科技巨头的竞争压力，企业后续的商业化难度都会显著上升。

总的来说，可以说 Manus 的出走是在海外资本压力、海外技术限制、中国市场困局，以及更宏观的科技竞争环境下做出的一种妥协。

刘深：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很微妙的细节：Manus 想要对接国际市场，却并没有直接去到最领先的美国，而是选择先去新加坡，而且目前总部仍然设在新加坡。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这样一个地方？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戴明洁：从本质上看，在当前全球 AI 创新格局中，新加坡实际上可以被视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当下的全球 AI 科创版图，大致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中国板块，二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体系。

之所以说新加坡“本质上更接近美国”，关键在于企业在当地所能获得的条件——无论是投资环境、算力获取，还是数据跨境流动，都与美国本土高度相似，而这些正是 AI 企业发展的核心基础要素。

相比之下，企业若直接赴美布局，往往面临更高的制度门槛与现实成本；而新加坡在制度设计上高度开放，对海外企业和高端人才具有天然吸引力。因此，许多中国企业会将新加坡视为一个现实可行的“跳板”。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跳板”并不只是通往美国市场的中转站，它使企业能够更顺畅地接入整个国际 AI 创新生态——而在当前阶段，这一生态本身仍由美国主导。

刘深：说到新加坡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国家自身也有一个类似的存在——香港。我们也知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互联网数据流动等方面，限制相对也不多。为什么香港在这一轮竞争中，似乎是落后于新加坡的？

戴明洁：对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所处的国际环境，二是各自的发展路径。

从国际环境看，核心仍然是地缘政治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新加坡在当前全球 AI 科创格局中，本质上嵌入在以美国为核心的体系之中；而从外部视角看，香港更多被视为与中国高度绑定。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确实将香港定位为国际化窗口，承担“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但自 2019 年香港的社会事件及国安法出台后，西方舆论对香港的叙事发生明显转向，不再强调其国际中介功能，而是刻意强化其“内地化”形象。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若选择赴港发展，在美国主导的科技地缘政治体系中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与留在中国内地相比并无本质差异，这使香港难以成为企业眼中的“中转地”或“替代选项”。

从自身发展路径看，香港与新加坡也存在结构性差异。新加坡的突出特点在于，在过去几轮全球科技浪潮中，基本都能较好地抓住转型机遇：从出口导向和加工制造，到科创转型，再到近年来重点布局智能经济，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其发展始终紧贴国际创新生态的演进。

相比之下，香港虽然起点相近，早期同样以出口经济和加工贸易为主，但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一轮“制造业外迁”。在服务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香港将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广东及内地，自身发展重心逐步转向高端服务业，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和高等教育科研。

香港拥有多所国际排名靠前的高校，但由于本土缺乏完整的高端制造业体系支撑，其科研体系更多以论文产出为导向，而非技术转化或与本地企业深度协作的商业化应用。金融体系方面，香港仍以传统商业金融为主，与科技创新深度耦合的科技金融和风险投资体系相对不足，这与新加坡近年来主动布局科技金融、服务初创企业的取向形成对比。

综合来看，即便不考虑地缘政治这一外部因素，仅从本土创新能力和创新生态的完整性与适配度来看，新加坡在当前阶段，确实更具优势。

刘深：我们把视角拉回到中国 AI 发展的整体环境来看。2025 年初，DeepSeek 横空出世一度让大家信心倍增。但我们也注意到，这股热潮似乎很快就退去了。进入下半年后，围绕 DeepSeek 的用户批评声音也开始增多；与此同时，海外新的模型还在不断迭代，整体看下来，中国 AI 的发展似乎又进入了一种相对“沉寂”的状态。你怎么看待当前中国 AI 发展的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戴明洁：整体来看，无论是 DeepSeek 在具体应用层面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例如“幻觉”现象，还是在部分行业场景中的适配不足，其实都并非中国模型所独有。从当前情况看，中美两国在性能排名靠前的大模型上，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大体相似，很难说中国模型在整体能力上已明显落后于美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质疑与批评，本身也是技术扩散阶段的正常现象。

我更关注的是，DeepSeek 在今年年初引发的讨论，其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模型本身的优劣，而在于它揭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科技巨头的 AI 发展路径。具体而言，DeepSeek 选择的是一条低成本、开源的技术路线；而当前美国主流模型更强调以前沿能力和商业回报为核心的闭源路径。相比之下，开源模式更侧重技术扩散和广泛应用，对 AI 的发展逻辑作出了不同回答。

正是这种由 DeepSeek 所代表的路径分歧，在 2025 年持续发酵，并逐渐演化为具有标志意义的分水岭。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全球 AI 技术路线的讨论中，也开始反映到中国自身的 AI 战略政策与企业研发实践中。

如果从中美对比来看，这一点尤为清晰。今年 7 月，中美两国几乎同时发布了各自在 AI 领域最核心的战略文件。美国发布的是《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核心仍然是强化对通用 AGI 和最前沿模型能力的追求，并配套以围绕前沿模型的全栈 AI 技术出口策略，技术导向进一步向尖端能力集中。

中国方面，虽然难以简单判断是否直接受到 DeepSeek 的启发，但结合长期强调的优势——如丰富的应用场景、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 DeepSeek 在开源策略下获得的国际关注——可以看到，中国在 AI 战略上的侧重点正更加明确地转向应用导向。

从这个意义上看，DeepSeek 这一看似“小企业”的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中美两种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的分化。这种分化对全球 AI 格局的影响，可能远比模型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更为深远。

在企业实践层面，这一变化同样逐渐显现。自 ChatGPT 于 2022 年底发布以来，中国无论是腾讯、阿里等科技巨头，还是随后出现的一批明星 AI 企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选择跟随美国科技公司的路径，集中资源投入通用大模型，试图在同一赛道上竞争。

而进入今年之后，一个明显的转向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重心放在具体行业场景，转向垂直领域、小模型和行业模型的开发。可以说，以通用大模型为核心的路径，正在被更加应用导向、行业导向的发展路径所补充，甚至在部分企业中逐渐成为主流选择。

刘深：顺着你刚才的分析继续追问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常说，在 AI 领域，美国可能会长期主导最前沿创新，而中国更多集中在应用和商业化层面。那么从今天这些收购案例和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会不会仍然是这样一种格局——美国凭借在资本、人才、芯片等方面的优势，持续保持 AI 创新领先；而中国由于人才外流、风险投资相对不足、芯片受限、国际环境制约，以及国内支付能力偏弱等因素，更多只能扮演“跟随创新、复制扩散、推动应用”的角色？这种模式是否会持续下去？

戴明洁：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触及了一个长期存在于中国科技发展中的深层议题——对“原始创新”的焦虑。

2015 年，硅谷创投教父、PayPal 创始人 Peter Thiel 在其著作《从 0 到 1》中，曾对中国的创新模式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中国缺乏“True Innovation”（真正的创新）。此后，中国在 2016 年正式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对原始创新的重视逐渐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核心导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围绕创新是否“源头在中国”、能否在基础科学和前沿领域取得突破，甚至是否产生诺贝尔奖等标志性成果，成为高度关注的焦点。

但近几年可以看到，这种对“原始创新”的强调在实践层面有所转向。相较于过去对创新源头的高度聚焦，当前讨论更多集中在技术如何落地、如何应用，以及如何更快形成产业化和规模效应。整体而言，应用导向、产业导向在科技发展中的权重正在上升。

在我看来，在讨论路径选择之前，有必要先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以及，我们追求创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是否一定要把“最前沿突破”视为唯一目标，便值得重新审视。不可否认，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强国，集中了最优质的资本、人才和科研资源，在前沿领域持续探索，仍具备很强的延续成功能力。但与此同时，这种以前沿突破为核心的创新模式，也在社会层面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社会结构与政治分化。

早在 2016 年特朗普当选时，这一问题就已在美国政治地图上清晰显现：最富裕、创新高度集中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湾区、波士顿等少数区域，而其他地区的贫富差距却持续扩大。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如果创新红利长期只集中在少数前沿领域，而未能向更广泛的行业、地区和社会阶层扩散，其后果便会逐步显现。当前，美国的 AI 红利更多被少数高科技行业吸收，而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等传统领域是否真正受益，仍存在疑问。这种不均衡，可能进一步加剧类似“制造业铁锈带”的结构性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创新最终应服务于人的发展和整体进步，而不是“为了科创而科创”。美国二战后曾引以为傲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如今正向“沙漏型”演化：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不断收缩。这也促使我们反思：是否应将最多、最优质的资源，长期集中投向极少数最前沿技术领域？

回到中国的创新路径选择，我并不认为强调技术扩散、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就意味着放弃对原始创新的追求。相反，在研究中我发现，我们对创新往往存在一种固化认知，即将创新理解为一从高校基础科研出发、经企业转化、最终落到产品和应用的线性路径。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正在挑战这种线性模型：原始创新并不一定只发生在基础科研阶段，它同样可能在工程化创新和产业应用过程中产生。换言之，并非只有“先把前端科研做完”，才能孕育真正的原始创新。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推动 AI 在不同行业、不同产业场景中的应用，与对原始创新的追求并不矛盾。相反，在解决具体产业问题、回应真实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反而可能挖掘出一些在美国既有路径下并不容易出现的机会。这种从应用和工程实践出发、再反向推动原始创新的路径，本身具有相当潜力。

近期的讨论中，工程院院士李国杰也提出，中国的优势并不只是“产业应用”，而是“以产业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这意味着，中国并非停留在技术应用或简单模仿层面，而是通过创新联合体的方式，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持续挖掘新的原始创新机会。长期来看，这或许正在孕育一条不同于美国路径，甚至具有颠覆性的原始创新道路。

刘深：你刚才提到“创新焦虑”，这似乎也是中国语境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惯性。比如年初 DeepSeek 出现时，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终于有创新了；但 Manus 出来之后，又有不少声音批评它只是“套壳”。所以最后也想请您从更现实的角度谈一谈：对于当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环境，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进一步改善的？

戴明洁：在前面对中美 AI 发展路径差异的讨论基础上，再来思考制度改革以及对企业和人才的支持，逻辑会更加清晰。

回到现实层面，短期内仍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尽管中长期路径逐渐明朗，但在当前阶段，中国依然面临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现实压力，这一点无法回避。

以 Manus 出走为例，其暴露出的最直接问题之一，就是投资审查。进一步说，当企业因拒绝美国资本而面临融资压力时，国内是否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有效的资本补位？从现实情况看，这方面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这与我国当前的科创资本结构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各类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和创投基金，但整体仍以国家资本为主，而国资在撬动和吸引社会资本方面的能力尚不充分。同时，与美国相比，我国市场化风险投资体系仍不够活跃，对高风险、前沿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有限。

因此，未来一个重要方向，是构建更加多元、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在完善国资体系的同时，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的培育，提升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只有资本体系更具韧性和弹性，才能在面对美国投资审查等外部冲击时，更快通过国内渠道为企业“接力”，缓解因资金压力导致的外迁问题。

第二个现实挑战，是算力“卡脖子”。国产芯片替代正在推进，但在短期内，与最前沿水平之间仍可能存在数月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更可行的路径，是发挥中国在完整产业链上的整体优势，通过增强产业生态的“黏性”，留住企业和人才。

美国的优势在于掌握最前沿芯片，而中国则可以通过强化协作、减少内耗，让大中小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帮助初创企业降低创新过程中的市场成本和制度性成本。尤其在 AI 领域，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集中在算力和数据两端。美国主要由科技巨头承担这一角色，而在中国，这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参与。

例如，政府是否可以牵头建设高质量、行业级数据集，并提供公共算力与智能算力；通用大模型本身，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国家级公共基础设施。若这些基础条件由公共体系建设得更加完善，企业在开发行业模型和应用时的成本压力将显著降低，也不易同时受到美国算力限制和国内低价竞争的双重挤压。

在此基础上，还可通过政府采购、更完善的营商环境以及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进一步增强产业生态的吸引力和稳定性，从多个层面缓解外部“卡脖子”带来的冲击。

第三个方面，是监管问题。在当前科技竞争环境下，许多领域出现“泛安全化”倾向，安全优先成为普遍逻辑。但正如郑永年老师反复强调的，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国长期强调的，正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监管体系。

在此背景下，是否可以借鉴改革开放时期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在创新驱动转型阶段探索“科创特区”模式？具体而言，从中央层面授权，赋予地方在特定新兴技术领域的改革自主权，对新兴技术落地“去监管”，使科创特区能够更快推进商业化和应用落地，同时承担一定的国际化市场探索功能，从而帮助企业减少对国内低价竞争和“内卷式”竞争的依赖。这些方向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纪念哈贝马斯】

为了人类理性的未竟事业

刘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导语：德国当代重要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2026年3月14日逝世，享年96岁。《外交政策》杂志发文如此悼念这位思想家：“在这个日益沉溺于非理性主义、部落认同，以及对专业知识日益蔑视的时代，哈贝马斯的离世，与其说是一个篇章的结束，不如说是一盏明灯的熄灭。”

从对“公共领域”的剖释，到对“交往理性”体系的构建；从对“现代性”的反思，到对“后民族主义”构想的探索，他的思想为知识界提供了跨越学科疆界的、持续而深澈的理论滋养。然而，在生命晚期，哈贝马斯所捍卫的“人类理性主义”，也因时代巨变而遭受挑战。

IPP 研究员刘佳撰文追思这位思想巨擘，从学理脉络出发，回顾了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张力及其与罗尔斯的理论交锋，并结合当下地缘政治与科技变革的现实背景，对其思想遗产的当代意义展开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

2026年3月14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去世了。“IPP评论”邀请我谈谈看法。坦率地说，我并非研究哈贝马斯的专家，我那不怎么拿得出手的政治哲学理论研究，局限于罗尔斯理论视角下的全球正义理论构建。然而，也正是这项全球正义的理论构建工程，让我无法绕过哈贝马斯。

因此，下面所写的，并非哈贝马斯理论的完整思想肖像，而是一个罗尔斯主义者在借道哈贝马斯时的私人阅读笔记。

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野下，我们阅读哈贝马斯，往往遵循一条经典进路：首先是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入手，进而深入其商谈伦理学，最终抵达《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德语原名 *Faktizität und Geltung*，是哈贝马斯在1992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所构建的制度蓝图。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现了哈贝马斯如何从人类言语行为中提炼出理性的交往形式，并将其一步步凝结为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最终转化为现代法治国家与民主程序的规范性根基。

当然，这条脉络的走向并非唯一。法学家们或许会直接从他对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张力的剖析切入，再反向追溯其交往理性的源头。但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阅读哈贝马斯的过程，背后都隐含着一条非常鲜明的主线——对现代性或者说人类理性的高度关注。

这项事业的核心关怀在于，当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权威以及不言自明的习俗都已失效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隔膜，是否能够依靠理性的力量来解决？对此，哈贝马斯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解决冲突的力量蕴含在语言交往中的人类理性。

一、从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到新康德主义者

在这一时期，哈贝马斯的理论研究重心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便是一部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

彼时的战后德国，正处于反思纳粹遗毒、重建民主秩序的关键时期，也是西方社会经历经济繁荣后开始涌现社会运动的转折点。哈贝马斯在这本书里试图追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德语：Öffentlichkeit）的兴衰，揭示其如何被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所侵蚀。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国家开始干预经济生活，包括工会、财团在内的大型社会组织也开始谋求政治权力，原本作为二者缓冲地带的公共领域被逐渐压缩。如果说最初的公共领域是批判性的，有赖于人们通过阅读和讨论所形成的理性判断，那么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公众逐渐蜕变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彼时的哈贝马斯，思考的核心依然是解放与异化，是左翼批判理论的传统议题。然而，也正是从这部早期著作开始，“公共生活中的理性沟通”这一贯穿其终身的理论关切已然萌芽。实际上，即便在这部早期作品之中，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解，也已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在哈贝马斯那里，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的阶级对抗，或者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并非其理论探讨的重点。他所真正关注的，是一种交往和文化领域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深刻分歧，可以从托尼·弗洛德（Tony Flood，英国记者、编辑和政治评论作者）的论述中窥见一二。弗洛德指出，对哈贝马斯而言，人类物种在认同与控制自然方面的兴趣，是其自我生成行为中同等重要却又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

如果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论断全然成立，那么马克思自己对神秘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反倒变得无从理解了。因为这种批判绝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它只能被理解为人自我理解的一个实例，而这一理解过程必须被纳入符号互动的范畴框架之中。然而，由于马克思将自己局限于工具性行动的范畴框架，他实际上被迫将自己的批判误解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探究。

这一判断听上去或许令人不安，却不乏文本依据。马克思不仅将“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径直视为“自然规律”，还意味深长地引用并明确赞同一位俄国评论家对其《资本论》方法的评价——“该书的唯一目标，那位评论家认为，是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展示相继的确定社会秩序形态的必然性，并尽可能不偏不倚地确立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的事实……”马克思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受制于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智慧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智慧的规律”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段引文恰如其分地暴露了实证主义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伟大革命者对何为有根据的社会知识的观念，已然被实证主义所渗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象化的批判，在其自我理解的层面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对此，哈贝马斯的立场则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物种通过生产性劳动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却通过一种黑格尔式的主体间“为承认而斗争”实现自身的形成。哈贝马斯意欲恢复的正是这一“为承认而斗争”的互动性维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体现为阶级斗争。但在哈贝马斯的视域里，阶级斗争并不仅限于制度化的权力斗争或争夺剩余价值的分配——那不过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功能。相反，主体间关系的场域，才是那些相互冲突的、大多处于虚幻状态的自我构想相互对峙、相互检验的过程。

新技术能将人类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即从自然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但这只有在人类首先克服其在阶级分裂社会中施加的支配时才能实现。生产性知识永远无法替代人们所需的自我反思性知识。导致这两种不同知识生成的过程，虽然相互依赖，却并不汇合。哈贝马斯断言，马克思试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捕捉这种相对自主性，乃是徒劳。因为只要人与自然的物质综合概念仍被局限于生产的范畴框架，这种辩证法的意义就注定模糊不清。

通过弗洛德的分析，我们得知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微妙差异。哈贝马斯并不否认马克思在其具体研究层面的价值，问题出在马克思研究的范畴框架层面。马克思用以理解自身实践的理论工具，无法容纳他自己实际上已经触及的洞见。这一判断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实质分析中得到了印证。马克思揭示了阶级斗争主要并非采取暴力形式，而是采取意识形态幻象的形式。

换言之，劳动产品不再呈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呈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物理的、可量化的关系。人类劳动的商品化，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使冲突的对象对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变得不可辨识”；这一过程“既掩盖又表达了对无约束对话关系的压制”。这种客观幻象及其经由社会主体的批判而被克服的过程，根本不可能仅仅被理解为生产过程在观念上的反馈。

正是基于这一诊断，哈贝马斯提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方案。他建议对“阶级意识的表现形态进行重建”。换言之，如果要阐明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就应当给予它与追溯生产方式发展同等程度的重视。唯有在生产与互动这两个范畴之间实现方法论上的对等，才可能建立起关于所谓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真正辩证理论。

简而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诊断出了病症，但他所开出的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等药方仍然开在劳动的领域。哈贝马斯认为，要想真正治愈资本主义的疾病，必须在互动的领域里下药，也就是通过无扭曲的、理性的沟通和商谈，来重建人与人之间被物与物关系所掩盖的社会联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任何批判理论而言，哈贝马斯的分析无疑至关重要。但对于我们而言，特别是对今天处于地缘政治动荡和技术变革中的普通人而言，批判理论的批判价值或许在于：如果社会批判不能仅仅依赖于生产力的自然演进，那么批判的根基究竟应该扎在哪里？

我想，这正是我们在当下，仍然可以回到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上世纪末所展开的那场辩论的主要原因。

二、包容他者：一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

1995年，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二人关于对于“他者”的态度的回应，构成了上世纪末全球化高歌猛进时代下的一幅复杂而生动的思想图景。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理论都从康德哲学出发，将正义理解为制度而非个人的首要德性，都试图在理性多元主义的条件下重建政治的规范性基础。然而，他们的核心分歧在于：正义原则应当如何被证成？

罗尔斯著名的原初状态设想是一个思想实验。在“无知之幕”的背后，各方被剥夺了关于自身阶级出身、自然天赋、善观念等特殊信息，只能依据一般性知识进行理性选择。罗尔斯认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被选择出来的程序是公平的。这就是罗尔斯所谓“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核心含义。

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的质疑在于：原初状态的设计是否在所有角度上都能保证对非本体论的正义原则进行不偏不倚的评判；以及罗尔斯似乎将论证问题与接受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并以放弃其正义概念的认知有效性为代价，换取该概念在 worldview 层面的中立性。这两条理论策略最终导致他在构建民主法治国家时将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置于民主合法性原则之上，因而未能真正实现现代人的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协调统一。

如果说罗尔斯试图通过“无知之幕”暂时搁置个体之间的差异，使理性主体能够在抽象的选择情境中就正义原则达成一致，那么哈贝马斯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他看来，差异并不需要被抽象掉，相反，它必须被纳入公共讨论之中。规范的正当性，并不来自思想实验中的假想同意，而来自现实世界中所有受影响者的实际参与。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谓“包容他者”的真正含义：他者并不是被我们在理论中所代表的人，而是与我们一道参与规范建构的主体。

这一分歧同样体现在哈贝马斯对现代法律的理解之中。在他看来，从法律有效性 (legal validity) 的角度出发，现代法秩序始终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事实性 (facticity) 与合法性 (legitimacy)。一方面，实定法不同于习俗或伦理规范，它之所以在社会中发生效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律形式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即通过制度化的执行机制形成的事实上的服从；另一方面，法律规则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正当，又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通过合理的立法程序获得辩护，并在实践、伦理或道德层面经得起公共论证。正因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法律的有效性始终处于事实性与合法性的张力之中。



海德堡哲学家小径。图：作者提供

关于程序与实质的关系，二人的争论尤为复杂。芬利森（James Gordon Finlayson）在其研究《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争》（*The Habermas-Rawls Debate*）中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将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与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U 原则）视为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正义理论。

实际上，两者的理论任务根本不同：罗尔斯发展的是实质性的政治正义原则，旨在为自由民主社会提供一个关于基本制度的规范性蓝图。他的平等的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具有明确的实质性内容。哈贝马斯发展的是道德规范之公正证成的程序，旨在阐明什么样的程序能够确保规范得到所有相关者的同意。他的商谈伦理并不预先规定正义的具体内容，而是将这些内容留待真实的公民对话去填充。

芬利森指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不同的传统中工作。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源于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并受到他在牛津的导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 H. L. A. 哈特（H. L. A. Hart，牛津大学法学教授）的启发。他发展出“建构主义”方法，从微薄的规范性前提出发，得出更丰富的规范性结论。这一方面起源一方面源于他与康德的批判性交锋，另一方面源于他对普里查德（Harold Arthur Prichard）的直觉主义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的功利主义的拒斥。

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代表了对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德国批判社会理论传统的彻底反思，这是他与法兰克福同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 共同发起的转变, 并汲取了广泛的资源, 包括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 的实用主义以及奥斯汀 (John L. Austin) 和塞尔 (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哈贝马斯关于政治和法律的思考, 深受他与法律社会学 (从韦伯和涂尔干到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和尼克拉斯·卢曼 (Niklas Luhmann)) 批判性交锋的影响, 以及他与德国法律和政治理论家汉斯·凯尔森 (Hans Kelsen)、伯恩哈德·彼得斯 (Bernhard Peters) 的密切接触。哈贝马斯也为德国的政治哲学开辟了新方向, 并发展出一种新颖的方法——他称之为理性重构, 旨在重构实践者能力和实践背后的规则和原则。

然而, 对于我们而言,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两人各自的思想源流, 转向他们试图回应的问题场域, 便会发现, 这种方法论与传统的差异, 恰好对应着芬利森在书中引述奥诺拉·奥尼尔 (Onora O'Neill) 时所指出的那种政治现实层面的深刻分野: 哈贝马斯面对的是“民族主义遗留问题以及在后遗症中构建宪政秩序”, 而罗尔斯面对的是“民权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斗争”。不同的病症, 自然催生了不同的药方。然而, 也正是这两种看似不可通约的理论方案, 曾在上世纪末被寄予厚望, 共同构成全球化时代规范秩序的理性基石。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 二人的理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缘政治竞争、民族主义复兴以及全球权力的不对称, 都在不断压缩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 罗尔斯的理性选择模型显得过于抽象, 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想又显得过于乐观。

三、“永久和平”、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 人类理性的未竟事业

如果说 20 世纪末的全球化时代, 为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近乎乐观的历史背景, 那么今天的世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后, 人们一度相信, 随着市场、信息与人员流动的不断加速, 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淡化, 政治冲突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制度、法律与谈判机制来解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被许多人视为全球秩序可能的规范基础。

在哈贝马斯晚年持续发声的诸多议题中, 有两个主题贯穿始终: 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我们可以视这二者为其交往理性在现实政治中的试验场。当然, 当下的俄乌冲突、以伊冲突等也表明, 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 恐怕只是人类理性的未竟事业。

哈贝马斯对欧洲一体化的辩护, 建立在他对民族国家的诊断之上。在他看来, 民族国家曾是现代性的伟大成就。民族国家以领土边界和公民身份为框架, 为民主法治提供了制度容器。但随着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气候危机、金融动荡、难民潮的发展, 人们意识到资本、人员、信息、风险等早已越过国界, 而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却被锁闭在边界之内。这一结构性错配, 正是当代政治困境的根源。



法兰克福大学校景。图源：作者提供

出路何在？哈贝马斯的答案是“后民族格局”（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他主张，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是一次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验。在不诉诸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通过主权国家的自愿协商与权力让渡，建构起超国家的治理框架。各国人民之间、各文化传统之间，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与商谈，逐步培育出共享的政治文化和宪政认同。

他曾经指出：“要想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继续扩大欧盟的理由，就不能离开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凝聚力。这种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以及人们要捍卫它的愿望，激发了一种未来欧洲的新观念，从而可以造性地迎接当前的挑战。”

这一构想的核心概念是宪政爱国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后民族格局中的政治认同，不必建立在共同的血缘、语言或历史记忆之上。宪政爱国主义完全可以建立在公民对宪政原则、民主程序和人权保障的共同认可之上。也就是说，欧洲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人”，不是因为他们都读过荷马史诗，而是因为他们都认同一套超越国界的法治与人权准则。

将视野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哈贝马斯的思考显得更加紧迫。在他看来，当代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与技术层面的消极全球化：资本、商品与信息可以迅速跨越国界流动，而制度与规范的建构却依然停留在民

族国家的层面。结果便是，市场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政治调控的能力，经济系统的逻辑不断侵入原本由社会规范与公共讨论所维系的生活世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贝马斯提出了一项颇具雄心的政治设想。他认为，现代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形成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已经难以单独应对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要想维持既有的社会保障与民主调控能力，唯一的出路，是将部分政治权力与治理能力转移到能够适应跨国经济运行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换言之，政治整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追赶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制度层级的提升。即便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被转移到跨国政治共同体之中，如果缺乏民主程序与公共讨论的支撑，政治仍然难以真正约束资本的力量。真正关键的，是以民主政治的力量重新驯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

但回顾近十余年的世界政治，这一构想似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战争与制裁再次成为国家博弈的常见工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卷土重来。与此同时，不仅全球治理机制运转愈发艰难，多边主义本身也不断受到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当现实政治再次回到权力、利益与安全的逻辑时，哈贝马斯所试图驯服的资本主义，是否仍然是当代世界的核心困境？抑或说，当地缘政治重新主导国际秩序之时，人类是否仍然能够寄希望于理性与公共讨论，为政治提供某种规范性的基础？

四、地缘政治回归下的人类理性

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调，贸易武器化、能源政治化、科技脱钩论甚嚣尘上。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正在被地缘政治的逻辑撕扯得四分五裂。

“后民族格局”的欧洲，在安全威胁面前重新诉诸民族国家的硬实力；曾被哈贝马斯视为交往理性制度载体的欧盟，在危机中屡屡暴露其决策机制的脆弱。多边机制普遍失灵，联合国安理会陷入瘫痪，国际法在强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地缘政治的回归，意味着权力、资源、空间、利益、安全、边界、军事能力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妥协的可能被质疑，丛林法则和强者的逻辑重新主导国际舞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与多个历史时期存在相似之处，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政治碎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引发的技术剧变，以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但从更根本的层面来看，当前局势实则是 1973 年肇始的破坏性经济动荡的延续。

正如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著名经济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所观察到的，这一时期始终伴随着经济表现与利润率的持续衰退。布伦纳认为，高利润率与经济繁荣的长期维系，曾依赖于一种由美国国家权力支撑的强大共生机制。这种共生关系存在于两类资本集团之间：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资本集团，其特征是技术领先、社会经济演进更成熟，其国家与资产阶级占据国际霸权地位；另一方则是以西欧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资本集团，其特点是技术追随、社会经济演进滞后，相关国家与阶级处于霸权支配之下。这些后发集团最初主要在与先发集团相对隔离的状态下发展。

然而这种共生模式的持续扩展与深化，最终演变为自我瓦解的过程。后发集团通过技术追赶和成本优势，逐步侵蚀先发集团的市场份额；先发集团为应对竞争，不得不加速技术迭代和资本输出。这一动态过程导致全体系范围内出现产能过剩与利润率持续下滑。布伦纳指出，1965 至 1973 年间，美国制造业和私人工商商业部门的利润率分别下降了 40.9% 和 29.3%；七国集团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在同期下降了大约 25%。

1973 年由此成为战后经济史的转折点。这一年的石油危机只是表象，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在于，战后黄金年代所依赖的制度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劳资妥协的福利国家——在利润率下滑的压力下逐一瓦解。此后五十余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能真正走出这一困境。新自由主义转向、金融化、全球化，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利润率下滑的回应，却也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新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2020 年疫情冲击、当下的地缘政治回归，均可视为这一长期衰退的不同症候。

这一结构性视角，为理解哈贝马斯的理论遗产提供了新的维度。

第一，交往理性的制度前提正在瓦解。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预设了一种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平衡。生活世界是意义、共识、规范的源泉，系统（市场与国家）则承担功能整合的任务。但布伦纳所揭示的长期衰退，揭示了市场和系统层面失衡的后果：产能过剩与利润率下滑，驱使资本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商品化。结果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公共领域的商谈空间被急剧压缩，共识形成的可能性被侵蚀。

第二，经济竞争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布伦纳的分析表明，先发集团与后发集团之间的竞争，并非纯粹的市场过程，而始终与国家权力深度交织。当利润率长期低迷、市场扩张的空间趋于饱和时，这种竞争便从经济领域溢出，转化为地缘政治对抗。关税壁垒、技术封锁、货币战争、军事对峙，这些都是产能过剩的另一种表达。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哈贝马斯所期待的通过对话驯化权力，往往会遭遇最为严峻的挑战。当经济逻辑本身要求突破制度约束时，对话反而会更加轻易地沦为强权的装饰。

第三，理性共识的物质基础遭到侵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虽然强调程序普遍性，却从未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平等的对话需要相对均等的资源分配，理性的共识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然而，长达半个世纪的利润率下滑，加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分化，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当赢家与输家的鸿沟日益扩大，甚至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一步发展，即便是作为消费者，赢家也不再需要输家，理性对话的空间便急剧萎缩。人们不再寻求相互理解，而是寻找替罪羊。移民、邻国、既有体制，都沦为情绪宣泄的对象。

行文至此，我很难提出任何有建设意义的解决方案。反而，笔者想用一個不怎么诙谐但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讨论的段子结束本文的讨论：

有人问：和雷蒙·阿隆同时代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是谁？

答：让·保罗·萨特，就是卖得更好的那位。

问：他俩有什么区别？

答：这么说吧，1968 年法国学生上街游行，喊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

后来萨特去世，六万人送葬，浩浩荡荡从蒙帕纳斯走到蒙马特。

阿隆去世，也有人送葬——不多，但都是认真读过他书的人。

再后来，有个出版商出了一套“20 世纪法国思想家”丛书。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印了两万册，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印了三千册。

三十年后的某天，书店盘点——萨特那本：库存还剩一万九千八百四十二册。阿隆那本：卖完了，正在加印。店员挠头：这到底算谁卖得好？

后来，店员把这事儿发到了网上。评论区吵成一锅粥。

存在主义者说：当然萨特卖得好。两万册印出来，就是两万种自由。印出来可以不卖，可以垫桌角，可以在五月风暴里当路障。这才是真正的“存在先于本质”。阿隆那三千人，哼，买的不是书，是墓志铭。

自由主义者回呛：你们懂个屁。那叫“卖得好”吗？那叫库存积压，周转率为负。阿隆那三千本，每一本都被翻烂了，每一本都在深夜被人划满了线，每一本最后都传给了下一个愿意动脑子的人。这叫复购率，这叫长尾效应。

有个学社会学的弱弱地问：所以……到底是印得多算好，还是卖得完算好？

没人理他。

这时候，有个老人默默在底下回了一条：“你们说得都对，也都错。”

“萨特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咖啡馆里挤满了人。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时候，咖啡馆里只有他自己。”

“但萨特晚年，被问起最后悔什么。他说：我后悔没有多听阿隆的话。”

“哈贝马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晚年回望一生，最遗憾的只有一件事：1995 年和罗尔斯论战的时候，话还是说得太重了。他说，罗尔斯要的，其实和他一样，都是在这个众神喧哗的世界里，给理性留一把椅子。”

“可惜当时不懂。等懂了，罗尔斯已经听不见了。”

“所以你们吵谁卖得好，吵谁对谁错，其实都没吵到点上。”

“思想史这件事吧，有点像下雨。萨特是暴雨，哗啦啦落下来，满街都是水，大家都看见了。阿隆是地下水，看不见，但井都在它身上。”

“哈贝马斯呢？哈贝马斯是个挖井的。”

“挖了一辈子，也没挖出个喷泉。但后来的过路人，渴的时候往下挖三米，总能挖到湿土。”

“你们今天能在这儿吵架，用的就是他那把铲子。”

评论区安静了很久。

后来有人问：那哈贝马斯自己知道吗？

老人没再回。

窗外，法兰克福的天黑下来了。

2026 年 3 月 14 日，刚走了一位老人。他挖了一辈子井，终于可以休息了。

【IPP 动态】

IPP 动态

(2026 年 1—3 月)

【重要动态】

►郑永年教授受聘为第五届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

近期，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换届工作顺利完成，并正式公布第五届顾问委员名单，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当选委员。

据悉，第五届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遵循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研究成果显著、实践经验丰富、熟悉广东情况等原则，共遴选 34 名委员。除郑永年教授外，还包括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国家高端智库、全国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领军人物与行业专家，任期自 2025 年 11 月起，为期三年。该委员会将聚焦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

►郑永年教授举行学术指导会

2026 年 1 月 17 日，郑永年教授在研究院 15 楼会议室举行学术指导会，IPP 全体研究人员参会。在会议上，与会研究人员反馈了近期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进度，并就下一步的研究计划进行了汇报。郑永年教授对各位研究人员的研究进行点评和指导，并就新一年度的重点研究方向展开部署。

►郑永年、林辉煌出席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

2 月 24 日，广东省委、省政府连续第 4 年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主持会议。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资深研究员林辉煌继续应邀参加大会主会场并在分会场做主题报告。

►郑永年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6 年年会

3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6 年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题为“‘十五五’的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共创新机遇”。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受邀出席论坛，并在“应对不确定性：全球风险、增长机遇与合作”专题研讨会上进行主题发言。

►郑永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6 年年会

3 月 24 日至 27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6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000 名政商学界代表齐聚一堂。郑永年教授应邀出席本次论坛，并参加 3 月 24 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望：聚焦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以及 3 月 27 日举行的“世界变局中的南海秩序与治理合作”分论坛。

►郑永年主编《下一个五年：中国的战略选择与行动方案》出版

近日，由郑永年教授主编，王一鸣、蔡昉、黄益平、刘尚希、陆铭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领衔创作的新书《下一个五年：中国的战略选择与行动方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从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国统一大市场、高水平对外

开放、全民共享机制五大维度，清晰揭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逻辑与实践路径。

►IPP 举行全院工作会议

3月30日，IPP召开全院工作会议。执行院长郭海系统总结了IPP第一季度在资政建言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果，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内容进行了部署。

【院务·交流】

►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到访

2026年1月20日，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代表团到访IPP并举行专题调研座谈会。

RSIS代表团团长、政策研究主任陈大伦（Adrian, Tan Tai Loon），RSIS副院长、研究生部主任兼南洋理工大学（NTU）国际关系讲席教授李明江（Li Mingjiang），RSIS中国项目助理教授何子恩（Benjamin Ho Tze Ern），RSIS军事研究项目副研究员林浩泽（Thomas HZ Lim）等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发言。双方围绕中新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合作、中美战略动态、亚太区域发展以及智库合作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并就中美战略动态、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等议题交换意见。IPP执行院长郭海，IPP副院长刘金程，IPP外交政策团队成员徐伟钧、朱雁翎等出席座谈。

►中国移动研究院中移智库管理运营中心到访IPP

2026年1月23日，中国移动研究院中移智库管理运营中心调研团队到访IPP并举行调研座谈会。调研团队由中移智库管理运营中心总经理刘玮、研究员张弦、马巍威、赵江威、张焕涛等组成。他们就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软科学科研

管理、智库人才体系建设等议题与IPP展开深入交流。IPP执行院长郭海，资深研究员蒋余浩、赵巍，研究员刘佳、戴明洁等出席座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到访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到访IPP，就中美关系走向、周边局势发展、国际格局的未来发展等议题与郑永年教授交流，IPP执行院长郭海参加座谈。

►IPP调研组赴人大国发院、国研院等国家高端智库调研

3月3日，郭海、刘金程、刘深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开展专项调研，与该院副院长王伟等围绕高端智库建设、人才培养、成果管理与激励考核、经费保障与运行管理、品牌建设与社会影响力运营等议题深入交流。

3月4日，调研组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拜访刘飞涛副院长及该院相关团队，双方围绕国家高端智库运营管理、高端智库支撑2026年深圳APEC会议等内容座谈交流。

►IPP研究人员参加穗港合作专题研讨会

3月18日，IPP资深研究员杨丽君、研究员刘佳、副研究员徐伟钧赴香港参加“穗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专题研讨会，并调研总部位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总部。

►巴西学者白乐思到 IPP 开展驻院访问

近期，巴西利亚大学全职教授、经济社会学比较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白乐思 (Moisés Villamil Balestro) 应邀到访 IPP，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驻院访问。此次访问将为 IPP 在拉美公共政策、绿色转型政策、产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注入更多国际视野，进一步深化中巴两国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IPP 与 Jeffrey Sachs 教授团队展开交流

3 月 26 日，IPP 研究团队在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与到访中国的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教授团队进行交流。IPP 执行院长郭海向其介绍 IPP 情况，并与萨克斯教授团队就未来继续展开学术合作和会议交流达成共识。

►IPP 研究成果在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年会发布

3 月 27 日，2026 全球科技创新高端智库论坛在北京中关村召开。论坛发布了智库联盟 2025 年度 48 项优秀成果。其中包含 41 项智库研究成果和 7 项科技成果。由 IPP 资深研究员蒋余浩教授为主要执笔人的《包容性数字未来：发展中的广东数字经济》在本次论坛上重磅发布

【学术·研究】

►徐伟钧、李品保在 CGTN 官网发表评论文章

1 月 19 日，IPP 副研究员李品保博士在 CGTN 官网发表评论文章，围绕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强势姿态及其背后的北极战略转向，系统分析美国单边行动对北极治理、多边机制与全球秩序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1 月 20 日，IPP 副研究员徐伟钧博士在 CGTN 官网发表评论文章，围绕特朗普政府针对格陵兰岛的单边霸权行径，分析其对跨大西洋关系与北极治理格局造成的冲击。

2 月 3 日，IPP 副研究员李品保博士于 CGTN 官网就全球核军控机制未来走向发表评论文章。文章指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到期，若缺乏替代性安排，美俄战略核力量可能进入长期缺乏约束的状态。这不仅将削弱全球核领域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也可能加剧核竞争和误判风险，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产生连锁的负面影响。

►赵巍资深研究员出席多场新能源汽车行业研讨活动

1 月 16 日，2026 之学研究院新年雅筵活动在上海圆满举行。在当日下午举行的战略委员会闭门会议上，IPP 资深研究员赵巍发表视频演讲，并提出了对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 2026 年技术系统、国际化发展和产业组织重构三方面的预测与前瞻，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和充分学习讨论。

1 月 16 日，赵巍资深研究员参加 2026 广深佛惠莞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论坛暨无人驾驶装备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并作题为“粤港澳大湾区汽车集群的全球战略视野”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大湾区的汽车产业集群要以打造全球竞争力集群为目标，在产业政策和企业战略上同步推进国际化。

1 月 17 日，赵巍资深研究员在深圳比亚迪参加广东省汽车工程学会三届二次会员大会暨三届三次理事会，并作题为“智能新能源车企基于

核心技术的能力战略选择”的主旨演讲。他提出，在汽车产业范式革命的时代，车企应组合运用基于“能力”的战略和基于“定位”的战略获得竞争优势。

►IPP 举行“大国博弈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路径分析”研讨会

1 月 22 日，IPP 组织举行“大国博弈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路径分析”研讨会。在研讨会上，IPP 研究员刘佳、香港教育大学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黄岳、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作人罗心曲三位嘉宾分别就大国博弈背景下海外利益保护的变迁，中国在拉美的法律样貌、现状与发展路径，中国企业海外反垄断调查的成功司法实践等议题展开分享。

►IPP 访问学者白乐思主讲 IPP 明远讲坛

3 月 23 日，IPP 访问学者，巴西利亚大学全职教授、经济社会学比较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白乐思（Moisés Villamil Balestro）主讲 IPP 明远讲坛。讲座主题为“产业政策能否突破结构性制约？巴西的近期实践”。

讲座中，白乐思系统梳理了巴西近二十年来产业政策的演变脉络，重点分析了巴西当前新一轮产业政策的提出背景及其现实困境。

►AI 领域顶尖华人科学家黄铠教授主讲 IPP 明远讲坛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午，IPP 成功举办第 25 期“明远讲坛”。本期讲坛特邀美国南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荣誉教授黄铠担任主讲嘉宾，作题为“联合云计算赋能医疗大模型与具身人工智能”的专题讲座。

黄铠教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华人学者和重要先驱之一。斯坦福大学将其列为全球排名前 2% 的计算机科学家。至今，黄教授已培养了 30 名计算机科学博士，并培养出八位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授予他首届“海外杰出贡献奖”（科技教育类）。他还获得了 2012 年世界云计算大会（CloudCom）的终身成就奖。

►《中国科学院院刊》执行主编杨柳春到访 IPP 开展专题讲座

4 月 8 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举行专题讲座，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刊》执行主编、杨柳春主任结合她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的办刊实践，系统梳理了智库期刊在整体定位、选题策划、内容组织、成果转化与传播推广等环节的运作思路。

►百度飞桨广州中心陈云峰做客 IPP 明远讲坛

4 月 8 日上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成功举办第 26 期“明远讲坛”。本期讲坛特邀百度飞桨广州中心（粤桨）副主任、首席技术官，海珠区人工智能百人会常务副会长陈云峰担任主讲嘉宾，作题为“大湾区 AI 产业落地及生态繁荣”的讲座。

讲座中，陈云峰系统梳理了 AI 产业链的基本结构，并重点结合工业分拣、智慧检务、无人机维修等案例，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公共服务及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应用前景。

►IPP 举行多场“IPP 学术分享”活动

2025 年 12 月 29 日，李品保副研究员以“为什么说美国是‘不情愿的北极大国’？”为主题做学术分享。

2026 年 1 月 8 日，林辉煌资深研究员作“‘不正规’的乡镇：治理转化及其偏差”专题分享。

2 月 5 日，卢克玲副研究员作“重构‘身体—生活’秩序：对养老院护理实践及其服务逻辑的审视”专题分享。

3月5日，区富祝以“资本结构差异与技术进步路径：基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案例研究”为题进行学术分享。

3月19日，徐伟钧以“日本高市早苗政权对华政策的演化逻辑与核心特征”为题进行学术分享。

4月9日，杨海燕以“脉络与镜鉴：道义经济的研究谱系及其政策启示”为题进行学术分享。

►多本 IPP 研究专著出版

近期，IPP 执行院长、研究员郭海的英文专著 *Rethink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Ideology* 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

IPP 资深研究员蒋余浩、IPP 助理研究员张心旒合著《包容性的数字未来：发展中的广东数字经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IPP 资深研究员赵巍的英文专著 *Remade in South China: Bottom Up Innovation in Guangdong* 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完成印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出版。

郑永年及团队研究成果《经济的跃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在中信出版社出版并在广州市图书馆举行新书发布会。

由 IPP 研究员李婷参与撰写、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德文、胡晓映及团队基于在我国县乡展开的田野调查完成的《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近期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公共政策研究院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所为中央提供独立决策咨询的国家高端智库，成立于 2012 年，由华南理工大学知名校友及企业家莫道明先生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创办，由国际顶尖政治学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2015 年，IPP 被中宣部认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17 年，IPP 成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核心智库”榜单；2022 年，IPP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认定为“重点政策研究合作单位”；2025 年，IPP 被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认定为“中央网信办舆情合作培育单位”。

IPP 以决策咨询为“安身之本”，以学术研究为“立命之道”。在郑永年教授的带领下，IPP 专注于三大领域的政策研究：大国外交、产业经济及社会治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IPP 每年撰写并向相关部门提交高端政策报告百余篇，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成果得到高层重视。

电话：020-87112324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

官网：<https://ipp.scut.edu.cn/>

微信公众号：IPP 评论

國際視野

中國情懷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政策咨询：（8620）87111850 E-mail：liujincheng@ipp.org.cn

公共关系：（8620）87112340 E-mail：media@ipp.org.cn

出版物订阅：（8620）87111856

地址：中国广州天河区五山路381号汽车科技大楼15楼

邮编：510640

官方网站：<http://ipp.scut.edu.cn>

官方微信：IPP-REVIEW

今日头条：IPP评论